

學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20.4

2020年12月 第4期(总第88期) 第22卷
Dec. 2020 No.4 Sum.88 Vol.22

報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中国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收录期刊

云南社院举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会

为认真落实省委组织部《关于在党员教育培训中开展领导干部上讲堂工作的通知》要求，12月4日，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会，党组书记蔡勇带头作宣讲报告。常务副院长何云葵，副院长陈友康，一级巡视员袁光兴参加宣讲会，宣讲会由党组成员、秘书长谢灿坤主持。

宣讲会上，蔡勇紧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主题，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重大意义；“十三五”时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决定性成就；党中央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战略考量；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论断、重大举措；实现宏伟目标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准确把握云南的省情特征，推动云南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等七个方面为学院干部教师进行全方位解读。

会议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学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社会主义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学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坚持“社院姓社”根本原则，既要抓好自身的学习贯彻，又要抓好学员的教育培训，将讲政治的要求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会议强调，将学习全会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力争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都取得丰硕成果。要在全力抓好



好主业主课上出实招、下实功、见实效，扎实推进全会精神“三进”工作，在学院主体班次全面宣讲，做到全覆盖，教育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规划《建议》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聚焦党中央和省委关心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我省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理论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理论成果和咨政成果；要在对外文化交流中

全面生动宣传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主要内容和世界影响，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之治的故事、云南高质量发展故事。要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同推进学院重点工作结合起来，自觉把“两个大局”作为谋划工作基本出发点，立足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新部署新要求，统筹谋划、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科学编制好学院“2021-2025年”发展规划，更好地发挥好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基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作用，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作出社院应有的贡献。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季刊·2020 年第 4 期(总第 88 期)

本刊顾问

杨保建 徐 彬 高 峰 李玛琳 喻顶成
张宽寿 杨 洋 李学林 杨晓红

编辑委员会

主 任:蔡 勇

常务副主任:何云葵

副 主 任:陈友康 杨春禄 袁光兴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寅平 李从贤 杨松禄 钟瑞华

侯晓芳 诸 芳 黄 梅 谢灿坤

魏贵华

主 编:陈友康

执行主编:王寅平

副 主 编:杨松禄

编辑部

主 任:王寅平

副 主 任:杨松禄 罗 雷

责任编辑:马弋涵 念兴昌 李亚强 朱家麟

英文翻译:李志凌

封面设计:郭进华

编 务:朱家麟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目 次

●云南高质量发展研究

- 新中国 70 年云南的发展历程、成就与经验 苏红军 (5)
-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数字云南”建设的路径选择 吴 韬 (10)
- 多语生活背景下的语言扶贫实践 李志凌 (16)

●统战理论与实践

- 统一战线发挥制度优势推动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王寅平 (25)
- 红河州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经验、问题及路径 ...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31)

●民族研究

- 家国与个人
- 中老跨境婚姻失败案例的人类学研究 马青云, 谭晓明 (39)
-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鲜明特征 姜丽华 (48)

●政党制度与多党合作

- 组织文化视域下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创新研究
- 以 K 研究院为例 胥福顺, 林昱澍, 沈云都 (53)
- 政党功能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提升路径探析 王晓璿 (61)

[期刊基本参数:CN53-1133/D*1999 *q*A4*120*zh*P*¥9.00*1000*16*2020-12]

●协商民主研究

- 新时代首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及制度化建设研究 姚 苹 (70)
- 人民政协推进民主协商动因及路径研究 李旭辉 (78)

●云南故事

- 党内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遵义-扎西会议探析 罗 雷 (85)
- “花房子会议”考证 冯寿芳 (95)

●文化发展

- 和顺侨乡宗祠文化的历史功能与当代价值 尹未仙, 刘林华 (99)
-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赵 凡 (106)
- 站在道德选择面前
——论《发条橙》中的自由意志 段天泽 (113)
-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年 1-4 期 (总第 85-88 期) 总目 (119)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下简称本刊)刊发的文章,内容及观点均由文章署名作者自负文责,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保有对来稿的编辑修改权,若不同意编辑修改,来稿时请特别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在论文发表后由本刊向作者支付的稿费中已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著作权使用费及论文的稿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No.4, 2020

Contents

Studies o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Yunnan

-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of Yunnan's Development in the 70 Years' History of the P.R.China Su Hongjun (5)
- Advancing the Approaches to Build "Digital Yunnan" in the New Developmental Configuration Wu Tao (10)
- Poverty Allevi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Multilingual Living Li Zhiling (16)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United Front

- A study o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United Front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ang Yinping(25)
- Approaches in Honghe Prefecture's Optimization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for Non-governmental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Team of Honghe Institute of Socialism (31)

Ethnic Studies

- Homeland and Individuals: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Cases of China-Laos Transnational Marital Failures Ma Qingyun, Tan Xiaoming (39)
- Features of the Constructive Work in the New Era for National Solidarity and Progress Jiang Lihua (48)

Political Party's System and Multi-Party Cooperation

-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arty's Cooperation Spirit into Scientific Research Organization's Innovatio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With the Case of Research Institute K Xu Fushun, Lin Yushu, Shen Yundu (53)
- Way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w Party System in the View of Political Party's Function Wang Xiaojin (61)

Studies on Consultative Democracy

- A Study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Mechanism at Basic Level in Beijing and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Yao Ping (70)
- The CPPCC's Demanding Task of Strengthening Consultative Democracy Li Xuhui (78)

Tales of Yunnan

- The Zhaxi Conference Perceived from Consultative Democracy within the Party Luo Lei (85)
-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Flower House Meeting" Feng Shoufang (95)

Cultural Development

- Historical Func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Overseas Chinese Ancestral Culture in Heshun Yin Weixian, Liu Linhua (99)
-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 Ideolog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by Marxist Theory on the World's History Zhao Fan (106)
- In the Face of Moral Selection: On the Free Will in A Clockwork Orange Duan Tianze (113)

- Contents of YNIS's Issues No.1-4 in 2020 (119)

云南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中国 70 年云南的发展历程、成就与经验

苏红军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云南作为中国经济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 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机遇, 本文试图从新中国发展全局的高度对云南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历程、取得的成就和经验进行梳理, 对下一步云南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思考, 谱写好新时代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关键词: 新中国 70 年; 云南; 发展历程; 成就; 经验

中图分类号: D619 (2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05-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指出: “70 年来, 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 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 因此, 总结好、宣传好新中国 70 年云南发展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 进一步激励全省各族人民更加团结一致、锐意进取, 推动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提供强大的历史滋养和精神力量,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 70 年云南发展的光辉历程

70 年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省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变革; 70 年来, 在党的领导下, 云南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把贫穷落后的旧云南建设成为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云南, 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

1950 年 2 月 24 日, 云南解放后,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为实现全省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在云南这个边疆多民族地区全面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使云南各族人民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 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 从根本上改变了云南各族人民的前途和命运, 成功实现了云南几千年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为当代云南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 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 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 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作者简介: 苏红军,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指引,云南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通过拨乱反正,云南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力改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进行城市国有企业、商业流通、财政金融和经济工作等一系列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经济恢复增长后,省委省政府科学把握省情,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发展农业促轻工,依靠轻工积累资金,集中财力保证重点建设”的发展思路。这一思路的成功实践充分利用了云南的光热条件和热区优势,发展起烟、糖、茶、胶等重点产业。云南通过发展周期短、投入少、税利高、见效快的轻工业,集中一定的财力物力,用于发展能源、交通、农田水利、教育和科技等事业,改善极为薄弱的发展条件,为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云南改革开放注入新的活力。省委省政府创新发展思路,探索适合云南农村的跨越发展道路,提出实行城乡结合、科技与经济结合、开放与开发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的“三结合一体化”的经营体制,促进了边疆民族地区生产方式和经营体制向社会化、现代化的转变。探索加快基础薄弱地区工业化的道路,1995 年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基础,兴科教,调结构,建支柱,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进行了全省第二次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了工业化进程。探索适合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战略,省委省政府作出了以东南亚为重点,面向全世界,外引内联,大贸边贸结合,实行全方位开放的决策,构建起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面向 21 世纪,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国际大通道”的三大战略目标,确定了云南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云南经济社会进入提速增量的发展时期。

党的十六大提出到 2020 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云南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2006 年,云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提出了建设“富裕文明开放和谐云南”的目标,云南体制改革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各个方面。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深化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事业改革;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空间不断拓展,使云南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开放前沿;民生、民族、民意等问题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党的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引领云南改革开放踏上新征程。2015 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云南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事关云南全局和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把云南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中国连接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目标,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云南进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时期。云南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面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强省建设;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形成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制度体系。云南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提升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战斗力凝聚力;通过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积极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促进云南进入国际市场分工,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提升。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云南驶入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

二、新中国 70 年云南取得的辉煌成就

70 年风雨征程，70 年艰难求索，70 年砥砺奋进，70 年春风化雨。70 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云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跨越，各族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70 年来，云南实现了经济建设的伟大变革，综合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1949 年到 2018 年，云南省地方生产总值从 8.93 亿元增长到 17881.12 亿元，增长了 2001.4 倍，2018 年比 2017 年同比增长 8.9%，增速排全国第 3 位，2019 年上半年云南实现生产总值 7957.43 亿元，同比增长 9.2%，排全国第 1 位。1950 年，全省财政收入仅 0.7 亿元，2018 年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 1994.3 亿元，比 1950 年增长了 2848 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 1950 年的 0.07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8474.89 亿元，增长了 263926 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1950 年的 3.84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6825.97 亿元，增长了 1776.6 倍。70 年天堑变通途，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跨越发展，高速公路从零发展到 5198 公里；铁路从米轨时代迈向高铁时代，高铁运营总里程达 1026 公里；航空网络四通八达，建成民用机场 15 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三。

70 年来，云南实现了从开放末端到开放前沿的跨越，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云南对外开放从边境贸易起步，从简陋的“草皮街”到昆交会、旅交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从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到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云南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步伐。目前，全省拥有 2 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3 个跨境经济合作区、4 个边境经济合作区、2 个综合保税区、6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以及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多个国家和省级开放经济平台，拥有 18 个一类口岸、7 个二类口岸、100 多条边境通道和 110 多个边民互市点。贸易伙伴拓展至 206 个国家和地区，2018 年云南外贸进出口总额完成 1973.02 亿元，同比增长 24.7%，增速排全国第 5 位。

70 年来，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坚持不懈改善民生。云南各族人民生活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建设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生活质量提高，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0 年，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 116.94 元，1978 年云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28 元，到 1988 年跨越千元台阶，达到 1156 元，1992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062 元。此后，云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2 年突破 7000 元，2012 年突破 2 万元，2017 年突破 3 万元，2018 年为 33488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50 年为 36 元，1978 年为 131 元，2018 年达到 10768 元。同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城乡居民老有所养，病有可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不断上升，全省人民的生活安全指数、幸福指数不断上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2013 年至 2018 年，全省有 707 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5068 个贫困村出列、48 个贫困县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底的 21.7% 下降到 2018 年的 5.39%。

70 年来，坚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云南省委坚决贯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民族政策，通过做好事、交朋友，疏通民族关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快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使云南各民族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团结平等，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里实现了大团结。改革开放以来，省委省政府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实现了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发展。党的十八大

以来,省委省政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嘱托,在小康建设同步、公共服务同质、法治保障同权、民族团结同心、社会和谐同创上持续用力,发展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同时,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因地制宜、因族施策,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更多地向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和贫困地区倾斜,大力实施兴边富民工程,持续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在全国率先探索“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的精准帮扶模式,使得民族地区主要发展指标增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70年来,从环境保护到建设最美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云南是长江经济带的上游省份,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是中国西南生态屏障。改革开放以来,省委省政府科学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重点实施了以“七彩云南保护行动”为代表的一批生态保护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云南要努力建设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的殷切嘱托,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实施意见》。云南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创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70年来,党在执政条件下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党的建设水平不断提升。1950年,全省仅拥有4.17万名党员,2246个党支部。云南解放后,中共云南省委立足云南边疆民族山区实际,围绕全党工作中心和工作大局,注重在生产一线发展党员,注重在少数民族群众中发展党员,在全省建立起党的各级组织。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始终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加强,为云南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云南从严治党具有优良传统,创造过许多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经验,但是一段时间里云南党的建设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一部分高级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破坏了政治生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治党,认真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云南通过狠抓思想建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省上下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建设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伍,重塑云南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坚持从严从实、抓长抓常,正风肃纪、激浊扬清,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实施细则,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提升了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新中国70年云南的宝贵经验

新中国成立70年云南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70年云南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为推进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70年实践证明,必须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省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70年来,云南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和体现到发展的各个领域、各项工作、各个环节当中,形成了“党的光辉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的生动局面,凝聚起全省上下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云南70年发展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就没有今天云南各族人民美好幸福的生活。

70年实践证明,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立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新中国70年云南发展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立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才能形成广泛共识,凝聚起上下同心、团

结奋斗的磅礴力量，才能更好地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

70年实践证明，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70年的辉煌巨变，关键在于我们党既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云南70年发展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团结一心、砥砺奋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才能成功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跨越，向着“强起来”的目标昂首奋进。

70年实践证明，必须始终高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在新时代，云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新特点、新任务、新要求，必须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闯出一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路子，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70年实践证明，必须坚持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前进。云南民族团结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具有典型示范意义。在指导方针上，要把“慎重稳进”作为处理和解决好民族问题的工作方针。在战略定位上，云南长期坚持把促进民族团结与维护边疆稳定相结合，站在国家治边战略的高度开展各项工作。工作机制上，云南重视创建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民族工作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创建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民族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如在全国率先设立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就是其中之一。在发展途径上，云南坚持全面统筹、分类指导，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此外，云南还注重人才保障，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教育和选拔，使少数民族干部成为维护民族团结稳定的基石。

70年实践证明，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推动深化改革。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就是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彻底变革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跨越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建立起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建立起有利于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管理体制。同时，在深化省情认识的基础上，敢于创新，不断突破传统发展模式，探索符合云南实际的跨越式发展路子。

70年实践证明，必须立足区位优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云南的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当前要以云南建设自由贸易区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云南对外开放要坚持以国际区域合作为主要模式，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机制；要坚持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通过对外开放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要坚持从国家大局出发，主动构建和维护我国地缘政治的安全屏障、生态系统的安全屏障；要坚持“安邻、睦邻、富邻”方针，带动周边各国共同发展，充分向世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优越性。

责任编辑：李亚强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数字云南” 建设的路径选择

吴 韬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信息技术部, 云南 昆明 650111)

摘 要:党的十九大作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后,各地区纷纷抢抓新一代互联网发展机遇,谋划布局数字中国建设落实落地,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云南省在夯实“五网”基础后,深入实施“云上云”行动计划,顺势应时、多措并举,开启了“数字云南”建设新征程,以后发优势,抢滩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前沿,书写了“数字云南”的亮丽篇章。然而,“数字云南”建设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困境问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科学判断,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突破困境,加快推进“数字云南”建设,本文给出一些路径选择。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数字云南;大数据;区块链;数字经济

中图分类号: D614 (2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10-06

党的十九大向世人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昭示着中国发展走向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线上经济全球领先……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

基金项目: 云南省党校(行政院校)系统2020年度系统课题“数字云南”建设的重难点问题研究(2019XN011)。

作者简介: 吴韬,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信息技术部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数据、数字经济。

^①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0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

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积极参与数字货币、数字税等国际规则制定,塑造新的竞争优势”。^①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科学谋划,沉着应对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育新机,为“十四五”时期乃至本世纪中叶前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布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硬核”支撑和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也离不开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建设的战略领航。当前,数字中国建设驶入快车道,而“数字云南”建设也开启了新征程。本文探讨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数字云南”建设的路径选择,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一、“数字云南”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数字云南”建设的时代背景

云南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地处云贵高原,自然资源丰富,少数民族众多,与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是我国西南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长期以来,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发展相对滞后,具有“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的基本省情和“发展不够快、不充分、不协调、不平衡”的现实省情。然而,随着云南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进程的持续深入并取得最后胜利,云南的基本省情也发生了改变,“边疆民族山区美丽”将是中国梦云南篇章的鲜明标识。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经济要发展,优势在区位、出路在开放。^②云南是我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大通道,随着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云南将从边缘地区和“末梢”变为开放前沿和辐射中心,发展潜力无限、发展空间广阔。习近平总书记寄语云南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③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考察云南时指出,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属于欠发达省份,加快发展和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新时代抓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健全推动发展先进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新兴产业。^④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中所明确的“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四个突出特点”和“五个着力”,为云南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走向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经济迎来新的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重大战略目标,就是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推动新时代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十四五”时期乃至2035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对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未来蓝图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也为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进而为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① 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第6页。

^② 《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1月22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第1版。

^④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祝祖国欣欣向荣》,《人民日报》2020年1月22日,第1版。

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全力建设数字中国以及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时代背景下,“数字云南”建设向着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开始乘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澎湃浪潮,破浪前行、扬帆远航。

(二)“数字云南”建设的实践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我国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推动国家信息化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宏伟战略目标,持续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建设。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孕育的重大发展机遇,全国各地纷纷顺势应时、抢抓机遇,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中国建设的落实落地,而云南也顺势而为,积极抢抓互联网发展的重大机遇,谋划布局“数字云南”建设,并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

一是“数字云南”建设开启新征程。进入新时代,随着数字中国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云南省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也不断迈进。在“十三五”期间,全省奋力完成了“五网”建设的预期目标。2015年12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行动的实施意见》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相继出台,云南省信息化和信息化建设驶入快车道。2016年1月,云南省召开全省信息化工作会议,首次明确实施“云上云”行动计划。同年1月7日,云南省“云上云”行动计划重点项目在昆明呈贡信息产业园开工建设。随后,云南省云计算大数据发展迎来难得的机遇期,初步形成以昆明为核心,以玉溪和保山为两翼的“一核两翼”云计算大数据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数字中国之后,拉开了各地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实践序幕,而云南省建设“数字云南”的步伐也随之加快。2019年1月,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抢抓数字经济机遇,全力建设“数字云南”。自此,开启了“数字云南”建设的新征程。

二是“数字云南”建设开创新局面。实施“数字云南”建设以来,云南省科学谋划“数字云南”总体布局,着力构建数字经济体系,以全省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数字化为目标,以资源数字化、数字化产业、产业数字化为主线,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协同化发展,加速推动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力打造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的试验场、聚集区。2019年2月18日,云南省政务服务管理局、云南省数字经济局、云南省“云上云”中心、云南省信用中心挂牌成立。2019年2月19日,云南省召开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省长亲任组长,下设数字经济局,设立首席技术官,审议云南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区块链产业发展规划和支持区块链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等文件,研究“数字云南”总体构架、制度设计和发展思路等方向性重大问题,制定建设“数字云南”三年行动计划,聚焦公共云、智慧旅游、智慧政务、智能制造、数字农业和数字经济开发区等重点领域,推动“数字云南”建设迅速开创新局面。^①2019年3月20日,2019“数字经济与云南创新增长”高端论坛暨云南数字经济研究院成立仪式在云南大学举行,这是云南省成立的首家数字经济研究机构和数字经济高端智库。2019年5月,云南省印发《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和《云南省区块链产业发展规划》。自此,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块链技术应用与创新有了具体而明确的指导性文件。2019年5月21日,2019腾讯全球数字生态大会在昆明召开。2019年6月19日,云南省召开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对政务云、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5G基础设施、数字小镇建设等重点项目和场景应用工作进行研究和部

^① 《阮成发主持召开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统一思想科学谋划 全力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云南日报》2019年2月20日,第1版。

署。^① 2019年7月19日至20日,2019年首届“数字云南”区块链国际论坛在昆明召开,在论坛会议上,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揭牌成立,并启动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基金。2019年11月,云南省成立“数字云南”展厅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建设“数字云南”展示中心,集中宣传展示云南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和突出成效,为建设“数字云南”和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凝聚共识。2020年3月3日,云南省召开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对云南省政务云、智慧教育建设等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② 2020年7月,云南省印发《云南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2年)》,系统谋划云南新基建“四新”工程,力争三年内,智慧交通、智慧能源、智慧旅游、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达到全国一流水平,云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进入全国领先行列。

三是“数字云南”建设拓展新领域。“数字云南”建设立足地方实际,聚焦行业前沿,以“政务云”建设为着力点,持续实施“云上云”行动,打通“信息孤岛”,不断拓展公共云、高速宽带、智慧旅游、智慧城市、智慧教育、智慧能源、数字医疗、数字农业、数字公安、数字交通、数字环保、数字林业、数字乡村和数字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应用领域。同时,国家禁毒大数据云南中心、中国林业大数据中心、中国林权交易(收储)中心、国家农业农村大数据云南分中心等一批国家级数据中心落户云南。此外,全国首个5G全场景智慧物流新装备孵化基地落户昆明,国家级数据中心项目落户曲靖经开区。云南首款线路巡检机器人在高原气候环境下成功开展首次高压带电巡检试验,云南省首个公共资源交易区块链服务平台“昆易链”正常运行。云南富民县政府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等签署协议,将共建“云果”产业“大脑”、共建数字农业生态圈。云南能投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腾云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将联合打造智慧化旅游出行系统。浪潮云南智能制造生产基地首台PC、服务器产品正式下线,这标志着数据中心所需全部硬件产品将实现本地生产、本地装配,真正打造“云南造”。

四是“数字云南”建设取得新成果。“一部手机”系列品牌已成为云南数字经济发展的鲜明标识和标杆产品,5G基础设施、数字小镇等重点项目及“刷脸”工程、场景应用频传捷报,全国首家省级区块链中心落地云南,全国首个省级区块链溯源应用“孔雀码”、全国首张区块链电子冠名发票、全省首个咖啡产业区块链集成系统“咖啡链”和“昆易链”、“文山三七码”以及“区块链+”应用悉数亮相,各州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智慧化应用各具特色,如玉溪市的区块链产业金融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文山州的云南白药数字三七产业平台正式启用,等等。这些都充分表明:“数字云南”建设结出了丰硕成果。

二、“数字云南”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数字云南”建设的战略定位尚未厘清

数字中国建设提出后,全国各省市纷纷结合实际,明确作出各自在数字中国建设中的战略定位。例如,北京要建设全国数字经济先导区、示范区和数字贸易试验区、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打造数字经济高地;浙江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打造以“互联网+”科创高地为引领的创新策源地;四川要建设全国领先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贵州要打造“中国数谷”和“中国智谷”,建设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和数字中国建设的示范区。云南省尽管也提出“把云南省建成新技术试验场”和“把云南打造成为区块链技术应用高地”以及“把云南省建设

^① 《阮成发主持召开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突出重点 破解难题 推动“数字云南”建设取得新突破》,《云南日报》2019年6月20日,第1版。

^② 《阮成发主持召开建设“数字云南”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强调:坚持应用导向 加快数据共享 持续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云南日报》2020年3月4日,第1版。

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经济示范区”的目标，但是，这更多是概念层面的，对于云南在数字中国建设国家战略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目标任务、优势条件、制约因素、产业支撑以及核心竞争力等问题，还缺乏系统研究与论证，而是否厘清“数字云南”建设的战略定位决定着云南在未来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中能否塑造竞争优势和赢得发展主动，是至关重要的发展战略问题。

（二）“数字云南”建设的数字基础尚未夯实

“十三五”时期，云南省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特别是持续深入实施“五网”建设以来，云南省的信息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加强。总体来说，全省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依然不足，缺乏强力后劲，骨干网、城域网和接入网 IPv6 升级改造尚未全面完成，4G、5G 通信基础设施及物联网建设还存在较大短板，通信管道资源开放共享程度普遍偏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水平和服务能力较低，关键数字设施建设还存在薄弱环节，导致数字经济与三大产业融合的程度不深、活力不足、质量不高，这些都是制约“数字云南”建设的基础性问题。

（三）“数字云南”建设的核心技术尚未过硬

长期以来，云南省工业产业主要依靠冶炼、建材、烟草、医药等行业支撑，产业链条短，产品处于价值链末端，附加值低，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装备制造、新材料、信息等新型工业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特别是信息技术研发起步较晚，全省在核心芯片、基础软件、关键器件等领域的研发能力十分薄弱，“缺芯少魂”现象也十分突出，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研发能力较弱，数字经济相关核心技术积累不足、竞争力不强，难以有效形成“数字云南”建设的技术架构体系，更缺乏赢得竞争优势的“硬核”技术，而这又是制约“数字云南”建设的关键性问题。

（四）“数字云南”建设的数字资产尚未盘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确立为新的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活动中，数据将改变经济增长的逻辑，数据要由市场评价贡献，并要由贡献决定报酬，就必须实现“数据确权”，才能更好地实现数据的公开、共享和交易，进而实现数据的真正价值。推动“数字云南”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绕不开数据“聚通用”，也离不开数据“生产要素”。当前，云南省“一网通办”标准化体系、安全保障体系和运营管理体系建设相对迟滞，难以实现数据资源汇聚融通和数据价值挖掘，也难以实现“数据确权”、形成“数字资产”并对“数字资产”进行公开、共享和交易。可以说，“数字资产”能否有效盘活，是影响云南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智慧化应用成效的现实问题。

三、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数字云南”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进一步厘清“数字云南”的战略定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描绘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发展蓝图，明确了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也必须是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也就是经济发展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则是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乃至本世纪中叶前，如果要进一步厘清云南在数字中国建设中居于什么样的发展方位和战略地位，云南省就应组建高规格的“数字云南”建设发展研究机构，吸纳全省以及全国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成立高端智库，组成研究团队，开展“数字云南”课题研究，跟踪“数字云南”建设进展，总结经验成效，梳理存在问题，系统论证并厘清“数字云南”建设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目标任务、产业支撑、思路举措等。

（二）进一步夯实全省新旧数字基础设施

云南作为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相较中、东部地区以及周边省份而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是

不争的事实，要在“十四五”时期，赢得数字经济发展先机，开创新发展格局，就应加快补齐传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弱项，推动传统数字基础设施升级，缩小各州市之间的“数字鸿沟”。特别是加快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全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数字云南”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和协同推进，发挥全省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财力、物力、智力，有分类、有步骤地推进“数字云南”建设在各州市全面落地，对发展基础条件较好的昆明、玉溪等州市，加快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满格云南”建设全面实施；对发展基础条件较差的迪庆、怒江等州市，加快推进传统数字基础设施升级，推动“宽带云南”建设全面覆盖；对其他州市，加快推进“光网云南”建设全面通达，避免“撒胡椒面”式的建设，降低盲目、重复投资建设带来的风险。

（三）进一步补齐数字新基建核心技术短板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必须向科技创新要动力。因而，“数字云南”建设中数字新基建核心技术的弱项就必须强化、短板就必须补齐。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促进信息技术科研攻关和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充分调动政产学研各方力量，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重点实验室、研究机构的研发资源优势，建设数字经济工程实验室，促进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加强与国内顶级科研机构和高新企业战略合作，提升对核心芯片、基础软件、关键器件及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硬件产品制造、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等研发能力与水平，不断增强云南数字经济的产业核心竞争力；准确把握“大数据+”“+大数据”两个方向，发挥云南在区块链技术应用领域的先发优势，深耕“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蓝海，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引进发展一批潜力大成长性好的高新科技企业，研究推进一批关键技术和拳头产品。此外，在各行业应用一批可复制、可借鉴、市场空间广、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融合关键技术和软件产品，为“云南智造”“智慧云南”奠定坚实基础。

（四）进一步盘活政务大数据汇聚形成的数字资产

“数字云南”建设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实现数字资产的增值增效，这就必须充分发挥好数据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因此，云南省应加快构建“云上云”全省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规范和统一各州市政府政务服务平台，促进政务服务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应尽快开展《云南省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的地方立法工作，推动全省政府数据资源汇聚、共享开放和融通应用，有序推进数据清洗加工基地建设，不断提升海量数据挖掘与大数据分析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应加快探索数据产权制度，推动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地方立法工作，建立数据产权保护与利用新机制，逐步实现“政用大数据”“商用大数据”和“民用大数据”的“数据价值化”，形成“数字云南”的“数字红利”；应大力拓展“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应用场景，探索构建“区块链+大数据”应用标准体系，建设区块链数字资产交易平台，或依托国内现有大数据交易场所开展数据交易，积极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应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行动，制订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行动方案，加快推动云南打造世界一流“三张牌”的步伐，进而更好地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数字经济打通国内大循环、融入国际大循环，有效拉动内需和促进消费，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李亚强

多语生活背景下的语言扶贫实践

李志凌

(云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我国的扶贫工作进入精准扶贫、全面脱贫阶段,更加要求治理措施的精准落实和切实有效,更强调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语言扶贫是实施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面对贫困对象复杂的语言生活事实,更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充分认识到多语贫困地区的现实需求,以及语言扶贫所能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之后,我们支持采用“推通语、保本语、学外语”的三级语言扶贫机制,在推普扶贫的主要工作基础上,发掘非通用语(主要指民族语、汉语方言、外语)的地方性建设作用,聚焦三大核心问题,即精准落实语言问题识别、语言资源供需、彻底退出机制。

关键词:多语生活;语言扶贫;精准;需求;聚焦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20)04-0016-09

一、引言

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于2018年1月下发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指出,消解贫困的有力措施须“以补齐教育短板为突破口”。贫困地区的教育短板主要体现在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意识滞后,以及教育实施手段不科学等几个方面。在现实的扶贫事业中,经济援助是最直接有效、立竿见影的举措,但从根本上解决贫困、杜绝返贫需要借助更深层次的措施。教育是能够阻断贫困状态共时扩散和代际传递的有力手段,可使帮扶对象真正脱离贫困圈。扶贫必须从“扶志”和“扶智”入手,打造贫困地区和人口的自我脱贫能力,从而减少其对外界的依赖,实现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扶贫工作的这两大关键都离不开教育的作用。只有通过知识传授、技能培训、文化传播,进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使扶贫对象真正掌握生活知识和生产技能,形成必要的价值认同,才能从根本上革除安于现状的消极意识,并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事业。

教育扶贫,语言先行。这一点基本已是扶贫工作者的共识,并在政策思想上也有所体现。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印发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提出“扶贫先扶智,扶智先通语”的理念,要让贫困地区群众具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沟通能力和应用能力,以提升普通话普及率为重点,将语言扶贫,尤其是推普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语言扶贫不仅要打通贫困地区和外界的交流通道,也要打通贫困群体与外界的交流隔膜。^①运用社会通

作者简介:李志凌,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多语生活与语言政策、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英汉语言对比等。

^① 戴先任:《“推普脱贫”是精准扶贫一个重要切入口》,《中国商报》2018年3月2日,第2版。

用语（简称“通语”）实现对外交流只是语言功能的一部分，涉及语言的工具性实用价值。此外，语言对学习者和使用者认知能力的提升、思想境界的丰富、态度意志上的改造等，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有着超越工具性能的价值。语言的作用体现在以人为中心的心理、意识、素养、文化等各个层面。这些正是致贫的人文性因素，是激发地区及个体劳动生产力的内在动因。

二、精准扶贫对象的多语生活事实

目前，我们的扶贫工作已进入全面脱贫、精准扶贫阶段。关注扶贫对象的具体问题，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实行精准扶助，避免粗放式的施治与援助，已成为当前攻坚阶段的重点。

国内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分布在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地区，当地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着多种多样的语言，包括少数民族语、汉语及其方言变体以及部分外语。以多民族省份的云南为例，当地居民使用的民族文字有22种；除回、满、水族通用汉语外，其余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语言使用类型主要有母语型、双语型、多语型和母语转用型四种。^①具体情况是：（1）单一母语为主型，如独龙、傣、藏、景颇、傈僳族等。（2）双语型，使用本民族语和汉语方言，如白、壮、纳西族等。（3）多语型，当地居民与周边民族有密切交往，需要使用三种以上的语言，除本民族语外，还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及汉语，如德昂、普米、布朗族等；也有一部分居民居住于边境口岸附近，因贸易往来、物资流通的需要，或者长期文化接触和社会人文渊源的关系，除了民族语、汉语以外，还涉及一些涉外的语言生活。（4）母语转用或过渡语型，如回、满、水族等，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母语而转用新的语言。根据相关统计，云南的15个世居少数民族中，几乎不存在只使用单一语种的民族，双语使用的情况占了绝大多数，通常为母语+汉语（主要是汉语的地方方言，而非普通话）；三语（母语+汉语+第三语言）使用群体也比较常见，除了独龙、景颇、基诺三个少数民族较为少见以外，所有世居少数民族都有使用三语的情况。在同族人口中，三语使用群体比例较高的分别是怒族（49.79%）、普米族（29.7%）和阿昌族（13.98%）。^②

另据调查，在云南的多个边境口岸地区，外语语种需求巨大，具有多语种交叉和地缘性的特征，至少有8种外语被用于商品贸易、宗教祭祀、拜亲访友、文化交流等活动，能够满足当地日常语言生活中99.4%的外语需求。“多语现象较为普遍，不同层次的多语言能力是边境口岸地区从业者的基本语言能力要求。”^③这些边境地区地处对外交流的窗口，很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有的刚刚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从需求程度和使用范围来看，英语、越南语、泰语、缅甸语和日语是云南境内的“关键外语语种”。

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语言状态主要体现在：共时语种多，偏重实用需求，因场所和功能不同，时常分化使用。一般情况下，民族语言是当地群众的第一语言，主要作为家庭生活、集体生产、与人沟通的交流工具；当地汉语方言主要用作外部交际工具，在集市、商场、饭店、医院、车站、工作单位等社会场所使用；虽然汉语方言是第二语言，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却是最重要的语言，使用比率达42%左右。^④普通话多在正式场合下使用，常出现在学校教育、外出公干、迎来送往、人事公关等场合。外语作为第三或第四种语言，使用情形与普通话既有类似，也有区别。一方面

① 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概况·语言文字》，2019年4月3日，2020年8月8日，http://www.yn.gov.cn/yn/gk/gk/201904/t20190403_96252.html，2020年8月8日。

② 王革：《“桥头堡”战略视野下的云南多语教育研究评述》，《英语研究》2015年第2期，第138—145页。

③ 张彪、彭庆华：《我国少数民族边境口岸地区外语需求调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3—108页。

④ 庄倩琳、杨彬楠：《关于云南省“直过民族”地区推广普通话的调研报告》，《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第4期，第72—78页。

是在学校教育、涉外业务等较为正式的场合里使用；一方面是在日常买卖、旅游向导、边贸业务、民事往来等对外交际与合作中使用。虽然普通话与外语的使用场域相对狭小，但依然是当地民众多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显然，多语生活是一部分贫困地区和人口的现实生存状态，与当地民众的日常活动息息相关，这种情况对其经济生活的影响有利有弊，正是扶贫工作中应予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三、语言扶贫的现实需求

美国学者乔纳森·普尔（Jonathan Pool）在考察了133个国家后得出一个结论：语言状况与个体经济和国家经济发展有高度的相关性。“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因此，语言统一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性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条件（这是指描述上的，不是因果关系上的）。^①人们普遍认为，语言具有文化属性，是一种软实力。但人们发现语言与经济的关系之后，便会进一步认识到，语言同样是一种硬实力。语言扶贫是针对社会实际问题，有目的地发挥语言的特殊作用，参与经济建设。语言对于贫困治理的积极作用是有现实之需作为依据的。

（一）语言参与经济生活的实用之需

调查中发现，多语地区的群众语码转换频繁。由于工作、生活和教育等因素的主、客观需求，人们经常变换交际语言和工具语言。尽管这样的语言变换是为了适应交流，但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需求达成度也不高。当地群众虽然能够做些多语种的交流，但没有经过系统学习，相关的语言文化知识主要来自生活经验，缺乏对语言技能的专门认知；很多交际事件的发生比较单一化，信息链短，交际内容缺乏发散性和连续性；沟通方式仅停留在口耳相传、简单重复的基础性水平。这种状态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地方经济的粗放式发展和零散式结构，也没有为家庭和个人带来开放的创收途径，并演变为稳定的收入来源。

譬如，地方的农林产品、民间工艺品及特色文化产品由于没有恰当的名称和描述传统，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提炼和对外宣传，在市场化运作中只能被动式适应，等待机会由别人找上门，偶遇兴趣合作者。这种等、靠、要的生产经营方式极大地抑制着当地人的自主谋生意识和创新能力。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为例，当地有着良好的畜牧业资源，牦牛的肉食加工和皮毛制品吸引了外国商人的兴趣，曾有美国阿拉斯加的商户想与当地民众搞产业合作，将牦牛土特产加工出口至国外市场，但在尝试了几次小额项目合作之后，双方逐渐发现在合作意愿上难以达成一致，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影响商谈效率，无法促进开发规模效应，致使项目后续业务拓展受阻，最终不得不在进行几次小规模买卖业务之后停止该项目。“我们本来有很好的产品设计，”美国商人布莱特·克雷奇（Brett Collage）受访时表示，“当地牧民也很友善，但我们之间缺乏很好的沟通，难以随时保持密切联系，直接的业务洽谈几乎不可能，导致许多想法难以付诸实施，为此耽误了不少时间，损失了几次有利的市场商机。这是挺遗憾的事情，双方都很无奈。”这个案例说明，即使双方在产品供给和市场需求上都已具备必要条件，但是如果人力合作中出现沟通不到位，无法彼此理解，满足各自的利益关切，同样会影响到一个项目的执行效果和持续性进程。在这其中，语言是最直接的沟通工具，深刻影响着招商引资成效和社会生产活动质量。如果有足够的语言人才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不至于损失大量的机会。

（二）语言参与文化生活的“无用”之用

语言因其特有的信息传播功能和人际交往作用而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征（sociability），这种工

^① Pool Jonatha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Diversity,” in Joshua A. Fishman, ed., *Advance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no. 2 (1972), pp. 213–230.

具特点在现实生活中立竿见影，因而是显性的，其实用性作用（practicability）容易被人们关注到。语言扶贫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帮助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提高语言应用能力。比如，有针对性地推广一些语言资讯，如产品名称、行业术语、技术概念、市场情况介绍等，或帮助人们在生活场景中掌握更好的沟通方法和技巧等。除了这些实用的语言技能之外，语言还有深刻的文化教育功能，如知识功能、情感功能、思维功能、行为调节功能等。但是，这些功能不容易在具体事件中体现出来，而是隐藏于个人的思维活动和情感世界中，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的积累成果。语言通过对物质世界的抽象和隐喻化过程，对人的思维意志和精神力量产生持续和辐射的作用，在 worldview、价值观塑造，以及情感、认知方面的影响尤其如此。这些看似不着实际、近期效益不明显的“无用”之处，正是语言的大用所在。

语言能力是人获得其他生存能力的基础，是推动个人融入时代、进入群体、深度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习得和发展在人的成长历程里，尤其是在文化生活中起着一种类似于远景投资的作用。然而，贫困者对语言的这种“虚化”功能却不一定有所认识，甚至会有所排斥。柯亨（Cohen）曾证实，复杂语码和局限语码与经济社会地位有密切的关系：具有高经济社会地位的人倾向于习得并使用复杂的语码，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则倾向于习得和使用局限语码。^① 伯恩斯坦（Bernstein）指出，“社会关系形式选择语码的种类，然后该语码成为社会关系的代表，进而调节交谈的性质。简言之，社会关系形式的影响由语码通过言语计划功能传递并维持在心理上。”^② 人们使用的语码越复杂，代表着其对更多语言资源的占有和更为自觉的语言意识，这是受教育程度的表现，是文化生活丰富程度的表现，也是个人和群体社会化程度的表现。

（三）语言能力是摆脱贫困的生存技能

一般情况下，贫困者更倾向于掌握触手可及的实惠和便利事物，只要能力和生存条件（如基本语汇和交际方式）能够满足眼前所需，便不愿意多花精力去使用不切实际的东西（如新语言、多重语码、更复杂的话语技巧等）。除了资金和物质条件的匮乏，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对眼前的生存状态过度依赖，对远景任务（如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劳动力改造、教育投资等）的关注度不高，对长期智力投资的主动意识不强，心理认同度不高。阿帕杜莱（Appadurai）对此有明确的评价，贫困往往钝化人们的渴望，使他们弱化甚至丧失抓住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机遇的能力。^③ 穆莱纳森（Mullainathan）和沙斐尔（Shafir）在《稀缺：我们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2013）一书中提出了导致贫困的“稀缺理论”（scarcity）。所谓稀缺，就是影响贫困者的诸多缺失，包括物资缺失、心理缺失、认识缺位等。作者认为稀缺导致人们的认知能力下降，削弱人们的分析、判断和逻辑推理能力。稀缺心态是导致贫困者能力贫弱的主要原因。^④ 这和其他学者的看法十分相似。有国内学者同样认为，“穷人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力更弱。他们的脑中装满了‘稀缺’，就没那么多心思去想其他事了。穷人不仅缺钱，更缺带宽。”（王春辉，2019）^⑤

尽管语言问题处于贫困人口认知系统和心理关注的远端，但改善生计与提升生活质量的方式发生改变时，语言问题的关键作用就有可能显现出来。比如，当群众面临异地搬迁扶贫、转移就

① Rosalie Cohen, “Language and the Structure of Poverty”, *Sociological Focus*, 1969, no. 2 (1990), pp. 53 – 66.

② Basil Bernstein, “Elaborated and Restricted Codes: Their Social Origins and Some Consequenc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6, no. 6 (1964), pp. 55 – 69.

③ Argon Appadurai, “The Capacity to Aspire: Culture and the Terms of Recognition,” in V. Rao and M. Walton eds., *Culture and Public Action*.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2004, p. 134.

④ Mullainathan Sendhil and Eldar Shafir. *Scarcity: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3, p. 162.

⑤ 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第12—21页。

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科技扶贫等改变生存状态的情况的时候,必然面对人口流动、地域迁徙和社会生活多元化的问题,需要更多地通过语言媒介去获取信息,认识环境,接触不同的人群,增大人际交往面,这时,语言的作用就从远端走到了近前,成为不得不依赖的一种必要的生存能力。

贫困状态下产生的语言需求既反映了客观事实,又可以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实际目标,变为行动方向。李宇明指出,语言可以扶贫,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与互联网的密切关系,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①正是由于语言与人力素质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语言扶贫手段成为长效整治、全面脱贫的一个关键所在。

四、语言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社会效益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关注语言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在语言同质化程度对经济的影响效果上,人们的认识存在差异。

最早研究语言经济的国外学者费舍曼·霍沙(Fishman Hoshua)认为,“一般说来,比起语言异质性,语言同质性往往更多地与国家的‘好的’和‘合意的’特征相联。语言上同质的国家往往在经济上更发达,教育上更先进,政治上更现代化,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更稳定和牢固。”^②这个观点后来得到了丹尼尔·奈托(Daniel Nettle)的支持,并总结出了“费舍曼—普尔假说”(Fishman - Pool Hypothesis),认为语言统一性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语言多样性则与经济发展成负相关。^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假说具有普遍的合理性。丹麦、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本,社会资本指数较高,但国内语言单一。乌干达、印度等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另外,从世界语言格局来看,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或区域,濒危语言消亡的速度越快。也就是说,小语种、小规模的语言变体、方言会受到经济发展程度的冲击。这刚好说明,社会经济整体越发达,语言一致性程度越高。

不过,语言的同质性、单一性对经济的正向推动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也有例外和特殊情况,并非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中国东部及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同时也是语言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区,官方通用的普通话和民间普及度高的吴、粤、闽等地方方言以及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多种外语,共同构成了该地区丰富的语言生活形态,也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发动机。所以,中国社会的语言经济状况是对“费舍曼—普尔假说”的有力补正。多语生活不一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弊端,反而可能是区域特色经济富有活力的一种表现。我们在中国看到了这种特殊性。

努力提高通语的普及率是脱贫攻坚的一个治本之策。国务院、国家语委、教育部相继颁发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201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2017年),以及《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2018年)等官方文件,越来越清晰地强调了扶贫工作中推广国家通用语——普通话的重要意义。在贫困地区推广普通话,瞄准了当地社区和贫困人口与主流社会经济结构及运作模式不相适应,未能完全接轨同时代文化的本质问题,抓住了国内语言扶贫工作的关键和核心内容。它能够有效破除经济语言文化障碍,解除信息不通、交际不畅的束缚,减少社会分化和意识冲突,增强人员物资的流通性,扩大贸易市场和就业渠道,吸引社会关注,活跃市场经济,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

① 李宇明:《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语言文字周报》2018年8月1日,第1版。

② Joshua A. Fishman, “Some Contrasts between Linguistically Homogeneous and Linguistically Heterogeneous Politics”,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36, no. 2 (1966), pp. 146 - 158.

③ Daniel Nettle, “Linguistic Fragmentat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 Fishman - Pool Hypothesis Reexam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vol. 4, no. 2 (2000), pp. 335 - 348.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曾根据中国的区域经济和人文状况,从东北的黑龙江黑河至西南的云南腾冲划了一条分界线,后世称之为“胡焕庸线”。在这条界线以东,是较为富裕的地区,居住着全国90%以上的人口;此线以西经济欠发达,居住着10%的人口,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中有11个分布于此。这些贫困地区语言生态复杂,方言、少数民族语众多,地方文化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普通话普及率较低。语言不统一,加上复杂的地理环境,抑制了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加了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交流障碍,加重了因沟通不畅导致的信任负担,降低了彼此间的文化认同与协调合作,妨碍了区域链的连片发展和实力整合。可以说,推广普通话,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经济文化整合,带动贫困地区和人口在“语同音”的基础上,实现与国家经济命脉的紧密联系,快速加入富民强国的社会建设大潮,成功走完百年目标的“最后一公里”。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我国大片区域,尤其是扶贫地区处于多语共存的文化生态这个事实。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文化悠久,方言、民族语种类繁多,东、西、南、北彼此相异的地理文化格局明显,难以形成整齐划一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这成了语言统一、社会同质化发展的一种障碍,但也成了难能可贵的社会财富。“语言多样性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学术研究资源,同时是一种潜在的经济资源。”^①语言的经济价值与言语社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高度相关。“在特定言语社区中,流通度越广、使用频率越高的语言其经济价值往往越高。”^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种语言至少传承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成就,蕴含着深厚的人文价值。文化被认为是技术和制度之外,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三大力量。^③语言无疑能推动文化创造出经济价值。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社会意义来看,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少数民族所掌握的外语,同样是符合地方社会经济特点和民众文化心理需求的生存工具,尤其特殊的语言价值,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和特定领域内甚至是优势语和支配语。譬如,一些传统技艺中保留了大量的行话、术语和艺术思想,非其他语言可以完全地转写和译释。在技术传承和文化保存上,原有的民族语、方言就是活的化石,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许多扶贫工作者深有体会,与当地百姓交流时,最好能懂得他们的语言,这样才能把“家常”拉好,把政策思想给乡亲讲清讲透。“同说方言土语,能够让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更好地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所以,扶贫干部要用好土话,在用土话和贫困群众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拉近与贫困群众的关系,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④

多语能力带给劳动者的不只是丰富的生活形态,还能实实在在地创造经济财富。加拿大语言经济学家吉斯·格雷尼尔(Gilles Grenier)指出,一个社会所能容纳的语言越多,该社会成员的福利越高。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使该社会可提供的产品数量与类型得到增长。^⑤在广西东兴市边境居民的全样本调研中,研究者也发现,边民的多语能力与其年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推广普通话又是借助发展人口语言能力推进边民脱贫的有效举措。^⑥在这样的背景下,单语(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单语者)单言(只会本地方言)对于个体和社区经济收入会产生消极影响。^⑦学会通用语,

① 王海兰:《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分析》,《制度经济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66—179页。

② 王海兰:《国内经济学视角语言与贫困研究的现状与思考》,《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1期,第34—43页。

③ Philippe Aghion and Peter W. Howitt, “The Economics of Growth”,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④ 沈道远:《干部扶贫要先闯“语言关”》,2017年6月9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0609/c409497-29329986.html>, 2020年7月30日。

⑤ [加]吉斯·格雷尼尔:《论语言及其多样性的经济价值》,刘国辉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34—39页。

⑥ 卞成林、刘金林、阳柳艳:《中越边境居民语言能力与经济收入关系研究:以广西东兴市为例》,《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第55—66页。

⑦ 王春辉:《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1期,第12—21页。

进而成为“双言双语者”^①，甚至多语者，将对经济收入产生积极作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优势，通用语有广泛的交际意义和工具作用，能够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双语或多语能力使地方生活更具活力，能够实现更多的经济本地化，发挥地方文化的优势。语言能力就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它对个人及语言群体的改造之功不可小觑。正是因为语言意识的增强、语言能力（包括语码转换能力）的提升，语言使用者的应用能力才能够获得拓展，能够充分利用好语言带来的资源和优势。

综上所述，对我国的语言扶贫工作需要有两方面的认识：一方面要大力抓好普通话的推广，争取语言同质性为社会和个人财富带来的最大红利；另一方面是利用好语言多样性所具有的地方经济活力，以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区域性、民族性特点，使宏观经济调控更适应微观经济需求和发展模式，更具有地方特色和人文关怀。这是由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语言扶贫的核心工作是促进普通话的普及，但“语言扶贫工作的外延要大于推普扶贫”^②，这个外延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开发和利用语言多样性所能创造出来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

五、多语背景下的语言扶贫机制

语言扶贫不是一个空想的脱贫理念，而是可以落实于实践中的具体行动。结合多语生态的现实背景，脱贫攻坚的语言施治有自身特有的答题方式。

（一）推通语、保本语、学外语的三级语言扶贫机制

推广普通话是全国扶贫工作中以国家方案方式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2017〕）。然而，根据我国已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语言调查，普通话的整体普及率仍然不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西部十二省（区、市）的平均普及率仅为39.2%，云、贵、川三省分别为37.9%、33.9%、37.5%。城镇居民中能够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者占人口总数的66.03%，县乡相应人口比为45.05%，贫困人口集中的县乡仍是推普工作的重点。因而，推普的意义重大，应从内外两方面入手。外部需做好氛围营造和环境引导，用政策宣传、公益播放、文教培训、艺术汇演等方式向民众普及学习、使用普通话的意义，丰富汉语的媒体传播形式和应用场所；内部则是对扶贫对象进行专门的语言教育和帮扶。

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由于生存环境的关系，民族语和汉语方言可能早于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融入社会生活中，参与了大量的生产建设，与百姓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成为重要的社会财富和区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对于这些语言种类，不能加以取代和挤压。语言的生存和灭亡有其自身规律，我们必须尊重这种规律，不以人为因素破坏语言价值，而应因势利导，维护其用，这在社会语言工作中尤为重要。民族语和方言的保护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文化政策。双语学校、民汉双语文献的保存、民族语地方广播电视台的开办等，就是从正规国民教育、官方行政窗口和民间社会力量等多个渠道，对非通用语进行的文化保护。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语言价值不是固定的，不能是一种单纯的消耗品，而应该成为价值增长点。如果仅用保护的措施来体现对语言的重视，而不重视开发其实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就起不到参与社会建设、创造经济价值的作用，只能起到“护短”的效果。非通用语应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既在地方、族群、家庭生活中起到亲密沟通、联络情感、维系社会关系的作用，又进入到商贸往来、旅游服务、农业生产、文化传播等行业中，发挥工作语言的功能。

以扶贫工作为背景的多语环境下，外语的首要功能是在对外经济生活中发挥语言沟通的作用，

① 李宇明：《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政策》，《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14年第6期，第1—4页。

② 江婕：《推普如何扶贫》，《社科纵横》2019年第12期，第64—69页。

这一点在边境口岸贸易和旅游服务行业较多的地区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地群众学习掌握一些外语的交际话语、服务用语、行业术语等,有利于与外商客户主动合作,自我推销,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和合作关系。除此以外,外语能力对人综合素质的构建作用也不可忽视。也就是说,学习一门语言,不能只盯着它的实用之处,这样容易让语言习得变成一种功利的行为,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素质能力。外语学习过程涉及语音、词汇、语法、篇章、修辞等众多的语言结构知识,学习者通过教学训练、跨文化比较等方式,除了掌握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之外,也能获得丰富的人文知识,更好地认识自我,加深对母语文化和成长地域的认知,培养起良好的交际意识、表达能力、信息加工与记忆等方面的能力,而且有利于养成主动交流、大方开朗的性格,这对于学习者未来积极融入社会,接纳陌生事物,形成开放包容的心态,树立国际意识等,都有良好的作用。总之,外语学习也是促进人的智力增长、性格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过程。

因此,多语地区的语言扶贫工作应该由推广普及普通话,保留并充分使用好扶贫地区和扶贫对象长期使用和习惯的本民族语、地方方言,以及学习一定程度的外语三个维度组成,也就是实施“推通语、保本语、学外语”的三级语言扶贫机制。为此,教育、卫生、交通、旅游、广播、电视、网络等公共事业部门应该成为推广、学习、使用普通话的主要场域,并且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可由地方政府部门、社区村委会设立推普办公室或语言扶贫攻关小组,发挥政府机关、新闻媒体、教育部门、服务行业等四大社会窗口的引领示范作用。

(二) 语言扶贫的精准三聚焦

中国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五大突出问题:(1)谋生技能单一且层次不高;(2)就业渠道狭窄,机会探索与把握能力不强;(3)改变生活现状的意志和需求不强;(4)生活环境基础条件差;(4)教育资源不足,教学质量偏低;(5)医疗卫生条件不佳。针对于此,语言扶贫工作应从实际需求和问题症结出发,采用精准的语言措施加以治理,改变贫困状态。

为什么要强调“精准”?扶贫对象的致贫原因及增富办法有共性、同质性,也有差异性和特殊性,这一点在语言方面也不例外。精准的语言施治行为,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集中精力,提供教育资源和智力援助,解决扶贫对象最迫切的智力刚需,从而保障脱贫的时间优势和根本效益。

如何实施精准的语言扶贫?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湘西考察时作出了重要指示,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对于这个问题,指示中的前半部分已给出了答案和要求,即“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相应的对策和针对性方法;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个体的致贫原因,提供具体的帮扶和解决措施;根据问题的具体情况,提供整治意见、建议和办法。精准不但要针对地域、社区、村寨、家庭,还要针对精准的扶贫方式和手段,针对扶贫的精准领域,达到精准的效果。根据多语地区语言生态复杂,社会文化形态多样的特点,语言扶贫应做到三个“精准聚焦”,即聚焦问题识别、聚焦资源供需、聚焦彻底退出。

1. 精准聚焦语言问题识别

语言问题是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下的语言问题又有超越语言本体(音形结构、意义、使用法则与规律等)的诸多特殊性,比如语言发展的社会历史特征、与其他语言之间的共时比较与接触关系、语言政策的落实效果、语言行为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语言经济与文化价值、语言社团与语言个体的能量(力)潜势等。归纳起来,语言扶贫所关注的问题有两大类:一是语言与致贫有怎样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二是语言力量如何促进脱贫。为此,语言扶贫应从诊断复杂和关键的语言症结问题入手,一方面查找语言致贫的可能原因,另一方面探索能够利用语言手段解决贫困的措施和办法。

2. 精准聚焦语言资源供需

精准语言扶贫应重点关注三类人员的语言需求,并提供相应的语言帮助:

其一是语言种类掌握比较单一的人群,主要是指仅使用自身民族语或当地方言的单语人群。这样的人群可能因为习惯于单一的生活用语,缺少足够丰富的语言知识,缺乏多语意识和文化比较概念,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经验匮乏,较难走出生活圈并在语言生活中取得优势。他们的语言需求就是多掌握一点语言知识,能够听懂、会讲“他语”,以方便他们走出熟悉的生活圈子,在跨地域流动或移民过程中融入新环境。这类扶贫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帮助这类人群熟悉普通话和汉语方言,使其掌握基本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了解区域性的语言生活常识。

其二是有机会参与对外交流的人群。这类人群在旅游、商贸、边境口岸、传统工艺传播等领域需要接触、使用到一部分外语。扶贫任务可以采用外语上门培训,学校开设外语课或辅导班等形式,对本地有外事经历的人员进行涉外活动指导,培养个别人员具备基本的跨语言交流和翻译能力,提供一些双语对照的日常用语读本或手册。

其三是对语言技能有深造需求的人群。这部分群众有一定的语言文化基础,需要通过更系统和深入的学习来认知世界、认识自己。语言课程是很好的学习途径,可以向他们推荐一些学习平台,用夜校、函授等方式进行语言文化课程教学,推荐使用手机、电脑作为主要的信息交流平台。

3. 精准聚焦彻底退出机制

扶贫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全面脱贫,确保每个公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和个人财富的增持。为此,语言扶贫必须精准解决每一个贫困县、乡、村、户、个人的语言困境,可以采用为其独立建档的方式,用纵比和横比的数据依据,找准贫困定位和脱贫指标。确保扶贫对象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语言能力,包括构建有利而稳定的语言交流与学习环境,提升群众对推普脱贫、语言扶贫的认同,并具备用语言打开生存空间、凭借语言创造更多机会的意识与能力,帮助个体培养良好的语言学习习惯和自我发展意识,最终使贫困对象彻底摆脱语言问题困扰,退出贫困圈。

六、结语

我国的扶贫工作已进入精准扶贫的攻坚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和具体,需要更为准确的施治策略和办法。语言扶贫亦是如此。针对贫困的语言改革手段,已经从最初的间接影响、分散发力,进入到如今的直接施治、集中发力、系统推进阶段。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扶贫对象的特殊性。多语环境下的生活状态,是国内贫困人口除单语群落式聚居以外的另一种常见情况,尤以多民族杂居地区、边境口岸地区常见。多语生活的特点之一是语言种类不一,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又各自发挥着特有的功能;一些非通用语在特殊场域内甚至具有支配语和优势语的作用,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我们的语言扶贫工作不仅可以创造重要的经济利益,也有着深厚的社会意义和人文意义,是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在完成国家通用语——普通话在贫困地区获得普及的主要任务之外,还必须关注非通用语的地方作用,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发挥多言多语的建设作用,做到既“抓大”也不“放小”。语言扶贫也许无法直接创造经济产值,但它对人力素质的培育作用却是深刻而无法替代的,它将更多地发挥智力作用,持续性地创造并巩固脱真贫、真脱贫的丰硕成果。

责任编辑:朱家麟

统战理论与实践

统一战线发挥制度优势推动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王寅平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统一战线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要求,是指导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依据。统战工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下的重要政治工作,是加强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机制,工作出发点和着眼点在于充分发挥政治制度优势,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在实践中全面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把贯彻落实统一战线基本方针、任务和工作优势与发挥政治制度的四个优势统一起来,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下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统战工作;同时,要发挥统一战线各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整合,增强一致性,形成治理合力;以基层统战工作为着力点,完善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相衔接的工作制度机制。

关键词:统一战线;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 D6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25-06

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势既包括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也包括全社会普遍一致价值的实现,特别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上的实现——国家治理效能,以及在这些方面的比较优势。实现政治长期稳定和社会和谐,促进经济社会长期较快较高质量发展,发挥相对于西方国家的比较优势,避免西方政治实践中存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是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我国的政治制度优势集中体现在以增强对国家的领导力、对各方面力量的整合力和对社会一致行动的动员力来增强政治一致性,同时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来包容社会多样性、增强社会活力,并使二者相统一,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统一战线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下做好统一战线工作。

一、发挥人民主体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的本质

一种制度是否具有优势,既要看制度的价值追求,也要看制度价值和功能的实现,还要看制度的比较优势。看一个国家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要从政治上、大的方面去评判和把握。从价值追求上看,邓小平曾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

作者简介: 王寅平,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处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共产党员》2014年第10期,第64页。

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①因此,促进发展、切实丰富实现人民普遍意愿的方式、充分调动全社会活力和人的积极性是我国制度的重要价值追求,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发展是根本。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制度的基本构成,其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政治上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在国家治理上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在社会各领域实现人民群众广泛有效参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反映了这些方面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范。如何认识和把握我国的政治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国的政治制度安排的“四个能够”^②,精辟概括了我国的政治制度优势,深刻阐明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和谐政治关系与保证政治稳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护国家利益与保证各族人民幸福生活方面的相统一,能够更好地保证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

社会主义民主是实现政治制度价值和功能的主要形式,是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基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用“八个能否”全面阐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民主性^③,也表明了我国政治制度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要求——从国家权力运行稳定、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与畅通利益表达、有效参与政治与科学民主决策、国家管理体系的活力、能力与法治要求等方面高度概括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要求,把维护政治稳定、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统一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要求上。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民主价值是抽象地建立在凌驾于政治制度之上的绝对个人自由和利益。工业化以来,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西方政治制度已经形成了与其初期相对进步的路径依赖,其本质是政治制度为形成资本的个人利益和财富服务,始终为资本及资本不断扩张攫取利润的权利服务,在理论上把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受绝对保护的强烈要求上升为国家和权力意志,把对扩张资本的追求抽象为追求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价值,并通过基本律法条文和规范程序来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对任何公共权力、社会集团利益、个人权利和利益的争取和实现都是竞争性的,而只有竞争赢家对权力、权利和利益的要求才是正当合法和受到保护的,政治制度维护这一过程。对比西方政治制度从属于保护绝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抽象化、形式化的价值和功能,中国政治制度的价值和功能是具体的、实践的、有一致目标的,发挥着在有效整合和充分合作前提下优化国家权力、凝聚共同价值追求、最广泛实现一致目标的重要作用。

二、贯彻落实好统一战线基本方针和任务是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着力点

国家治理效能反映在发挥制度优势、优化和实施国家治理体系的治理过程中。从现代化发展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对资本主义逻辑及其公共性国家权力与资本权利谁先谁后、谁主谁从地位颠倒的社会制度的一种矫治。^④这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的出发点。社会制度决定政治制度,反过来政治制度保证实现社会制度目标。我国政治制度是在党的领导这一根本领导制度下规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利,其效能集中体现在管理国家事务、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依法科学高效和积极作为。贯彻落实统一战线工作增强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基本方针,促进包括政党、民族、宗教、社会阶层、港澳台及海外侨胞关系在内的政治关系和谐的基本任务,发挥凝心聚力的政治优势,发扬包括协商民主在内社会主义民主,是加

^①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16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9月16日,第1版。

^③ 韩冬雪:《衡量国家治理绩效的根本标准》,《人民论坛》2014年第7期,第34—36页。

强党的政治领导、发挥政治制度优势、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发挥社会治理作用的重要着力点。

（一）促进政治关系和谐是发挥政治制度优势实现治理效能的重要任务

政治关系和谐要求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在治理上进行有效社会整合，在社会关系上有效协调利益、纾解矛盾。我国政治制度充分反映了基本政治关系和谐的要求和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国家政权的组织和运行上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人民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和谐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政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制上反映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参政的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和谐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坚持民族区域自治与增强国家共同体相统一上反映中国各民族的平等和谐关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吸收基层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实现自身利益的主体作用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群众之间以及基层人民群众与基层公共工作的和谐关系。政治关系和谐是多样化社会形态下——包括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的社会整合要求。社会整合既是社会参与的代表性的整合，增强有效参与；也是多样性社会利益和表达的整合，增强社会各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通过一定渠道和方式有效表达。基于和谐的社会政治关系和规范的社会整合，增强一元性政治基础，保证从政治根本到治理实践的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提高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效率，同时增强社会整体的治理参与作用。

（二）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促进政治和社会关系和谐的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明确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协商渠道，在国家和社会治理领域深入开展协商。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政协成立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表明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促进政治关系和谐，需要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下更好地实现。对政治关系和谐制度性的原则和要求，需要健全以促进社会各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充分表达来寻求最广泛一致性和最大包容性的协商民主制度和机制来实现。协商民主的基石——政治协商，加强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各方面代表在政治上团结合作，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政治领导，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致性，避免西方政治总是把权力竞争作为各政党、社会各方面最重要乃至唯一的政治追求，疏于履行对社会和民众的责任，以指责和反对政治竞争者为己任，总是造成各方面政治对立乃至社会分裂，始终囿于所谓“程序正当”和“简单多数”而流于形式。

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一重要论述拓展了协商民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上的意义。党的群众路线不仅要体现在加强党的群众路线工作要求上，还要体现在多样性社会形态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下社会各个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中，在参与和民主协商中体现群众工作。从提高党的治国理政水平上看，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党的各项工作要充分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实施与人民群众的期盼和谐一致，这种和谐一致需要通过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提高治理效能来实现，即需要通过促进各方面团结合作、履行共同治理责任的和谐政治关系来实现。治理协商和基层协商着力把公共权力、公共治理、公共利益和社会多样性利益等关系统一在履行治理责任的共同体中，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实现自身利益上的主体作用、在优化公共利益实现治理目标上的表达作用、在合力促进政策措施高效实施实现治理效能的参与作用。避免西方国家在社会治理中，公共治理和社会各方面利益始终在基本法律条条框框下不断竞争博弈，甚至利用法律实践的不健全以损害竞争对手的正当利益来实现和扩大自身利益，因利益关系的竞争对立导致社会关系紧张甚至撕裂，导致公共治理效能经常性地被社会各种竞争性的目标和要求所削弱，甚至由

于简单多数的非此即彼选择性票决方式使各方面正当合理的利益诉求对立化,促使公共治理只满足一部分利益要求而否定另一部分利益要求。

(三) 增强促进全社会一致的动员能力是提高治理效能的重要保证

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增强对全社会的动员能力和对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前提。通过对所联系社会群体的社会动员来增强政治代表性并发挥作用是一个政治组织的重要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全体人民的执政党担负着动员全社会和全体人民的责任,而动员能力是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对多样性社会结构政治生活的整合,即对能够发挥各种社会动员作用的社会政治力量整合的功能,形成对全社会动员的合力,即政治上形成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向心力,在国家治理上形成实现共同目标任务和履行共同责任的凝聚力,在社会治理上形成社会各方面广泛有效参与并提高公共治理效率的生机活力。竞争性政治的社会动员往往使社会关系紧张甚至对立,所以需要削弱促进全社会一致的动员。西方政治无论是执政力量还是与之竞争的反对力量,从政治竞争和对立的本质出发,争取民众对当政的政策和行动支持或反对的社会动员终究是局部的、分裂的、相互对立的,始终与促进全社会一致的动员相违背。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合作型政治关系要求促进各方面社会动员与促进全社会一致的动员相统一,各方面既担负着服务于促进全社会一致的动员的责任,又作为多样性社会结构的政治单元开展相对独立表达。从提高国家治理效能角度看,统一战线工作的最基本任务就是要从组织上和治理功能上促进各社会动员和代表性的表达单元在这两个方面作用的统一。

(四)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发挥政治制度优势提高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优势之一,也是反映国家和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方面。集中力量办大事,最重要的大事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事业、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大事、涉及最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普遍关切的大事。改革开放40多年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既充分体现在不断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上,也充分体现在不断实现社会民生任务上,体现在坚持宏观政策发挥集中资源推动全局性发展作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挥高效配置资源作用的统一,体现在坚持推进具有全局长远影响的国计民生项目建设与推进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社会民生项目建设的统一,体现在坚持党中央统揽全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集中领导与地方充分发挥地域资源人力优势、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统一。

民主集中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管理国家事务、推进国家事业发展方面的重要运行机制。民主集中制强调民主、科学决策,强调国家权力运行的集体性、决策过程的民主性、决策宗旨的人民性、决策目标的一致性、政策措施的明确性。民主集中制在统一战线层面的表现就是协商民主,就是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等协商制度,通过协商广泛凝聚共识、优化决策、形成最大公约数、增进团结合作,激发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正是统一战线发挥政治制度优势形成治理合力进而提高治理效能的着力点。

三、着眼于发挥政治制度优势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加强和做好统战工作

(一) 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指导,切实加强统战工作

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使形成统战工作合力与提高治理能力相统一,发挥统一战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重要作用,是统战工作创新和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和着力点。统一战线是党凝心聚力的政治优势,在“大团结、大联合”主题下扩展党领导下各个方面团结合作的半径,增强团结向心力,体现了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坚持大统

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推动统一战线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等,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要贯彻落实好。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重要要求,要切实抓好做好。

1. 加强统战工作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相统一。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和改进党对党外力量的政治领导既是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加强对党外力量的团结和政治引领,凝聚党的领导向心力,是党领导团结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统战工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加强统战工作的政治引领,要着眼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始终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保持一致,着力加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工作,着力引导和协同做好党外政治、组织建设等工作,着力发挥党外代表的积极作用。

2. 加强统战工作与党的群众路线要求相统一。统战工作是做争取人心的工作,争取人心既体现在引导人民群众的思想价值,也体现在实现人民群众利益,两者统一于工作要求中。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对象普遍呈现高知识化、非公有制化、新社会阶层化的特征,其社会性、社区性、群众性属性更加突出,统战工作的群众工作特点更加凸显。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是特殊群众工作,其特殊就特殊在统战对象在事业上和社会上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因而统战工作的政治性、思想性要求高。党的群众路线基本立足点是要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统一战线成员利益既有政治性、经济性的,也有思想性、价值性的,是人民群众多样性利益的不同形式,因而照顾同盟者利益是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统战工作要把政治引导与照顾利益相结合,政策措施与维护利益相结合,发挥作用与实现利益相结合。民族团结工作重心在基层,“各民族都是一家人,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集中体现了基层各族群众的共同利益,要紧密结合实现各族群众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共同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促进思想进步、和谐交往交流交融和团结互助。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引导信教群众宗教信仰与社会治理要求相适应、与在社会社区生活相和谐、与过上美好生活期盼相协调,符合信教群众利益。

3. 加强统战工作与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统一。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广泛有序的社会参与。通过党派和政协参加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是统一战线组织的政治参与,参与层次较高,参与渠道有限,不足以满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广泛多层治理参与要求和社会的广泛直接参与意愿。统战工作要从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上促进党外人士发挥作用,着力加强党外人士政治培养,以政治整合促进社会整合,加强对党外人士治理参与的推送,增强治理参与者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着力加强对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吸纳,扩大治理参与者的社会涵盖面,促进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着力加强对社会治理参与者的思想政治引导,加强团结合作,增强共同责任,为形成治理合力营造良好氛围。

(二) 落实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要求,切实做好统战工作

地方治理与民族宗教问题紧密联系,社会及基层治理与民族宗教因素交织,民族宗教工作份量重,基层工作责任大,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基本特征。统战工作要以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要求为导向,着力做好民族团结和宗教引导工作,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着力加强基层统战工作制度建设,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着力促进党外人士参与公共和社会治理,提高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

1. 落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要求,提高统战工作能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是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要求的重要方面,其重要性在于民族宗教工作本身既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工作内

容,又与解决其他方面问题综合在一起,甚至关系到工作大局。统战工作要抓关键。民族工作的关键是搞好团结,在思想上要增强国家意识、制度意识、法治意识、公共意识,在情感上要充分体现“各民族都是一家人”,在发展和民生上要促进“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在目标上要引导各族群众坚信党和政府、坚定跟党走。统战工作就是要在党的群众工作中更有针对性地增强这些意识、理念、信念。统战工作要重本质。宗教工作的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教育引导群众的最基本要求是讲道理、敬法律。引导宗教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及“合理、合法”,是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宗教活动要符合公共社会生活之“理”、遵循公共社会秩序之“法”。“合理”要求统战工作注重引导,始终避免偏离“理”的方向;“合法”要求统战工作注重预防,防止可能脱离“法”的轨道。

2. 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完善基层统战工作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综合性、协同性要求,包括社区的新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基层民族宗教工作在内的基层统战工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单元。“枫桥经验”告诉我们,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利益关系、处置矛盾的重心在基层,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基层群众,方法在基层群众中。基层统战工作制度建设要融入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完善相关功能,特别是政策性强的工作,如协调阶层关系、民族宗教关系、港澳台侨关系、化解有关矛盾方面,既要把握政策、加强工作指导,积极解决而不是淡化、回避问题,又要避免把问题标签化、政策条条化、复杂化。要在统战工作格局下明确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统战工作要求,以有利于基层统战工作制度建设,有利于统战工作模块嵌入到社会治理综合系统并发挥作用。要在社会治理综合系统中建立统战工作模块,如宗教工作的“一网两单”机制应该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信息、功能模块,嵌在社会治理体系的综合系统中,既要发挥模块的独立功能,更要发挥其在解决其他相关问题中的协同作用。

3. 促进民主科学决策,积极组织党外人士广泛参与。表达意见建议是社会参与治理协商的最重要形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党外人士广泛参与提供了条件,但通过体制性专门机构如政协参与治理协商的渠道有限,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步促进党外人士广泛参与治理协商并发挥作用。一方面,要完善治理体系的协商制度,特别是公共政策协商、社会和基层治理协商等制度,畅通社会参与,完善协商程序,充分体现协商对促进科学决策和实施的重要性,对协调和维护利益攸关方权益的重要性,对形成治理合力发挥参与者积极作用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统战工作要把对党外人士政治吸纳和培养与推送参与治理协商、发挥作用结合起来,在决策咨询与党外人士广泛建言献策之间起到桥梁纽带作用,协调党委政府介绍工作情况、征求意见建议,向党委政府推送党外人士意见建议,向各类公共治理协商组织方推送有相应能力和意愿的党外人士参与。

责任编辑:念兴昌

红河州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经验、问题及路径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蒙自 661199)

摘 要: 营商环境是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主要指标,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课题组基于对红河州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调研, 针对红河州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与制约因素, 提出红河州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路径要进一步深化认识, 解放思想, 从建设透明高效政务环境、竞争有序市场环境、公平正义法治环境、开放包容人文环境等方面着力, 破解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优化的制约因素, 更好地推进民营企业发展。

关键词: 红河州; 民营企业; 营商环境; 路径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31-08

改革开放至今, 我国民营经济实现从“0”到“56789”(民营企业税收贡献超 50%, 民间投资占比超 60%, 发明专利占比超 75%, 就业存量占比近 80%, 企业数量占比超 95%) 的成就^①, 成为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 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被提升到经济发展重要方略的高度。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经济下行压力过大, 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显得愈加紧迫和必要。2019 年, 红河州在云南省营商环境评估中位列第二, 但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基于此, 本课题组对红河州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做法、存在问题进行认真梳理, 进而提出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主要对策, 以期红河州党委政府提供咨询参考, 为民营企业发展尽绵薄之力。

本课题将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定义为: 影响民营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类因素的总和, 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两大要素。软环境主要包含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 硬环境主要包括道路交通、水电供给等基础设施。本课题研究范围界定在软环境方面。

一、红河州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主要举措与经验

(一) “放管服”改革推进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改善与优化

1. 简政放权,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2013 年至 2018 年, 州政府取消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154 项,

基金项目: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2019 年度立项课题“红河州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研究”(2019SYXTA05)。

作者简介: 郑建琼(主要执笔人),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科研管理科科长,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陶长虹,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科研管理科讲师, 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 张征, 泰国兰实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生, 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王小诺,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办公室讲师, 研究方向为经济管理; 李晶燕,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社会建设与公共管理教研室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法学。

^① 任泽平、马家进、罗志恒:《民营企业实现从 0 到 56789 的成就!》, 2019 年 10 月 14 日, https://www.sohu.com/a/346809926_114984, 2020 年 12 月 25 日。

下放县市实施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194 项；2019 年州政府又取消 6 项、承接 6 项，下放 1 项、调整 8 项，共 21 项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并通过云南机构编制网、红河州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①

2. 推进商事制度改革，优化市场环境。(1) 工商注册逐步便利化。2019 年 7 月 10 日，全州上线运行企业开办“一窗通”服务平台，实行开办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目前，全州企业开办 3 个工作日的目标已经实现。(2) 全面推进“证照分离”，解决“准入不准营”现象。截至 2019 年 10 月，全州累计办理的涉及 4 种改革事项企业登记业务的数量为 4442 件。(3) 持续推进“多证合一”改革。全国统一要求纳入的 24 个新整合事项已全部纳入。(4) 抓实收费清理改革，落实监管责任，提升监管水平。2019 年重点清理州、县市政府定价涉企业经营服务性收费清单，州本级政府定价的涉企业经营服务性收费项为 3 项，其中 13 个县市仅保留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 1 项。^②

3. 注重服务效能，优化政务环境。落实“一网、一门、一次”提升行动，提升政务服务效能。2019 年 45 家单位进驻州政务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式办理；全州“一部手机办事通”注册用户达 285468 人，累计受理业务办件量为 67360 件。^③

4. 建章立制，优化政策环境。为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州委、州政府先后制定出台《红河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关于进一步抓好政策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贯彻落实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10 条措施的实施意见》等重要政策，各县市亦相应出台贯彻落实的系列文件，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管委会也及时出台招商引资办法（试行）等，全州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

5. 抓好权益维护，优化法治环境。2019 年全州共出动执法人员 2722 人次，检查各类经营户 11462 户次；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立案 1 件；查处商标侵权假冒案件总数 46 件，案值达 20.79 万元，罚款金额 26.23 万元。其中，州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案件 243 件，审结 159 件；受理 13 家民营企业请求协调或投诉反映情况，13 件已办结。^④

（二）落实民营企业优惠扶持政策，推进营商环境改善与优化

1. 减轻企业税费，降低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并多次降低物流成本。2019 年 1 至 9 月，全州所辖收费公路累计减免鲜活农产品“绿通车”38.2 万辆，减免通行费 6423.9 万元；通过 ETC“云通卡”累计减免货运车辆通行费 110.94 万辆次共 2860.72 万元；累计减免冷链、甩挂运输车辆通行费 14.46 万辆次共 3116.29 万元。依法依规减降收费，如自 2016 年 1 月起，取消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工本费、车辆营运证工本费 2 项收费；每年减轻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约 70 万元，实现国际道路运输出入境运输证件办理“零收费”。^⑤

2. 落实土地、用电、用水等优惠政策，例如，降低民营企业生产要素成本。再如，降低用地成本方面，2019 年红河州工业用地基准地价调整比上一轮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下调 10% 以上，部分县市达到下调 20% 左右。提供用水、用气、用电等方面的便利与优惠，明确获得用水时限不超过

① 红河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红河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红河州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工作表〉的自检自查报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务服务管理局，2020 年，第 6 页。

② 红河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红河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红河州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工作表〉的自检自查报告》，第 7 页。

③ 红河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关于贯彻落实〈红河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红河州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工作表〉的自检自查报告》，第 7 页。

④ 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红河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红河州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工作表〉的工作情况报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2019 年，第 19 页。

⑤ 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红河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红河州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工作表〉的工作情况报告》，第 11 页、第 15 页。

12 个工作日；获得用气压缩至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程交验（通气）的时间，要求蒙自市区范围内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蒙自市区外及其余县市不超过 40 个工作日；办理用电业务平均时间压缩至 45 个工作日以内，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降低一般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2019 年预计减少一般工商业用电客户电费支出 2.25 亿元。^①

3. 多举措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大幅度降低担保费率。截至 2019 年 10 月，累计为 94 家小微企业及“三农”企业提供 129582 万元担保贷款，10 月末在保余额 56022.15 万元；共为 21 家企业减少担保费 323.82 万元。推进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搭建“银企桥”融资服务平台，深化“银、政、企”合作。2019 年，州融资担保公司累计办理新型政银担业务 22 笔，担保总额 3582 万元；全州金融机构累计对接民营和小微企业 1433 户，获贷户数 384 户，贷款金额 6.95 亿元。实行利率优惠、信用证融资、“网银贷”、免收抵押登记费等措施。至 2019 年 10 月，辖区银行业机构累计为 3847 户客户提供利率优惠，发放贷款 189.90 亿元，为客户降低利息成本 3.56 亿元。^②

通过以上举措，红河州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得以改善，民营经济得到较大发展。2019 年，全州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 1187.08 亿元，比上年增长 9.1%，占 GDP 的比重达 53.7%，比上年增加 1.7 个百分点。^③

二、红河州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制约因素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4 月，课题组对红河州 13 个县市的企业老板、企业管理层、企业办事人员发出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4 份，并对相关职能部门和民营企业进行访谈，较为全面地了解了红河州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基本情况和制约因素，主要体现为“五个差距”。

（一）部分领导干部认识上有差距

1. 对民营企业地位作用认识不到位，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服务企业及为企业排忧解难的紧迫感不强。有的领导干部对发展民营企业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认为民营经济是“配角”、是“补充”，对发展民营经济重视、支持不够，服务不到位，企业的许多实际困难得不到有效解决；有的领导干部思想观念落后，缺乏高标准、严要求，对工作研究不深不透，缺少推进工作的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有的领导干部对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把握不准、顾虑重重，不敢接触民营企业，怕惹麻烦，对企业搞“软拒绝”。

2.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未对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引起足够的重视。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需要强有力的牵头部门，但在实际工作中却由政务局作为牵头单位，造成“小马拉大车”的局面。

（二）“放管服”改革与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差距

1. 个别事项存在接不住、批不了、管不好等问题。比如行政审批的法律法规大多属于行业部门法，有些规定不一致，相互衔接不紧密，甚至互相“打架”；部门之间审批权限缺乏协同性，行政审批难以同步。有些部门只下放了部分事项，致使需要多部门共同审批的项目无法实现同级并联审批，导致审批效率下降；有些下放审批权的部门没有及时对本系统基层部门进行指导、培训和监督，导致个别下放的审批事项“接不住”“管不好”，审批效率、管理水平较低。

① 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红河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红河州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工作表〉的工作情况报告》，第 15 页。

② 红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红河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方案〉〈红河州营商环境提升十大行动工作表〉的工作情况报告》，第 3 页。

③ 红河州政府办：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2020 年 5 月 1 日，http://www.hh.gov.cn/zfxxgk/fdzdgknr/zfgzbg_15827/202005/t20200521_438323.html，2020 年 12 月 25 日。

2. 实体服务大厅办事能力不高。在办理事项过程中,还存在政务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不强、态度不好、办事效率不高的情况。问卷调查中,民营企业人员选择“一次性告知不够细致齐全,经常因一项手续往返多次”的共148人,占比52.1%,这说明当前红河州“一次性告知”落实不到位。

3. 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运行成效不明显。“一部手机办事通”宣传推广存在难度,用户体验上便捷度与期望值存在差距,兼容性与普适性存在差距;群众对进驻实体大厅事项网上申报程序掌握不够,网上申报事项比例较低;各部门在网上公布的各项信息不规范、不及时。

4. 部门衔接和信息互联共享不充分。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动态管理不及时,一些部门的审批事项合并、移交、下放不彻底,交叉管理事项仍然较多;各类政务服务事项有其特殊性,部门专业技术性较强,有各自的网络系统,政务服务平台难以整合,无法实行各类部门政务服务数据的有效对接,“信息孤岛”尚未完全消除。问卷调查中,42.6%的企业人员认为“部门衔接和信息互联共享还不充分”。

(三) 商事制度改革与构建公平市场环境有差距

1. 市场准入“非禁即入”原则贯彻落实不到位。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推进,容易改的已经改了,剩下难啃的“硬骨头”则存在实际与理论有差距的问题。如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理论上放宽了准入门槛,但实际运作中因土地、资金或审批环节等原因仍难以进入,各类营商主体公平竞争成为“口号”。

2. 监管弱、弱监管的问题比较突出。“重审批轻监管”的思想观念和“以审代管”的管理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监管错位、缺位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金融市场等重点领域,监管力度不足。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有59.2%的人认为“金融市场监管应加强,民间借贷、非法集资扰乱金融秩序”,这说明监管的力度远不能满足目前红河州经济发展的需要。

(四) 法规政策与优化民营企业法治环境有差距

1. 从制度层面看:法规政策不健全,操作性不强。首先,发展民营经济的相关立法与政策不足。现有法律与政策对民营企业的有效覆盖不足,加之法律与政策本身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导致其适用性与民营企业发展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其次,法规政策操作性不强。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虽然明确各级政府不得偏向某些企业或限制其他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能因为投资者所有制的性质、规模、盈利能力、所在地等而有所歧视,但没有具体细则;对民营企业融资难提出解决思路,但缺乏操作细则;等等。调查问卷中选择“法规政策不健全,缺乏中小微企业服务政策,小微企业孤掌难鸣”的共201人,占比70.8%;有60.6%的人认为“红河州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机构很难满足企业融资需求”,这说明红河州还存在法规政策不健全的问题,在金融方面对民营企业的优惠政策还不够全面。

2. 从法治保护执行层面看:推进民营企业法治保护依然滞后,不平等竞争依然存在。在行业准入方面,民营企业很难介入金融、邮政、通信、电力等行业和领域。调查在问到“您认为民营企业法治保护滞后,表现在哪些方面”时,选择“不平等竞争依然存在”的共120人,占比42.3%。在融资方面,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处于天然劣势。凡此种种,说明在现实中,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平等竞争仍然遭遇了现实的尴尬。民营经济法治保障监督相对疲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比较突出。调查中,43%的民营企业认为“对民营经济法治保障监督相对疲软”。法律法规宣传不到位,民营企业法律风险内控机制仍较为薄弱。问卷调查中,对于“贵企业出现商事纠纷时采用哪些解决方式”,选择“仲裁”“诉讼”法律途径的仅仅分别占到17.6%和33.1%,说明目前红河州不少民营企业法律意识不强,缺乏法律风险内控机制,在遇到纠纷时,不会首先选择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从政策执行层面看:重制定、轻执行问题突出,“三道门”现象依然存在。融资难和融资

贵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问卷调查中,对于“您认为政府在执行政策有‘折扣’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选择“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的共185人,占比65.1%;在走访中,大部分受访者在回答企业经营过程中的最大难点时都集中在融资难和融资贵方面,这也佐证了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的困难。减税降费未落到实处,表现在多缴退税办理难度大,上级下发的部分文件时间滞后于执行时间,造成部分文件执行依据不足;参保企业点多面广,企业人员流动性大,难以联系核准调减基数。行业准入、公共服务、政策扶持等方面仍有“三道门”现象^①,企业面临的困难得不到解决,甚至有企业反映“政府有赖皮现象”,拖欠民营企业工程款,等等。

(五) 社会人文与营造开放包容营商环境有差距

1. 构建共治机制方面。个别部门认为社会共治是职能部门的工作,因而未能形成长期有效、综合发力的治理态势;人口素质与城市发展不协调、不平衡,部分群众参与意识不强,认为社会共治是政府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流动人口急剧增加,给社会治安、道路交通带来的压力急剧增强,对城市决策管理者提出了治理方面的严峻考验。

2. 打造稳定安全公共环境方面。扫黑除恶与维护社会安全的任务还很艰巨,农产品市场欺行霸市、垄断经营等问题依然存在,给各类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方面仍需加大力度;入室盗窃、抢劫、强奸、杀人、寻衅滋事等社会治安问题不容忽视,需要加快构建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3. 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及城市规划布局水平不高,与人民群众的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4. 城市文化开放包容度方面。政府对城市文化在营商环境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出台的营商环境提升实施方案中,关于人文环境和城市文化方面的内容和措施少之又少;城市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打造城市文化过程中缺乏将红河州历史文化、民族特色文化与当代文化相结合的系统思考,缺少凸显红河特色的时代文化。

三、红河州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路径

(一) 进一步深化认识,解放思想,强化组织领导

1. 加强理论政策学习,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从理论与政策方面深刻认识优化红河州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认识不断深化,民营经济地位作用不断上升,对民营经济发展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是一贯的,并且是不断加强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民营经济发展也提出了系列重要论述。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学习,在党和国家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提升认识高度,增强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紧迫感、责任感,从实践层面深刻认识优化红河州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2018年,全州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州GDP的比重为44%,分别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和3.3个百分点,2019年有所增长,占GDP的比重达53.7%,^②但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更大,这种差距是造成边疆地区落后的根源之一。因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化优化民营经济营商环境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再认识,打破“上面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不敢创新的现状,牢固树立优化营商环境就是发展经济的意识,抓住国家和全省全力提升营商环境的有利时机,对标省内外先进地区,对接前沿理念和先进标准,从思想解放、观念转变、意识提高入手,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重要决策部署和省州要求上来,把营商环境的好坏作为衡量地方工作的重要标尺,把发展民营经济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切实改变“小马拉大车”的现状,加强组织领导,

^① 刘洪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约束与对策建议——基于京津冀地区的调查》,《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3期,第86—89页。

^② 红河州政府办:《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2020年5月1日, http://www.hh.gov.cn/zfxxgk/fdzdgknr/zfgzbq_15827/202005/t20200521_438323.html, 2020年12月25日。

凝聚起关注、支持、服务民营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

2. 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强化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要加强对工作落实及创新的研究和督导,并将提升营商环境落实情况纳入对县市政府、州直部门的考核,开展督查跟踪,推动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完善督查考核体系,提高督查考核方式,量化考核标准,使各部门各司其职,避免承办过程中互相推诿扯皮现象;要健全考核机制,将“年终考核”与“日常督查”相结合,使考核工作制度化;要将“组织考核”与“群众公议”相结合,提高群众参与度。

(二) 进一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 深化细化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营造更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①一是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环境。按照“非禁即入”的原则,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促进各类营商主体公平竞争,支持红河州民营企业以参股形式开展基础电信运营业务,以控股或参股形式开展发电配电网业务;在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大幅放宽市场准入。二是进一步提高工商登记等方面的服务水平,继续推进“三证合一”改革、“先照后证”改革,进一步激发投资者的创业热情,提高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信息化、便利化、规范化水平。

2. 积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创新。各相关职能部门要转变观念,从根本上重视,从细节上做好,引导服务红河州民营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助推滇中城市经济圈一体化协调发展,使好的政策落地生根,小微企业普遍享受各种优惠政策红利。

3. 建立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型监管体系。强化民营企业信用监管,着力提高企业信用;协调政府各部门实现互联互通,建立统一开放的综合信息平台,在非涉密领域实现数据共享;加大执法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三) 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

1. 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努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②首先,要做到“亲”,即增强服务意识,真心实意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与民营企业建立亲人般的关系。要全面落实领导干部挂钩帮扶企业制度,州级及各县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每人挂钩联系2户以上重点民营企业,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企业实际困难,开展好帮扶企业活动;坚持每年召开两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参加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代表的座谈会,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用地、办证、培训人才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在制定涉企的法规政策时充分听取企业的意见;切实做好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工作,限时结清拖欠企业账款,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其次,要做到“清”,即领导干部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与民营企业的关系要清清白白。要树立法纪意识、权限意识,严守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依照党规党纪和国家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事,不越权,不越矩;要完善监督机制,加快政务公开化、透明化的步伐,让党政官员与民营企业打交道的约束机制更加明晰、可查。

2. 拓宽服务领域,做好引导和培训。各职能部门要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做好民营企业的法规、政策、业务培训等工作,并提供信息服务、人才支持等。尤其是工商联作为党委政府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要发挥好正向激励作用,鼓励民营企业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不断培育民营企业的法治意识,引导民营企业洁身自好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注重企业法治文化建设,促使民营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3. 进一步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水平。借鉴发达地区做法,红河州各级领导干部要打破“不敢为”“不敢担”的禁锢,对行政审批项目实行目录管理和动态清理机制,并及时承接、调整上级下放、委托的行政审批权限。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编制审批

^① 中共中央组织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教学版(经济建设)》,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第285页。

^② 中共中央组织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坚克难案例——教学版(经济建设)》,第302页。

流程图,提高审批效率;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做到“门好进、脸好看、事好办”。

4. 聚焦高效便捷,积极推进审批便民“集成服务”。要全面推广“会议协调、并联审批、互不前置、负面清单管理”审批模式,实行“一窗受理、并行办理”服务,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大幅度提升“最多跑一次”办事比例,实现负面清单之外“零门槛”,按照“放管服”改革“六个一”要求,落实各级各部门职责,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四) 进一步提高法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水平,营造公正透明的法治政策环境

1. 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法规政策,增强操作性。健全法规,细化条款,增强操作性,促使好的法规政策落地。重点围绕民营企业市场准入、产权保护、投融资、公平竞争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修改制定相关法规政策,保障民营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通过立法加强政府诚信建设,确保政府守约践诺,防止随意违约毁约、“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利用少数民族自治州拥有一定立法权的有利条件,根据近年来国家、云南省制定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法规政策,结合红河州实际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化的长期稳定发展环境,推动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方面,制定出台有分量的配套法规与政策,促进民营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国家法规政策的红利。

2. 提高法律执行水平,合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从政有经,令行为上”。任何好的制度和政策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在建设法治政府,规范有形之手上着力,一切都必须以法律为核心来运行^①;要在维护司法公正,确保公平竞争上着力,落实好《司法部关于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意见》,坚持公平公正执法,坚持规范文明执法,切实防止一些部门在执法中对民营企业采取“一刀切”等简单粗暴做法,对民营企业经营中的一般违法行为,要审慎研究、妥善处理,可以通过说服、建议、协商等手段解决的,要以教育为主,不能一味处罚、一罚了事,坚决避免对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要在拓宽法律服务渠道,提供法治保障上着力,加大查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力度,保证民营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经营、合同诈骗、制假售假等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发挥好红河州民营企业投诉中心的职能作用,积极化解涉企矛盾纠纷。

3. 准确把握支持和落实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三个没有变”,心无旁骛准确把握中央、省委、州委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切实吃透政策,落实政策,服务企业,解决困难与问题,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加大减负力度,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在经济下滑的背景下,更需全面落实中央、国务院近期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推进减税降费,降低土地、水电、通信、物流等要素成本。建立健全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机制,进一步优化融资环境,切实破解民营企业发展过程“融资的高山”问题。一是着力改善金融服务,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对生产经营正常、产品有市场有效益、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稳贷、续贷,不抽贷、不压贷、不断贷;持续深化“银税互动”“银商合作”。督促各金融机构积极开展“银担、银政、银企合作”等,推进“互联网+不动产抵押登记”和数据共享工作,创新各类线上线下产品,创新业务模式,提高信贷服务便利度,丰富金融供给;当前还应落实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再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鼓励银行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等规定,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二是完善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新增的公司类贷款中,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不低于1/3,中小型企业不低于2/3,争取三年以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

^① 路晓霞:《法制化营商环境建设研究——以华侨试验区为样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5页。

的贷款占新增公司类贷款的比例不低于50%。三是加大融资担保力度。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绿色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三张牌”和州委“13611”工作思路中的“六大产业”，更好地发挥州级担保机构作用，鼓励县市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发展“六大产业”的中小微企业，依托全国以锡为引领的有色金属知名品牌示范创建区、低纬度高原特色农业知名品牌示范创建区、紫陶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创建区、哈尼梯田知名品牌示范创建区和红河县、元阳县、绿春县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等平台，大力发展区域内民营经济，形成“政银担”合作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工作格局。四是完善风险补偿机制。健全完善《红河州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设立红河州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逐步增加资金投入，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农业信贷担保、农村危房改造贷款等领域融资中发生的风险补偿；进一步优化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使用，逐步扩大规模、拓展范围，完善贷款风险补偿金政策。

（五）进一步营造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是关系投资者投资兴趣和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千方百计营造好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为投资创业者排忧解难，让广大投资者在红河州创业安心、居住放心、生活舒心。

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健全社会和谐共治机制。州县各级政府要积极履行社会管理职责，协调各方面的有利因素，创新治理模式；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和方式，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倡导文明行为，依法治理不文明行为，提高全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入推进法治红河建设，发挥政法部门职能作用，全面落实依法治州责任，加大全民普法力度，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

2. 营造稳定安全的公共环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从红河州处于中越边境，红河州的稳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出发，深刻认识国家安全总体形势，针对中越关系的复杂性，切实增强底线思维和危机意识，保持高度警觉，弘扬斗争精神，全面维护红河州社会稳定与安全；抓好安全稳定风险防控，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深入排查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有效防控各类风险隐患；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安全发展理念，重点管控好生产安全、消防安全、城市安全、食品安全等领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3. 提升均衡优质公共服务水平。目前发达地区为吸引投资，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不仅出台优惠政策，同时还把重点放在提升均衡优质公共服务水平上，为各类投资者提供有质量的劳动力，提供便利就医、子女教育等条件。红河州也要努力提升均衡优质公共服务水平。一是根据区域人口分布情况合理设置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和教育机构、农贸市场、超市。二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实现数量和质量提升上着力，提高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三是打造宜居宜业环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战，力争使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53.08%达到62%这个云南省的平均水平，全面改善提升城乡环境面貌，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环境。

4. 提升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各级政府要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红河州民族文化相结合，打造能够凸显红河特色的时代文化；要提高文化开放与包容度，推动红河州多元文化融合发展，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2003年以来着力塑造“红河奔腾，奋勇争先”的红河精神，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宣传正能量，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文化氛围，给广大投资者提供更为宽松舒适的人文环境。

责任编辑：念兴昌

民族研究

家国与个人 ——中老跨境婚姻失败案例的人类学研究

马青云, 谭晓明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中老两国是地缘关系上的邻国, 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有着诸多的交流, 两国边民跨境通婚数量的迅速增长就是两国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彰显。中老跨境婚姻数量增长的同时, 由于社会文化调适失败而导致的跨境婚姻失败案例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跨境婚姻失败群体的社会再流动凸显其向上流动的经济理性, 但同时也增加了我国边境地区跨境人口流动治理的成本。从国家顶层制度设计出发, 结合多重组织化力量来改变跨境婚姻中老挝媳妇的弱势地位, 才能有效降低跨境婚姻的失败率, 规避跨境婚姻失败群体二次流动带来的社会风险。

关键词: 跨境婚姻; 老挝媳妇; 社会调适; 二次流动

中图分类号: D6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39-09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在历史上就存在着频繁的人口流动现象, 这种人口流动存在于前工业化的、非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背景之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及此区域本身地理文化板块的复杂交错, 现今西南边疆地区频仍的人口流动现象呈现出更多元、更复杂的特性。中国西南边疆与东南亚各国山水相连, 其跨境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源远流长, 因此, 该地区的跨境人口流动存在极强的内在张力, 流动人口在族群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地缘认同、亲缘认同、文化调适、市场选择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讨论空间。

中老两国是地缘关系上的邻国, 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诸多的交流。除了官方层面的正式交往外, 两国边境线长 505 公里, 老挝上寮的丰沙里、琅南塔和乌都姆赛等三个省份与中国接壤。^① 诸多的天然通道横亘于此, 因而两国民众间的民间交往从未中断过, 老挝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 中老两国是共饮一江水, 共烧一山柴的兄弟。由此可见, 中老两国人民之间的密切联系。鉴于中老两国长久以来的亲密关系, 两国人民尤其是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边民之间的交流互动更加频繁。其中, 中老两国边民间跨境通婚数量的迅速增长就是两国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彰显。

基金项目: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家国与个人——中老边境跨境婚姻失败案例的人类学研究”(2019Y389); 云南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规划科研项目“泰北 D 村族际关系研究”(2019SY025)。

作者简介: 马青云,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跨境民族; 谭晓明,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边疆民族与宗教文化。

^① 郝勇、黄勇、覃海伦:《老挝概论》,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 4 页。

跨境通婚一直是边民跨境流动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跨境婚姻成功与否,是国家间边界的划分、两国间关系的发展、国家政策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实践、文化差异等各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跨境婚姻的成功缔结,一定层面上来说是通婚群体社会文化调适成功的体现;而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文化的差异、家庭内部关系的失衡等原因造成的婚姻关系的破裂,则是通婚群体社会文化调适失败的表现。身处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本就隶属社会边缘群体范畴,当他们的跨境婚姻出现破裂时,这部分群体就会面临二次流动的选择,在二次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他们会面临全新的文化选择、族群认同以及社会融入,也会遭遇诸多的困境,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边缘群体再次被边缘化的过程。基于此,笔者从中老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失败个案入手,通过详细的田野调查,分析导致跨境婚姻失败的原因和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跨境婚姻失败对个人、社会、国家产生的各类影响以及这部分婚姻失败群体的二次流动选择。通过以上研究,更为全面地把握中老跨境婚姻的特点和实质,以此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个案参考和决策咨询。

一、历史与现实——中老两国跨境婚姻概况

婚姻关系以及在婚姻关系基础上建构的家庭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和基本的研究单位之一。^① 边民跨境婚姻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毗邻国界线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士)的婚姻,包括跨境结婚和跨境离婚。^② 中老两国的边界线绵延数百公里,中国西双版纳州的勐腊县、普洱市的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等地与老挝的琅南塔省、丰沙里省及乌都姆赛省接壤。居住在中老国界线两侧的许多民族,例如傣族、瑶族、壮族、苗族、哈尼族等都有着共同的族源、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心理。这些跨境民族在历史上曾同属一族,后来由于战争、疾病、经济、政治等各种原因而不得不散居各国成为跨境民族。但国界线的划分,并不能从根本上阻隔同一民族间的深厚感情,他们依旧以婚姻、贸易、宗教、探亲等方式延续着彼此间的联系。

追溯中老两国边民跨境通婚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历史上,云南本不存在边民跨境通婚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央王朝在历史上并不会与邻国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国界划分,加之云南属边远地方,中央王朝对其统治比较松散,因此,历史上云南各民族与周边民族能够自由交往,并根据本民族的习惯,自主选择缔结婚姻的对象。

中老边界的正式划定,是中老两国出现跨境婚姻现象的开始。1991 年 10 月 24 日,中老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边界条约》,至此,中老两国边界正式划定。两国边界的划定意味着跨境民族的产生,原本同属一个民族的边民,因为国界线的存在而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原本同一民族的婚姻缔结,也就变成了跨国界的通婚。2018 年的老挝丰沙里省内政厅和琅南塔省内政厅文件显示,仅 2018 年一年,丰沙里省就有中老跨境婚姻 596 对,琅南塔省有中老跨境婚姻 354 对。^③

勐腊县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下辖县之一,县境东、南被老挝半包,与老挝的琅南塔省、丰沙里省及乌都姆赛省直接接壤。勐腊县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聚居于此的少数民族多达 26 个,主要有傣族、哈尼族、瑶族、彝族等。地理位置上的邻近关系,使得勐腊县境内的各民族与位于老挝的同源民族间的交往密切,中老跨境婚姻的数量也颇多。因此,笔者以勐腊县的磨憨镇

① 蔡圣晗:《我国跨境婚姻的历史寻径与现实审视》,《学术探索》2020 年第 3 期,第 32—37 页。

② 蔡圣晗:《我国跨境婚姻的历史寻径与现实审视》,《学术探索》2020 年第 3 期,第 32—37 页。赵淑娟:《边民跨境通婚状况调查——以云南中缅边境为例》,《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0 期,第 89—95 页。

③ 资料来源于 2018 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丰沙里省人民婚姻数据,老挝丰沙里省内政厅第 98 号文件;2018 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琅南塔省人民婚姻数据,老挝琅南塔省内政厅第 21 号文件。

为田野调查点，对此地的中老跨境婚姻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及实地调查，笔者发现目前勐腊县中老边民的跨境通婚存在以下特点。

一是入境婚占绝大多数，出境婚数量较少。在对勐腊县磨憨镇下辖的磨憨村委会的14个村民小组进行调查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在近600户总计2568人^①的村民人口中，涉及中老跨境婚姻的户数约有100户，^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老挝女子嫁入我国的入境婚姻形式，只有两例是傣族男子去到老挝丰沙里省和中部某省份上门的案例。之所以绝大部分的跨境婚姻都是老挝女子嫁入中国的入境婚，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国国内快速发展的经济、相对完善的各项社会福利政策、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老挝国内较为落后的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制度分别形成的“拉力”和“推力”使然。另外，中老边境地区中国一侧适婚女性群体向省外、国内其它地区外流所导致的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也是导致入境婚数量占比较高的重要原因。

二是中老跨境婚姻中多为本民族内部通婚，跨民族通婚数量较少。在笔者进行调查的磨憨村委会的14个村民小组中，除了个别由多民族构成的村民小组存在跨民族通婚的案例外，其他各小组的跨境通婚基本都是本民族内部通婚的形式。例如纳龙小组全部都是苗一苗（老挝称为赫蒙）通婚，新民小组全部都是瑶一瑶通婚，磨整小组全部都是傣一傣通婚。究其原因，中老两国同源民族历史上亲密的亲缘关系属性是本民族内部通婚的历史基础，而跨境通婚群体总体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可供异民族间交流对话的统一语言基础及社会文化习俗则是制约不同民族间形成跨境婚姻事实的现实障碍。

三是事实婚姻数量多，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婚姻数量较少。事实婚姻是相对于合法登记的婚姻而言的，事实婚姻是指没有配偶的男女在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时就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而其周边群众也认可其夫妻关系的一种婚姻形式。由于边境线两侧国家政策的不同以及跨境婚姻群体自身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在我国广大的边境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事实婚姻。办理合法婚姻手续的程序复杂、花费大，很多跨境婚姻的当事人对国家政策知之甚少，法律意识淡薄，未认识到合法手续对其生活的重要性，民族传统习惯的影响等，都是造成跨境婚姻中事实婚姻数量多而受法律保护的合法婚姻数量少的重要原因。

四是中老跨境婚姻中嫁入中国境内的老挝媳妇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嫁入中国境内的老挝媳妇的受教育程度都不高，大部分人只读到小学，只有一小部分人初中毕业，读到高中乃至大学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众所周知，老挝在历史上曾是东南亚地区文化较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在法国殖民者入侵老挝，并对老挝实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政策后，严重影响了老挝国内文化、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老挝国内的文盲占全国总人口的95%以上。到了1945年，老挝全国只有初级启蒙学校（寺庙学校，主要教授简单的文化常识）约180所，学生只有约1万人，并且全国没有一所大学。^③这样落后的教育严重制约了老挝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即使在后来独立之后，老挝政府开始大力兴办教育，但受国内经济及历史原因的制约，老挝国民的受教育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另外，老挝的中高等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万象等大中型省份和城市，而嫁入我国境内的老挝媳妇大部分来自老挝的丰沙里省、琅南塔省、乌都姆赛省等边疆省份，这些省份的教育状况和经济状况本来就相对较差，基于此，嫁入我国边疆地区的老挝女子

① 磨憨县人民政府网：《磨憨镇2018人口数据统计》，2018年12月10日，<https://mlxmh.z.ynml.gov.cn/index.dhtml>，2020年5月8日。

② 数据来源于磨憨村委会妇女主任为笔者提供的《2019磨憨村中老跨境通婚情况统计表》。

③ 张良民：《老挝的教育概况》，《东南亚纵贯》1993年第4期，第54—58页。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二、个体与社会——中老跨境婚姻失败的原因浅析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的跨国经贸往来与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跨境婚姻已成为一种人口流动的常态,尤其是在云南等边境省份,跨境婚姻的数量更是随着我国边疆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攀升。2012年的第一季度统计数据显示,云南省涉外婚姻的总户数为27199户,其中未进行婚姻登记的15476户,占56.9%^①;到2016年11月,云南省共有入境结婚人员41981人,未进行婚姻登记的31609人,占总人数的74%^②。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在跨境婚姻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未办理合法手续而非法同居的事实婚姻的比例也在不断上涨。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一部分未办理合法手续的事实婚姻正在面临一些诸如无法获得中国国籍与身份证、无法享受社保和各项社会福利、子女教育和发展受限等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如化学反应般催生了另一些社会问题,其中跨境婚姻破裂就是其最直接的衍生物。虽然就目前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整体状况而言,其发展趋势较为平稳,但其中仍有一些跨境婚姻破裂的案例存在。当这些跨境婚姻破裂群体进行新的社会流动与社会选择时,这除了对他们(她们)自身和其家庭产生影响外,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在笔者进行田野调查的勐腊县磨憨镇,大部分中国男子在娶了老挝嫁入的女子后,都能组建较为和睦的家庭一起生活下去。但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一些跨境婚姻破裂,老挝女子面临再次的社会流动的情况,现就笔者搜集到的一些跨境婚姻破裂的案例来做具体的分析:

案例一:

LSQ,女,43岁,傣族,当初是在亲戚的引荐下结识了生活在磨憨镇的丈夫。1997年时,LSQ从老挝丰沙里奔纳嫁到磨憨镇,婚后育有两子,现均在磨憨镇打工。问及当初嫁过来的原因,LSQ说:“当时觉得中国这边更好在。”当初嫁过来时,适逢中国方面户籍管理制度严格之时,因此,LSQ没能落户,也就无法参与村里的土地分配,自然也就无法享受各种福利待遇。LSQ一共有11个兄弟姐妹,只有她和姐姐(已病故)嫁过来,其他都在老挝。嫁过来后,由于在中国没有合法身份,她的生活有诸多的不便:她无法合理合法地回老挝探亲,每次只能从小路偷溜过去,去到老挝后还担心被当地人举报;她最远只去到过景洪市,更远的地方她不能去也不敢去;村里的一切社保、福利也都与她无关,2015年患胃病住院做手术时的费用也只能自己承担;两个儿子的升学也因自己合法身份的缺失而受到影响……这些都让LSQ内心感到失望。最让LSQ心理上感到落差的是,尽管嫁入中国已经二十多年,但她似乎还是没有完全融入她所在的村落与社会,但凡村中有诸如开会、投票、选举等公共事件时,无论是公婆还是丈夫都会自动忽略她,不将她的意见纳入考虑范畴,村里在做公共事件的决策时,似乎也很少考虑像她一样的老挝媳妇的意见和感受。“我们嫁进来的老挝媳妇跟她们本地的中国媳妇一样,吃同样的饭,做同样的事,但是受到的待遇却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很不公平……”长久以来合法身份缺失带来的压抑感也影响到了LSQ与丈夫和公婆之间的关系,她坦言自己有时很想直接回到老挝去,想办法恢复自己老挝人的身份,堂堂正正地

① 昆明信息港:《云南边民跨境婚姻办证率仅25%》,2013年1月20日, <https://www.kunming.cn/news/c/2013-01-20/3191177.shtml>, 2019年10月25日。

② 张洁:《云南边境地区跨境非法结婚问题调研报告》,《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97—101页。

做一个人……^①

案例二：

ZB，女，27岁，哈尼族，来自老挝勐赛县。2009年时，ZB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其第一任丈夫WSW。WSW是勐腊县某镇的汉族。在朋友的引荐下，二人见面之后对对方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满意，于是很快便选择了结婚。较其他中老跨境婚姻，比较幸运的是，他们在2009年选择了结婚，2013年时两人终于办理了合法手续，领到了结婚证。婚后二人育有一子，现在已在读小学。较其他嫁入中国的老挝女子而言，获得了合法身份的ZB能够享有很多其他老挝媳妇享受不到的待遇，但她与第一任丈夫的关系却并不好。首先两人在沟通上存在很大障碍。ZB是哈尼族，而其第一任丈夫WSW是汉族，两人刚结婚时几乎无法用语言沟通，只能靠比画来猜测对方的意思。即便在婚后几年里，ZB慢慢开始能听懂一些普通话，WSW也能听懂一点点哈尼话，但夫妻二人有效的沟通仍然很少。其次就是两人在风俗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丈夫一家汉族的年节时令与ZB哈尼族的年节时令完全不同，ZB不得不跟据丈夫一家的习俗来度过那些她完全不知道的节日，这让她内心时常感到孤独，觉得自己始终无法真正融入这种汉文化生活。最重要的一点是，ZB的丈夫常年酗酒，喝醉了以后便对ZB进行打骂。长时间内情绪的积累使ZB选择了离开。2016年时，ZB在返回老挝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中国，在中国打工时结识了中国的哈尼族小伙ZT。现在，ZB与ZT已经在一起，而ZB与丈夫WSW所生的孩子则由WSW一家抚养。问及未来的打算，ZB说她打算与丈夫离婚后与ZT在一起，“还是跟一个民族的人结婚比较好，不然连话都没得说……”^②

案例三：

WYB，女，30岁，苗族，来自老挝勐赛县。其丈夫是中国勐腊县的汉族，40岁。WYB是高中学历，是嫁入中国的老挝媳妇中学历较高的一个。2010年，WYB在中国勐腊县游玩时与丈夫相识，其丈夫当时从事茶叶加工生意，两人在相识半年后就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正式在一起了。婚后WYB并未像其他嫁入中国的老挝媳妇一样，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照顾公婆，而是与丈夫一起做起了茶叶加工和木材贩运的生意。由于WYB比较机灵，又读过高中，再加上以前经常来中国玩，也会讲一些中文，因此在中老两国从事茶叶和木材生意时显得游刃有余。起初夫妻俩的感情还算不错，但渐渐的夫妻二人的矛盾开始多起来，WYB便很少回家了。村里人对WYB的情况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她和丈夫的感情不好，平常很少回村里来，现在她与丈夫基本处于各过各的状态。^③

案例四：

WSM，男，48岁，哈尼族，是中国磨憨县的一位农民。WSM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后就落下了残疾，腿脚不便，加上家庭贫困，因此一直到40岁都未娶妻。2013年时，经人介绍，WSM与老挝的一名32岁女子DS相识，在付给DS家1万元的彩礼并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后，WSM与DS结成了事实上的夫妻。但仅仅在婚后2个月，DS谎称回老挝探亲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由于婚前WSM没有去过DS在老挝的家，当时彩礼也是直接交到DS的手上，在中国举办婚礼时DS也称自己在老挝的亲属不方便过来，所以WSM对DS在老挝的情况一无所知，只听DS大致说过自

① 访谈对象：LSQ，43岁，傣族，女，嫁入中国的老挝媳妇。访谈时间：2019年12月16日。访谈地点：LSQ家中。访谈人：马青云。

② 访谈对象：ZB，27岁，哈尼族，女，嫁入中国的老挝媳妇。访谈时间：2019年12月13日。访谈地点：ZB的出租屋内。访谈人：马青云。

③ 此案例是根据勐腊县磨憨镇磨憨村委会前妇女主任CML的讲述整理的。

己家在丰沙里,至于具体在哪,WSM并不知道。DS失踪后,WSM也请老挝的熟人帮忙打听,他的家里人甚至也亲自去到老挝那边寻找过,但都无果。现在,WSM仍然单身未再婚。^①

以上案例只是众多中老跨境婚姻破裂案例当中的少数几例,造成其婚姻破裂的原因也都千差万别。但总体而言,造成中老跨境婚姻破裂的原因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合法身份缺失带来的内心压抑感使其难承其重。在嫁入中国后,绝大部分的老挝媳妇都没有获得受法律保护的合法身份,因而她们的合法权益也就得不到保障。例如她们无法去远处打工、无法享受当地的医疗与社保、工资和待遇较中国媳妇而言更低,这些不平等的待遇使她们难以对中国社会产生认同感。除了遭遇国家、社会层面的不公待遇外,一些老挝妇女在家庭中也难以获得平等的地位,中方家庭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才不得以娶了老挝媳妇,因而在心理上并未真正接纳老挝媳妇为其家庭成员,有些家庭中的老挝媳妇还直接被排除在传统的宗族活动以及村落政治活动之外,这都使得老挝媳妇对夫家难以产生真正的认同感。另外,由于婚后没有合法手续,一些嫁入中国的老挝媳妇与其原生家庭也出现了疏离,很多人婚后多年都没有回去探亲,这对她们而言,也是一种内心的煎熬与孤独。

第二,家庭持续发展能力弱化。在中老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家庭中,大部分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家庭成员因缺乏其他收入来源而对土地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外籍女子嫁入后,因受外籍媳妇身份的限制而无法分得土地,也无法到远处打工、学习,这遏制了她们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诞下子女后,其子女因落户问题而使受教育权利受到影响,母亲也因缺乏合法身份而不能平等合法地参与孩子的教育与社交,孩子易遭到同龄群体的嘲笑、歧视及边缘化,在后续的发展中,孩子的医保、土地分配、社会福利等各方面依然会受限。另外,边境地区多数跨境婚姻家庭都以务农为主,自身发展本就缺乏强劲的支撑力,若丈夫再有先天的疾病或不足,家庭便更加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与动力。

第三,个人意识的觉醒。婚姻是家庭与社会的总开关,婚姻关系的缔结乃是建立在男女双方相合的价值观与一定的经济条件之上的。中老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缔结,除了双方感情的考量外,大部分都是出于经济考量的理性婚姻。老挝一方的女子认为中国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能带给她们更好的物质生活保障,中国一方的男子则认为较低的婚姻成本及老挝女子的勤劳能干是他们选择娶老挝女子的现实理性,双方各自的经济理性促成了跨境婚姻。因此,在早些年形成的中老跨境婚姻中,即使夫妻双方存在年龄差距较大、感情不睦等问题,出于理性的考量,绝大部分的婚姻还是能够维持下去的。但是近些年来,得益于中老两国经济的发展,边境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与改善,尤其对于一些生活在老挝边境的年轻女子而言,缔结跨境婚姻时,经济条件固然是其考量的重要标准,但却不是唯一标准,年龄是否相仿、性格是否相合、嫁入后能否得到男方及其家庭乃至周边社会的尊重与认同、家庭后续发展是否有动力、子女的教育及社会福利等能否得到保障等都成为其考虑是否缔结跨境婚姻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考量标准的增多,使得影响跨境婚姻不和谐的因素变多,也就出现了跨境婚姻破裂案例增多的情况。而中老跨境婚姻破裂案例的增多,实际上是一种中老跨境婚姻中老挝女子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

除此之外,骗婚、逃婚事件在跨境民族婚姻中也较为常见,这主要是利用了中国方男子迫切想要完婚的心理以及边境地区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和边境线两侧国家间不同法律制度的漏洞。另外,异族通婚造成的生活习性的不相容、语言障碍造成的沟通不畅、家庭内部关系失衡等都是导

^① 访谈对象:WSM,48岁,哈尼族,男,勐腊县磨憨镇人。访谈时间:2019年12月14日。访谈地点:WSM家中。访谈人:马青云。

致中老跨境婚姻破裂案例增多的原因。

三、家国与个人——中老跨境婚姻失败群体的社会再流动

自古以来，边境地区的发展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偏远而常被中央王朝统治者所忽视，身处边境地区的边民更是被当做“化外之地”的“化外之民”而存在。作为远离中央政府统治的边缘群体，身处边境地区的边民与边境线另一侧的边民通婚是早已存在的社会事实。中老两国山水相连，族源的相同、文化的相亲、地缘的相近等都是促成中老边境地区跨境婚姻产生的重要原因。而当联结跨境婚姻的各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的屏障破裂后，跨境婚姻就面临着失败的现实。跨境婚姻一旦破裂，自老挝嫁入中国的这些老挝女子就面临着新的社会流动选择。她们本就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在跨境婚姻破裂后，她们的社会再流动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边缘群体的再边缘化过程。从笔者所搜集到的田野调查案例来看，中老跨境婚姻破裂群体的社会再流动主要面临以下几种路径选择：

一是返回老挝。在与中国方的夫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后，老挝媳妇最主要的社会流动路径就是返回老挝。一般而言，鉴于中老跨境婚姻烦琐的手续，绝大部分的中老跨境婚姻都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事实婚姻，因而在跨境婚姻破裂后，老挝女子往往无法分到家庭财产，只能选择净身出户离开。至于孩子，很多都已在中国落户并接受教育，若强行带回老挝不但男方不同意，而且孩子在老挝的国籍和户籍也是难以解决的现实障碍，因而孩子绝大部分也都是留在了男方家中。笔者辗转联系到曾嫁入中国勐腊，后因无法忍受丈夫酗酒、家暴等行为而跑回老挝娘家的老挝瑶族妇女 PNW。

案例五：

PNW，老挝瑶族，38岁。2001年时，PNW经人介绍嫁给了中国勐腊县的丈夫YM，婚后两人育有一子。2015年时，PNW在遭受丈夫酒后的又一次家暴后，选择了离开，是她老挝的弟弟来到中国接她回老挝的。回去后，PNW并未再婚，现在与父母住在一起。“每天都想儿子，但是又不能回去看他，他们（丈夫一家）也不让我见，这是我最大的痛苦，听说儿子已经高三了，我想找机会偷偷去看看他……”^①

婚姻的破裂、财产分割的失败、骨肉分离的痛苦，这些都成为跨境婚姻失败的老挝媳妇所要承受的压力。中老两国在经济发展与生产生活水平上的较大差异，使这些老挝媳妇在返回老挝后，也面临着重新适应老挝社会及处理与周边群体关系等问题。

二是留在中国讨生活。实际上，大部分的中老跨境婚姻之所以得以缔结，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的生活水平较老挝而言更高，很多老挝女子想要通过与中国男子缔结婚姻这种人口跨境流动的方式来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对大多数边境地区的老挝女子而言，她们都认为“中国这边更好在”“中国政策好、条件好”。老挝女子在嫁入中国后，首先其生活条件会有很大改善，即便是嫁到不算富裕的家庭或者嫁给离过婚甚至年龄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家里或多或少都会有橡胶地、茶叶、果林、农田等带来的收益，生活质量远比在老挝国内要好，因此在很多老挝边境女子的观念中，找个中国的比找个什么样的更重要。在跨境婚姻维持不下去而破裂后，很多老挝媳妇因为习惯了在中国的生活而继续选择留在中国讨生活。这一方面是出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老挝媳妇对中国社会适应性的考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老挝媳妇自身观念的变化，她们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自我选择意识。继续留在中国讨生活的老挝媳妇，一般囿于无中国的合法身份，只能选择在边

^① 访谈对象：PNW，38岁，瑶族，女，老挝人。访谈时间：2019年12月20日。访谈方式：网络聊天。访谈人：马青云。

境地区活动。比如,农忙时节充当劳工割胶、采茶叶,在工厂做工,边民互市时售卖一些生产生活用品,在饭店、旅馆做临时工等,个别受教育程度稍高的老挝媳妇则会利用自身语言的优势来充当中老贸易间的翻译。当然,还有一些老挝媳妇会利用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积极获取中国方的合法身份,以此实现向边境以外地区的社会流动。

三是再嫁给其他中国边民。造成跨境婚姻破裂的原因有很多,老挝媳妇长期以来合法身份缺失带来的内心压抑感、家庭内部及社会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弱化、通婚双方文化差异过大等因素,都是导致跨境婚姻破裂的重要诱因。由于大部分中老跨境婚姻都是无法律依据的事实婚姻,因而在跨境婚姻失败已成既定的事实后,一部分既不愿意返回祖籍国老挝而又缺乏独自在中国生存下去的能力的老挝媳妇就会选择再婚,以再一次嫁给中国边民的方式实现自己又一次的社会流动选择。当然,由于第一次婚姻是事实婚姻,因而当老挝妇女再嫁时,基本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纠纷和阻隔,只要男女双方愿意,按其民族习俗举行简单的仪式后,双方即实现了再一次的婚姻结合。当然,在老挝妇女再一次嫁为人妇后,先前所面临的诸如合法身份的缺失、家庭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问题依然存在,这就需要老挝媳妇进行再一次的社会融入尝试,需要重新适应新的家庭与社会关系,进行新的社会文化调适,努力在新的社区中生存下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缺乏法律保障的事实婚姻本就不是建立在坚固基石之上的婚姻形式,因而即便是再嫁的跨境婚姻,其风险成本依然较高,仍然存在着失败的可能。

跨境人口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一种特殊的人口流动模式,通过跨境婚姻的形式进行的人口流动则是众多人口流动模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因为通过跨境婚姻流入的人口,后续面临着更多社会融入、文化调适、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等方面的问题。鉴于中老两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一些老挝女子便通过跨境婚姻的形式嫁入中国,以期获得自己理想中的生活。对于这些老挝女子而言,嫁入中国是实现她们自身经济地位提升的有效方式,更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福利以及发展机会是她们决心嫁入中国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她们得以融入中国社会及社区的基础保障。与其他婚姻形式中的个体相较而言,边境地区的老挝女子因其语言、受教育程度、文化习俗、竞争意识等方面的限制,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在嫁入中国后,不被法律所承认的事实婚姻也为她们的婚姻关系增添了人为因素之外的其他不稳定因素,当各种不和谐因素叠加而使跨境婚姻破裂时,老挝媳妇就不得不面临再次的社会流动。而这种人口再流动,必然会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首先,会增加我国政府对边境地区流动人口的管控难度。大部分中老边境地区的跨境婚姻都属于无合法手续的事实婚姻,这类婚姻本就存在着一定的隐匿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婚姻中的老挝媳妇也缺乏被中国政府认可的合法身份。一旦跨境婚姻破裂,这些老挝媳妇便会在中老边境线两侧重新流动,其非法身份和随意流动性增加了我国政府对其管控的难度。其次,跨境婚姻家庭内部的稳定关系仍然无法确保。另外,一些跨境婚姻破裂的妇女还有可能在下一次的社会流动中误入歧途,参与到贩毒、吸毒、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中,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危及边境及国家安全。

四、结论与讨论

有学者认为,(东南亚地区的)跨国婚姻是全球分工不平等结构具体化为人际不平等性的结果。^① 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实践群体本就是社会边缘群体,而自边境线另一侧嫁入中国的老挝媳妇

^① 赖淑娟:《婚姻移民女性与第三度空间:花莲纵谷地区婚姻移民双重视界的日常生活实践》,《台湾东南亚学刊》2011年第2期,第57—64页。

更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弱势群体。对于经跨境婚姻形式流入中国的老挝媳妇而言，其婚姻事实的形成既是各种社会关系与时空背景交织的产物，同时又是老挝媳妇自我选择与参与意识的彰显。从边境线一侧的老挝嫁入边境线另一侧的中国，虽然地缘位置上的邻近与文化渊源上的亲密感都使跨境婚姻具备了更多成功的客观条件，但国界线划分带来的政治方面的阻隔却也是真实存在的，由此产生的社会适应、文化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等都成为了讨论跨境婚姻问题的题中之义。当跨境婚姻中的老挝女子嫁入中国后，不仅意味着她们新生活的开始，同时也是她们在新的生存环境中进行政治调适、文化适应、家庭内部关系平衡、社区融入等的开始。在中老跨境婚姻中，大部分嫁入中国的老挝媳妇都能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寻找到平衡点，尽量快速地融入新生活中，但也有一部分老挝媳妇无力面对所生活世界的结构化压力。长期合法身份缺失带来的内心压抑感、不能被平等尊重和对等的无力感、家庭内部关系的失衡、自身身份的被污名化等，都是跨境婚姻破裂的风险点，一旦这些风险因素综合起来并最终打破老挝媳妇的心理防线，那跨境婚姻破裂便成为既定事实。

面对破裂的婚姻现实，老挝媳妇这一边缘群体不得不进行再一次的社会流动尝试。无论是返回老挝还是继续留在中国，她们都要面对自我角色的转型以及新的社会适应与融入。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制度层面顶层设计的不完善乃是造成中老跨境婚姻破裂的重要原因，也是限制跨境婚姻破裂的老挝女子再次进行社会流动和文化调适的重要因素。因为老挝媳妇合法身份的缺失乃是其无法更好地进行文化适应、社区融入与国家认同的导火线，这种由法律保障而来的社会属性的缺失就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使各种积压已久的社会、家庭、个人问题蜂拥而至，最终对跨境婚姻造成难以弥合的伤害，也影响跨境婚姻失败的老挝女子的社会再流动。因此，要降低中老跨境婚姻失败的风险，同时减少因老挝女子二次社会流动对我国制度的严肃性以及边境安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应该首先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建立多元的跨境婚姻移民群体身份管控机制，简化跨境婚姻结婚证办理的手续与步骤。例如，对于办理了合法手续的跨境婚姻群体，实行灵活的身份管控政策，如以五年或十年为周期，对于在这一周期内无不良行为，与家庭、邻里相处和睦且能出具相关证明的人则考虑给予其合法身份，并赋予其普通中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以此来解决其身份归化问题；对于已经获得合法身份的跨境婚姻群体，周边群众要积极发挥监督职能，对于后续有违法犯罪等不良记录的跨境婚姻移民，国家保留收回其合法中方身份的权利。另外，国家与地方政府要积极调动各方力量，为跨境婚姻移民提供多重组织化支持，^① 提升她们的生存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为家庭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帮助她们克服自卑心理，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念，同时拓展其在社区选举、参与方面的权利，激发她们主人翁式的归属感。

中老跨境婚姻是建立在文化、宗教、族群认同基础上的普遍存在于中老边境地区的一种婚姻形态，其实质反映了在婚姻关系中，老挝妇女试图通过婚姻这种跨境人口流动的方式来实现向上流动的规律。当嫁入中国的老挝妇女无法更好地融入家庭与社区，其进行的社会文化调适失败时，跨境婚姻便面临着破裂的可能。跨境婚姻破裂后的老挝妇女的二次社会流动也是在多方因素综合考量下的经济理性选择，其最终目的同样是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因而其同样面临着再一次的文化调适、社会融入。只有以正向疏导方式来理性解决跨境婚姻破裂群体的社会再流动，才能减少非法的人口跨境流动给边疆地区带来的负面影响，确保边境安全。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陈雪：《云南跨境婚姻移民的社会治理研究》，《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45—53页。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鲜明特征

姜丽华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 要: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重要抓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在创新载体、新理念和新方法, 建新标准、新规则和新机制等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式进展, 呈现出发展阶段性、主题突出性、价值人文化、思路科学化、载体多样化的鲜明特征, 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程。

关键词: 新时代; 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 鲜明特征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48-05

做好民族工作, 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实践证明,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是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民族工作, 聚焦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创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在党中央顶层设计的推动下, 各地方不断推进创建工作进一步升格, 在创新载体、新理念和新方法, 建新标准、新规则和新机制等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式进展, 呈现出发展阶段性、主题突出性、价值人文化、思路科学化、载体多样化等鲜明特征, 营造出全党全社会共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发展阶段性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全新的重大政治判断。^①新时代所处的国内国际背景和历史方位, 使得我国民族工作呈现为“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 为新时代民族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指明了新方向和新任务, 使得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具有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坚持在“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总目标的引领下, 精准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根

基金项目: 青岛市 2020 年度社科规划项目“全面深入持久推动青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研究”(QDSKL2001415); 青岛统一战线智库 2020 年度课题“全面深入持久推动青岛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研究”(QDTZZK2020YBA13)。

作者简介: 姜丽华, 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青岛统一战线智库副研究员, 法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及统一战线理论。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第 1 版。

本，突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主题，稳中求进，在拓展延伸内涵、探索有效形式和扩大影响范围方面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将民族团结工作的重要性提升到“生命线”的政治高度，将民族团结置于关系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生存发展的战略地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凸显民族团结对于维护祖国统一、社会稳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同时，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事业也进入一个整体推进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党中央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发展战略和相关规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过程，融入党和政府重大战略、重大部署、重大活动中，并在深度融合中推进创新发展。2013年9月，国家民委启动了13个自治州的试点工作，首次建立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地、市、盟）的测评指标体系。2014年，国家民委开启民族团结进步的“六进”活动，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测评指标体系，并建立较为全面的创建示范测评机制。同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与长远性的基础工作来安排和部署，做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这一全新表述。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将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等重要内容一并列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在十三五规划中，党中央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列入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及兴边富民行动中，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安排部署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和示范区（单位）建设的相关工作。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放在同一政治高度，确立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的新的基本遵循。因此，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事业的发展阶段来看，新时代的创建工作已经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部署紧密相连。

二、主题突出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核心要素和重要保障，也是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突出主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五十六个具体民族有机部分构成的，“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①，虽然他们有各种差异，但是彼此共生、共存于一个整体。因此，只有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倾向，铸就休戚与共、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往发展中，呈现出不能分割的相互依存的整体性形态，并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情感支撑。在这一主题的引领下，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始终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教育为抓手，让民族团结进步之树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必须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主题展开各项工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民族共同的思想政治引领的重要内容，必须做到优化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有效性、保障各族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的基础性与创建工作的实效性相结合。首先，健全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常态化机制，始终注重培养以干部、青少年、知识分子、信教群众等群体为重点对象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进步意识，逐步健全民族团结进步全民教育常态化机制，引导各族群众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促进形成

^①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93页。

“六个相互”的各民族交往与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生动局面。其次,完善政策导向和制度保障,在创建工作中推动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深化对“五个认同”的认识。在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日常互动过程中,促进双语教育,重视民族语言的互联网、新媒体平台和网络文化建设,因势利导运用互联网传导信息、传播正能量,加强各民族的正向接触与互动,善于把民族交往心理结构、族际接触理论和文化适应策略及时转化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促进机制,始终要处理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关系,铸牢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思想基础,提高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水平。最后,要创造有利于创建工作的社会环境。注重在创建资源配置中推动经济、社会等客观要素和文化心理主观因素的融合,推动建立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社区为平台完善社会规范,从各族群众的居住生活、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日常行为入手,切实创新少数民族常住与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依法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营造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社会氛围。

三、价值人文化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主体是各族人民群众,核心是通过创建工作凝聚各族群众人心和力量。“抓不住人心,就搞不好民族团结、做不好民族工作。”^①因此,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充分呈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人文价值关怀,遵循各民族间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发展规律,紧紧围绕维护好和实现好各族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展开,充分展现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追求的鲜明特征。创建工作在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推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促使各族群众正确认识本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提高自身素质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知行合一的实践过程中,获得自由、和谐而又具有创造性的发展,从而形成更加密不可分的民族关系。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在目标导向、行为规范、心理疏导、表彰激励及统筹发展等方面充分彰显人文价值关怀。坚持“两个共同”方向,逐步缩小各民族的发展差距,增进各民族的共同性,同时充分尊重各民族个人行为方式和价值文化选择、社会心理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统筹兼顾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两把钥匙”,切实提高创建工作的实效性。一方面,党和政府加大物质支持,以改善民生、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作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首要任务。改善民生是社会和谐之本,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之根。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紧紧围绕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多搞一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多办一些顺民意、惠民生的实事,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②创建工作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来改善民生,积极创造各民族平等发展与公平参与的机会和条件,切实把创建工作落实到满足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上,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促进民族团结与凝聚人心,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丰硕成果和民族团结红利。另一方面,创建工作要更加注重运用和凝聚精神力量,使创建工作既见物又见人。创建工作要注重加强民族领域思想理论和阵地建设,保障民族团结进步精神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建设,搭建平台,发挥好思想政治引领主阵地作用,及时批驳各类影响民族团结的错误言论。各地方利用各种资源开展富有特色的各族群众培养、交流感情的群众性活动,探索中华文化和本民

^①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第104页。

^② 《坚持依法治疆团结稳疆长期建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疆》,《人民日报》2014年5月30日,第1版。

族文化的认同机制，大力拓宽多元主体参与创建工作的渠道和范围，创新形式和载体，打造各具特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注重用全媒体产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各项活动的影响，精心打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系列创建实践活动平台，以此来提升民族团结进步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推动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和交融创新。

四、思路科学化

新时代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以创新为第一推动力，推动思路理念、内容形式、体制机制、方法手段、渠道载体等创新发展，创建工作呈现精细化、规范化、长效化、常态化的科学化发展态势。创建工作始终强调问题导向，注重解决民族团结存在的现实问题；强调交流交往交融导向，注重创建工作的差异性和同一性；强调惠民利民亲民导向，注重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强调重心下沉，注重打牢民族团结的基层基础，搭建各族群众便于、乐于参与的平台，提高创建工作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创建工作的思路日渐成熟，呈现出科学化的鲜明特征，形成了示范引导、多级联动的新格局，使得整个工作在时代性、思想性、引领性、实效性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当前，创建工作已经形成了省（区、市）、州、县三级联动格局的完整发展布局。其中，2012年到2018年，国家民委命名6批868个县级及以下示范区（单位），30个示范州（地、市、盟），不断推进创建工作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创建工作体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统筹推进。在顶层设计上，新时代的创建工作以党的领导顶格推进，制度完善和基层实践相结合，系统集成与协调配套统筹谋划，积极推动各具特色的示范线、示范群、示范带的品牌建设，实现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协同创建和共建共联。在基层实践上，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制定示范区建设条例、创建工作计划和方案，推进地方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典型打造培育工作。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形成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创建民族工作负主体责任、统筹基层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注重创建工作队伍建设，重点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知识分子和代表人士在维护民族团结中“关键少数”作用。另一方面，创建工作聚焦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在创建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强化法治思维和依法治国宣传教育，维护和实现好各族群众的平等地位和权利，依法妥善解决影响民族团结的纠纷矛盾，坚决依法打击制造民族分裂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违法犯罪行为，让法治、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观念深入各族群众的心里。同时，充分尊重各族群众主人翁地位，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对于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等重大事项及各族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要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中事先做好沟通，征求并尊重各族群众的意见，和各族群众商量办事，推动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同时，在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实践中，构建新型民族事务服务体系和协作机制，创新推进社区民族工作社会化，成立少数民族联谊会、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民族事务的服务管理等方式，实现跨区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对接、协作机制，将创建工作与社区建设、服务群众工作相结合，使创建工作更加人性化、多样化。

五、载体多样化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活动形式和载体不断丰富，注重创建工作的内容形式创新，突破传统的方式方法，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平台，呈现出鲜明的载体多样化特征。通过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和渠道，创建工作找准创建与各民族心理的契合点、情感的共鸣点

及利益的结合点，在潜移默化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将创建工作与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相融合，将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通，将个人奋斗与国家命运相融入，实施“创建+”搭建示范平台，不断推进创建工作人文化、大众化、实体化，实现精准度与实效性相结合，增强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通过多种方式把民族团结的种子深深埋入各族人民的心里。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一项综合的社会工程，涉及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不同层面要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形式灵活、载体多样的创建工作。首先，不断拓展创建工作的新领域和新阵地。各地方最先启动的创建活动，在“进机关、企业、社区、乡镇、学校、宗教活动场所”的“六进”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推进为包括“进村（乡）、军（警）营、医院、家庭”等的新领域，几乎覆盖了与各族少数民族群众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领域。其次，大力打造各具特色的创建活动品牌和活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面临主体多元化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彩、强基固本的创建活动，推进创建活动项目化、项目工程化、工程菜单化，以品牌为依托实施维护发展稳定、改善民生的惠民项目。例如，以品牌依托开辟创建园地基地，发挥联系沟通作用，适时召开少数民族联谊会、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少数民族代表协商座谈会，定期开展少数民族慰问走访活动。最后，不断创新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方式。“网络空间与民族及民族关系发生联系后，改变了各民族‘三交’活动的原生态，带来了新形态。”^①创建工作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传播手段，通过新技术、新媒体，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日常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依托少数民族传统节日、重大纪念日集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传教育；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力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运用“结对子”，开展“四送”（送法律、送政策、送温暖、送文明）、“五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娱乐）活动等。此外，以民族团结进步表彰的先进典型带动各族群众的积极性。1988 年至今，我国一共召开六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国务院共表彰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3893 个和先进个人 4085 个，营造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社会氛围。

责任编辑：杨松禄

^① 张立辉、赵野春、许华峰：《网络空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新途径的思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 年第 5 期，第 14—17 页。

政党制度与多党合作

组织文化视域下多党合作精神 嵌入科研组织创新研究

——以 K 研究院为例

胥福顺¹, 林昱澍², 沈云都²

(1. 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云南 昆明 650031; 2. 云南农业大学 科技史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201)

摘 要: 进入新时代以来, 科技创新研究竞争越发激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是我们国家取得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重要法宝; 多党合作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推动科技创新事业的有效组织形式。本文试以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理论为分析工具, 从一致性、适应性、参与性和使命感四个组织文化的重要维度, 深入剖析新时代 K 研究院在党领导下将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创新工作实践, 合理统筹党内外科学家的学识智慧, 推动振兴边疆科研创新事业的组织成效和不足, 并就上述四个维度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 提出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组织文化模型; 多党合作精神; 共同愿景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53-08

一、理论基础和理论工具

20 世纪 70~80 年代, 日本企业的强势崛起, 有力挑战了美国企业在战后世界产业和分工中的霸权地位。这激发了学术界对东西方企业的组织文化差异问题的强烈兴趣, 并由此形成了组织文化理论领域的 2 个重要争论。一是在组织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方面, 出现了人类学基础与社会学基础的对立。前者认为一个组织本身就是以文化的形式而存在, 并尝试把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植入现代工商业组织研究,^① 特别是企业研究之中,^② 进而对西方自己的 (组织) 文化进行反思和批评;^③ 后者则限定了文化在组织中的地位, 仅仅承认文化是组织的多个属性、功能或机制之一, 是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城市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道德整合问题研究”(16BZX103)。

作者简介: 胥福顺, 博士, 昆明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教授级高工; 林昱澍, 云南农业大学科技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 沈云都, 博士, 云南农业大学科技史研究所所长, 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 S. Wright, “Culture in Anthrop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Studies”, Susan Wright eds., Anthropology of Organiz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51.

② Ann T. Jordan, Business Anthropology,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12, pp. 17-19.

③ [美] 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 王铭铭等译, 三联书店 1998 年, 第 1 页。

在组织研究领域替代“系统”概念的一个崭新的研究工具,^①而不能视为组织本身。二是在组织文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出现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分歧。其中,定性学派的代表人物沙因(E. H. Schein)认为,组织文化体现在组织内部成员的默认共识、价值观和日常行动之中,^②因此是不可量化的。与之不同,丹尼森(D. Denison)则认为,通过对组织的参与性(involve-ment)、一致性(consistency)、使命感(mission)、适应性(adaptability)4个要件进行量化分析,就可以测量和诊断组织的文化。^③丹尼森由此建构了相应的组织文化模型(如图1所示)。^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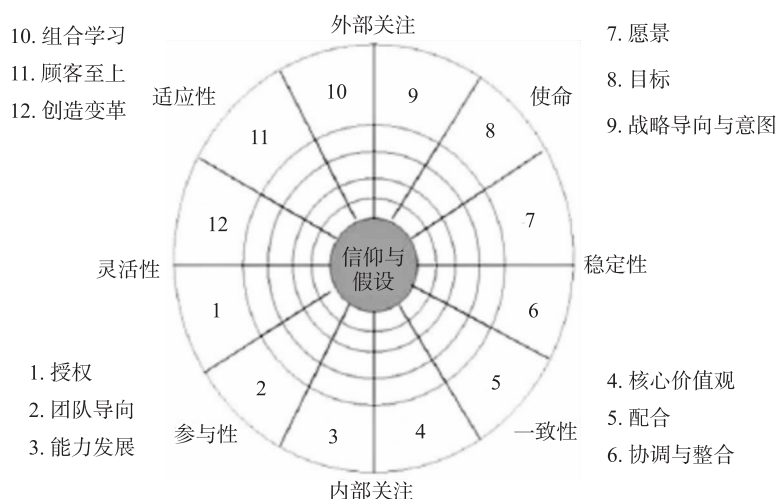


图1 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示意图

沙因针对丹尼森的组织文化模型进行了严厉的批评。^⑤这一批判尽管在对量化技术层面上提出了难以辩驳的质疑,但却仍无法动摇丹尼森4个要件模型在分析和评估组织文化过程中的强大解释力和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笔者主要在社会学而非人类学的基础理论预设之上,力图以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理论为基础,借鉴和吸收沙因等人对严格定量研究中潜在片面性的质疑,即在承认组织文化模型4个要件在操作意义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一前提下,淡化定量研究的刻板的技术规程。以此为理论工具,本文研究K研究院作为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一所企业化运作的冶金科研院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的形式及其效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不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的有效性进行分析。

二、新时代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的经验探索

近年来,云南冶金产业作为非常重要的基础原料产业,继承了其悠久发展历史中的优良传统,大力推进技术改革,不仅加快了云南冶金科研技术进步,助力云南冶金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了云

① [联邦德国] 海能:《组织文化:理论和实践展望》,张庆洪等译,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74—75页。

② Schein, E. H. . Culture: The Missing Concept in Organization Stud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6, 41, (2): 235 - 240.

③ Denison, D. R. . Corporate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New York: John Wiley& Sons, Inc, 1990.

④ 参见: Cho, H. J. , 2000. Th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Questionnaire. Available at: www.denisonculture.com/articles/Validity.

⑤ Schein, E. H. . Review of Corporate Cultur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 28, No. 4, 1989: 557 - 561.

南省支柱产业之一，还在加快全省工业化进程、发展地区经济、支持中央及省属冶金企业发展和缓解原料不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民族冶金工业在云南的发展壮大，反映了云南各族、各界、各党派科学家和进步人士振兴国家的共同心愿和历史合力。

1949年后，K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民主党派、无党派冶金科研工作者，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领导下，为云南冶金科研创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富有代表性的有：L传炎同志，无党派人士，1978年负责研制的重介质旋流器及应用获全国科技大会及冶金部荣誉奖状，1988年作为负责人之一参与了云锡老厂网状脉矿工业试验并获冶金部表彰，1989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青年专家，1991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Y钢同志，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获省级科技成果一等奖2项、省级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省级科技成果三等奖2项，共申请专利14件，在2008年获“第十届中国专利奖”优秀奖，享受云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业技术人员，国家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评审专家；Y大锦同志，九三学社社员，教授，博士，兼任昆明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这些党外冶金科学家的奋斗足迹，为新时代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的新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K研究院在实践中做了有效的探索，为边疆冶金科研创新研究这一重要工作提供了政治、思想、组织等各方面的保障，有效地统筹安排党内外科学家进行针对性技术攻关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在运用非严格量化的或定性的研究方法基础上，通过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对K研究院的组织文化进行分析评估，对于解析边疆地区企业化运作的科研院所在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的实践效用，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参考价值。为吻合我国国情和表述习惯，笔者对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4个要件之先后顺序进行了必要调整。

（一）一致性分析

“核心价值”的建立，是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在“一致性”分析中的基础指标。共同推动边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生活，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是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的政治基础，也是科研院所组织文化的核心价值。

为建立组织的核心价值，K研究院做了以下2方面的努力：

1. 贯彻统战精神，凝聚合作共识。“做好统战工作，凝心聚力前行”是K研究院党委2019年树立的口号。为践行这一口号，将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工作落到实处，研究院党委专门成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全面梳理统战人员信息，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党外科学家参加学习和座谈，及时传达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最新成果以及研究院最新的发展动态。在学习和座谈中，研究院党委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在积极学习了上级工作要求和部署精神之后，马上组织专人为党外科学家一对一答疑。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导下，K研究院党委不断强化党外科学家思想政治共识和团结合作意识。由此在思想上形成高度的一致性，在工作中形成团结合作的强大动力。

2. 贯彻核心价值，培育家国情怀。院党委积极引导党外科学家协调工学矛盾，安排党外科学家和中共党员一起，通过视频学习的方式，观看党中央重要会议和活动现场视频，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深入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精神，引领和凝聚党外科学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强国、振兴民族产业而团

^① 胡忠坤、许璧芳、尹树新：《重新崛起的王国——云南冶金工业50年》，《云南冶金》2000年第29卷第1期，第2—7页。

结奋斗的政治共识。

为积极建立研究院党委以及党外民主人士、党外科学家的政治共识,共同振兴边疆科研研究创新、谱写好中国梦云南篇章,研究院党委采取了一揽子主题教育活动,积极与党外民主人士、党外科学家进行沟通和交流,仅2019年一年就展开了19次形势政策与理论学习沟通交流。其中,统筹安排数位党外科学家如Z林、L小英、Q忠标等积极参与线下学习交流,共同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专题进行学习,也对几位党外科学家提出的“中国梦”“初心、使命”等问题进行了积极地讨论和答疑。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语境,党员和几位党外科学家一同对1840年以来近200年中国的屈辱历史进行了反思与回顾,加深了各位党外科学家对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国家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与初心的认同感,使党外科学家更加愿意接受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基本政治共识,为振兴民族产业做出更大贡献。院党委特别组织大家深入学习探讨了云南本土“农民院士”、科学家中的时代楷模朱有勇,投身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事业,扎根云南澜沧扶贫一线,将科研成果积极应用于扶贫事业,忠实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思想的先进典型,引导党外科学家把振兴云南家乡的冶金事业和爱国奋斗紧密联系起来,激发党外科学家实干兴邦、兴滇强国的家国情怀。

(二) 适应性分析

以核心价值为引领,形成组织内部的良好、浓郁的学习氛围,形成组织的“自我学习能力”,是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的重要参数。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们人类是相互学习的,而只有在一个文化上具有激发力的环境之中,相互学习才有可能。”^① 科研创新事业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离不开组织学习和相互学习这样的学习型组织文化环境。组织内部“生长”起来的学习能力,也是组织创新变革能力的重要支持因素。在形成组织的自我学习能力方面,K研究院做了以下探索和尝试。

1. 为党外科学家量身制订学习计划。K研究院对党外科学家参与思想政治学习采用了清单式管理,确保学习研讨工作稳步推进、有效落实。研究院在与科学家进行沟通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党外科学家研究创新工作时间安排,提前制订相应的学习计划,报研究院党委审批实施,并协助党外科学家不断协调好工学矛盾,确保学习和工作质量。

2. 严格并富有灵活性地执行学习过程。研究院党委提前发布学习通知,统筹安排参学人员的领学内容和学习清单。让党外科学家在了解自己学习计划的同时,也可以根据学习清单内容更加清晰明确地了解到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活动和有关精神,重要政策法规,国家、云南省的科研政策动态以及最新科研成果。

3. 成效双向评价。院党委建立学习成效双评价制度,指派党务工作者担任联络员负责党外科学家思想政治工作,采取加强联谊、正式与非正式沟通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在平等交流、互相尊重的氛围下,了解对方思想上的“闪光点”与不足之处,定期做出相互评价。通过以上工作,使党外科学家在密切互动中深切地体会到被关心、受尊重、受信任的组织接纳感、认同感,提升其集体归宿感、自豪感和与组织环境相适应的契合度,加强其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安排的认同感。同时,也使中共党员和党组织加强了与党外科学家的情感联络和信息沟通,使党外科学家的思想、诉求得以通过联络员及时向组织传递,疏通组织“机体神经”,形成“又

^① [德] 斯蒂芬·穆勒-多姆:《于尔根·哈贝马斯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序言)》,刘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6页。

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团结合作关系愈加亲密。党外科学家对党的领导和对实现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国家振兴的政治共识不断升华。

此外，在整合党内外科学家价值诉求的基础上，K研究院党委还进一步加强对党外科学家利益诉求的关注和维护。尤其注重以意义和利益的共同性为抓手，通过“最大公约数”强化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抓好统一战线工作统筹组织党外科学家积极参与边疆冶金科研创新。应当说，这些切实举措是K研究院冶金科研工作取得突出成效的重要原因。

（三）参与性分析

“团队导向”是衡量一个组织内部参与性的核心要素。党外科学家是促进云南冶金科研发展、振兴边疆冶金科研创新的重要力量。怎样调动党外科学家参与K研究院的科研事业，助力边疆冶金产业朝着先进产业发展方向努力，是新时代做好边疆科研统一战线工作的又一关键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好职能”^①。院党委将多党合作精神深度嵌入研究院和科研团队组织文化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与坚持党外科学家的科研主体地位，逐渐形成精诚团结、紧密协作的“同心圆”结构。

团队导向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为此，K研究院有以下方面的实践探索：

1. 对组织内部的党外成员进行能力整合。K研究院党委首先了解每位参与科研的工作人员的专业特长，并以此为基础对党外科学家进行合理的、有针对性的专业技术项目攻关工作安排，为他们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环境氛围，提供给每位科研人员充分展示自身才华的舞台，扩大科研创新研究参与范围，使其进一步提升自身履职能力；其次了解每位科研工作参与者的基本经济诉求、生活需要，实行人文关怀，加强对他们的激励和帮助，最大程度解决他们的生活、经济诉求问题，帮助他们排除生活琐事的烦扰，更加专注于科研创新、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率等工作。

2. 形成能力要素的向心力。各个民主党派、无党派的科学家们，也积极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在行动上落实组织建设。目前，K研究院已经建成九三学社分社，在研究院党委的领导和帮助下定期开展活动。下一步，研究院党委还将开展工作调研，符合条件的研究院发展需要的，研究院党委将提供政策和资源，给予大力支持，帮助他们建好组织、开展好活动、发挥好作用、出更多的科研成果，力求画好“同心圆”，充分发挥“向心力”的关键作用。

3. 用人才激励机制激发团队内部的参与愿望。K研究院党委为充分保障党外科学家基本利益，印发了《K研究院人才队伍建设方案》，明确了党外科学家、科学人才的工作安排以及职责分工，大力开展“人才托举工程”，为包括党外人士在内的科技人才提供了中层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两条晋升渠道，“双通道”培养模式实现任人唯贤、人尽其才，并由此提出“科研机构，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的口号。

4. 注重培养党外科学家走上组织内部的领导岗位。研究院党委综合考察党外科学家的德、能、勤、绩、廉，不拘一格选拔和使用人才，一批党外科学家先后走上领导和技术骨干岗位。其中，Y钢被聘任为研究院首席材料工程师，Z杨薇被聘任为研究院财务部副主任专员，ZL被聘任为研究院材料研究所副主任工程师，L小英被聘任为冶金环保所副主任工程师……目前，研究院

^① 《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内部已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为党外科学家积极创新、多出成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5. 建立并巩固团队合作的政治基础。把党内外价值追求与具体的个人诉求和利益相结合,关心和切实维护党外科学家的诉求。K研究院党委在重要的节日时间节点召开统战人士座谈会,及时传达研究院的党建工作和科研工作情况,研究院党政主要领导和党外科学家一起交心谈心、共话未来。在党外科学家生病住院时,党委总要安排专人前去看望,送达关心关怀。疫情期间,K研究院各党支部牵头,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与党外科学家保持沟通联系,传达研究院领导的关心,及时疏导不安情绪,增强战“疫”信心。

6. 团队建设成效显著。在了解了每位党外科学家的专精特新之后,研究院党委有针对性地做出了相应的工作安排。Z林同志就是其中一个案例典型。Z林同志是一位材料学专业毕业的中国致公党党员,长期从事有色金属加工的研发工作,擅长关于“制备锌粉”的相关科研创新研究。研究院党委根据这一情况,联合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研究院,组建了以Z林同志为核心、党内外科学家合力攻关的“一种片状锌粉的制备方法”关键工艺项目团队,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有效减少了锌浮渣堆存带来的环境污染,将低价的中间物料、初级产品转化为价格较高的生产原料,提高了资源回收利用率,增加产品多样性,降低成本,大幅提高了湿法炼锌净化除钴效率,除钴效率达到99.47%~99.72%。该项目研发,大幅推动云南省锌产业向下延伸。

除了Z林同志之外,研究院党委也根据各党外科学家自身专业情况,统筹安排了诸如Y钢、L小英、Y洪、Q忠标等党外科学家,使其与其他党内科学家一道参与各大科研项目技术攻关。

例如,Y洪同志是一位专精于铝合金技术攻关项目的党外科学家,研究院党委为其安排制定了“RE-A356.2(α)铝合金变质处理深加工新技术的研究2011CF009”的技术项目攻关。该同志以此为基础,深入铝合金项目研究,在近几年来,作为主要作者,发表了《铸造AlSi7MgLa铝合金的金相组织和力学性能研究》《稀土镧-A356铸造铝合金地方标准的编制说明》《稀土元素镧对A356.2铸造铝合金显微组织的影响》等三篇高水平论文,为铝合金项目团队的技术攻关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此之外,K研究院党委还整合多位党外科学家的专业特长,共同进行“一种用硼粉和氢化钛制备铝钛硼中间合金的方法”技术专利的项目攻关。该项专利除了上述提及的Y洪同志参与外,Y钢同志也作为该项目主要负责人参与了技术专利攻关项目。在研究院党委有效的统筹安排之下,以及各党外科学家积极响应研究院的组织安排下,K研究院最终获得了该项目的技术专利。这是K研究院党委统筹发挥党内外科学家共同努力、形成团队导向、激发组织活力的又一个成功案例。

这些举措,极大地加强了研究院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观念,有效开发了团队能力,树立起团队合作的导向。

(四) 使命感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原则、讲纪律、讲规矩,不能把党外人士当成个人资源,而要出于公心为党交一大批肝胆相照的党外朋友。”^①而建立共同的发展愿景,无疑是党内外科技工作者的“最大公约数”,是党员干部在科技战线上“出于公心为党交党外朋友”的情感纽带和实践基础。

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认为,“共同愿景”是衡量组织使命感的关键要素。振兴边疆冶金科研创新、振兴边疆产业,则是党内外科学家的共同愿景。对于云南冶金科研事业而言,引导和帮助党外科学家建立起以家乡建设为己任的思想,将振兴云南冶金行业、谱写好中国梦云南篇章作为自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62—563页。

己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就是云南冶金科研领域、中国共产党与党外知识分子、科学家们共同追求的思想的具体化。为此，K研究院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进行思想建设，通过教育宣传、组织学习等方式，积极引导党外知识分子、科学家树立以建设家乡、振兴云南冶金行业为己任的思想，积极开展了“扬帆行动”。

“扬帆行动”通过结对子的方式，将党外科学家和负责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结成一对一小队，形成思想上共同进步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思想上、观念上相互启发，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它不仅是团队成员齐头并进的基础，也是取得科研创新突破的有效形式。在长时间的相处中，负责统战工作的党员同志几乎得出同样的结论：与他们结对的党外科学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为家乡建设、为振兴家乡产业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针对这一情况，K研究院要求党内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通过自身的学习行为积极影响党外科学家，不断向结对对象传达中国共产党与党外科学家携手奋进于冶金科研新征程这一信念，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引导党外科学家跟随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发利用家乡资源优势，振兴边疆科研创新研究、振兴家乡产业。由此在党外科学家心中树立起“以家乡建设为己任，将振兴云南冶金行业、谱写好中国梦云南篇章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这一富有强烈使命感的共同愿景。

三、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

（一）组织文化模型理论视域下的优化空间分析

参照本文图1的结构，研究院在实践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创新组织文化建设中，呈现出4个方面的不足。

1. 在组织的“一致性”方面，特别是在“一致性”中的协调与整合能力有所不足。这反映出K研究院作为一个组织的“内部关注”和“稳定性”方面尚有欠缺。具体表现为：

（1）党内统战干部的专业能力和沟通效能不足，在党组织引导下，根据单位、党组织自身和党外科学家三者各自内部和外部环境形势变化，协调、整合党外科学家形成科研合力方面有改善空间。

（2）人才激励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吸引人才资源投入力度不够，部分高层次党外科研人才外流。

（3）党外科研力量的效能发挥仍不充分，研创动力不足。

（4）党外科学家大多只专注本专业领域，在参与管理决策、建言献策方面积极性不高，党外人士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2. K研究院从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化运作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适应能力不足、特别是创新和自我革新能力不强的特点。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表明，组织“适应性”的欠缺是一个组织“灵活性”与“对外关注能力”2个方面共同劣势相互叠加的结果。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出现“适应”功能障碍，几乎是长期以来事业单位转型期的共性问题。

3. 参与性不足。党外人士参与基层单位的民主管理和决策，是自下而上培育参政议政热情和能力的重要参数。借助丹尼森组织文化模型分析，发现K研究院党外科学家在参与团队攻坚方面具有很高积极性和参与性，但是在参与单位战略目标制定和组织行政管理、积极主动建言献策方面的热情不高。亦即，在业务参与性与管理参与性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

4. 使命感建设有提升的空间。在丹尼森的组织文化模型理论中，“使命感”是一个组织的对外关注与自身稳定性的叠加效应。对K研究院的分析表明，该研究院党外科学家与共产党组织和干部之间有良好的配合、互动，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广泛的共识，共同愿景清晰，战略目标一致

度较高;但同时,也部分存在着被动配合、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心理状态,以及未能充分将初心和使命感化作自身工作动力的情况。

(二) 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组织文化的优化建议

1. 突出“一致性”。进一步加快党内外科技创新力量的有效整合。以管理制度创新和激励机制创新吸引和壮大党内外科研人才队伍,激发创新动力与活力。广开言路,充分调动党外科学家参与管理、建言献策的愿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人才吸引和激励的制度机制建设,强化科学家的组织向心力及其对党、国家、科研创新事业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的团结力和认同感。

2. 提升“适应性”。一是要加强党组织引导力和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要进一步强化在党组织的引导下,及时组织学习培训,主动革新调适的能力,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提升单位、组织和党外科学家群体适应外部形势、环境变化,不断加强团结、紧密合作,适应时局风云变换带来的风险挑战和机遇,主动担当作为的能力。二是加快适应“顾客为本”的市场导向,细腻对接“政用产学研”,科技创新上、中、下游耦合,缩短企业化转型周期。

3. 加强参与性。要在积极参考借鉴公共管理学、组织行为学和心理学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勇于探索创新,进一步通过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参与途径、内容、形式建设,加强党外科学家多方位、多渠道的合作参与。不仅在专业领域科研创新方面要加强参与合作突破瓶颈,力争取得更大创新发展,而且还要在基层民主政治参与、研究院管理决策等重要方面,增加党外科学家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其参与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能力,更好地发挥智力优势,建言献策。

4. 强化使命感。要通过不断加强学习和组织引导,使党外科学家牢固树立在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国际复杂的环境、形势变化中,勇立船头搏击风浪,主动担当作为争做“弄潮儿”的科学家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不断坚定为科学事业奋斗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团结合作、共建边疆美好家园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四、结语

对K研究院进行的组织文化模型理论分析表明,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的模式,能够有效激发较强的党内外整合能力,形成显著的跨党派团队合作导向和科学家共同体内部强烈的共同愿景,在共同追求核心价值方面有着明显的组织优势。

通过综合研究分析,我们探知到K研究院在组织文化的四个重要维度上,还蕴藏着进一步优化完善的潜力和空间。这将为研究院下一步继续在党的领导下,深入探索优化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创新的体制机制,推动这一组织架构和文化构建更加成熟、定型,发挥更大的优势和效能。

研究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创新,不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建设创新,更是在科研组织中探索中国特色政党文化建构的有益尝试。有利于强化一致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关系融洽,思想上同心同德,行动上同向同行的政治共同体;有利于提升参与性,倡导协商民主,最大程度地吸纳各种意见和各方面智慧,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有利于增强适应性,倡导合作共赢,执政党与参政党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一道前进”^①,在互动中增强个人、组织之间相互适应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提升整体契合度;有利于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引领,推动党外科学家坚定初心、增强使命感,将多党合作和爱国主义精神凝聚于建设边疆美好家园的共同奋斗目标中,并切实转化为创新实践的效能。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杨松禄:《关于统战文化的属性功能分析》,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36—40页。

政党功能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提升路径探析

王晓璿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 新型政党制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总揽全局功能和政治引领功能, 充分发挥出整体性利益整合代表功能, 持久稳定的政策导向功能和内驱力功能。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 必须强化利益表达功能、合作治理功能和监督制约功能。因此,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 秉持自我革命的精神, 转变执政理念, 才能实现新型政党制度体制机制的创新发展完善; 强化民主党派参政党功能是提升政党制度效能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政党功能; 新型政党制度; 制度效能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61-0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 7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彰显出独特的政治优势, 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强劲的制度动力。但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 进一步提升政党制度效能, 更充分地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成为新时代的重大课题。政党制度本质上是政党能够切实履行功能的体制机制。因此, 从中国政治格局中各政党角色的功能出发, 设计构建政党优势互补、合作分工的高效化体制机制, 是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必要途径。

一、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中政党功能分析的缺失

政党功能是政党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概念。它与政党职能表示政党在应然状态下主观设定的目标、意向不同, 是指政党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呈现出的效用、作用。它是政党内部组织结构作用于外部社会政治环境的客观产物。由于政党功能具有复杂性、具体性, 现有的政党功能研究大多强调排除历史和国别等因素, 以政党功能的一般性为研究对象。西方学者或高度概括或具体细化政党功能。如巴特利尼和彼得·梅尔将政党功能分为代表性功能和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①而美国政治学者理查德·冈瑟和拉里·戴蒙德认为政党有七种功能: 候选人提名、选举动员、议题构

基金项目: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2019 年统战理论研究课题“政党功能视角下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路径探析”(201918)。

作者简介: 王晓璿, 哲学硕士,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与政党制度。

^① 周建勇:《现代社会中的政党: 基本功能与演进趋势》,《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 年第 6 期, 第 83—91 页。

造、社会代表、利益整合、形成和支持政府、社会整合。^①国内学者中,王长江在对西方政党功能研究的分析基础上,概括出政党的普遍性功能为利益表达功能、利益综合功能、政治录用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②周淑真从一般意义上把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概括为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功能、纲领和政策制定功能、政治生活化和政治动员功能、政治精英的培养与录用功能。^③柴宝勇认为当代政党承担着利益的代表、制定政策、实现政治理想、甄选和培植政治人才、组织和监督政府、政治社会化、政治发展、政治稳定、政治协商9种功能。^④

国内对中国政党的功能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对中国共产党的功能研究较多,如张玮、周建勇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具有整体性利益表达、延续性政策制定、多元化精英培养、集中性社会化四大功能。^⑤对民主党派的功能研究相对较少,通过知网检索,以参政党或民主党派功能为篇目主题的相关文献不过数十篇,如《民主党派与公众知识分子——对转型时期中国民主党派结构、特性与功能的社会学思考》(王磊,2001),《论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功能与自身建设》(但彦铮,2007),《参政党的历史考察》(任世红,2008),《参政党政党功能与中国政党制度的民主价值》(齐春雷,2010),《多元社会与民主党派的社会整合功能》(黄天柱,2011),《参政党社会功能开发的途径探析》(郑宪、赵剑云,2012),《参政党的社会功能探析——以国家—政党—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邱永文,2013),《民主党派社会功能的三维分析》(许奕锋,2013),《加强和完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功能》(陈立明、程芳,2013),《政治发展视域下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功能研究》(王刚,2013),《民主党派与智库的功能区分及联结》(任世红,2016),《团体提案视野下民主党派的利益代表功能探析》(黄天柱,2017)等。专著、论文集也仅有寥寥数本,例如蒋学基、黄天柱等主编的《参政党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功能》,张惠康主编《参政党功能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政党既有现代政党的共性,又有不同于西方政党的个性。中国共产党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又是中国的领导党,还是“带领人民建设新世界的革命党”^⑥。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是世界上独有的参政党,它们既不同于西方的反对党或在野党,也不同于联合执政党,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中国特殊的政党制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既要有现代政党的普遍性功能,更要有“领导—合作、执政——参政”构架下的特殊功能。深入分析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发挥对政党功能的新要求,才能真正弄清楚新型政党制度的实现路径。笔者将结合新型政党制度的应有优势,探讨与之相适应的政党功能,充分考虑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点,提出有效提升制度效能的可能路径。

二、新型政党制度对政党主体的功能要求

“新型政党制度”是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做出的重大价值判断。“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既是对70年来政党制度运行实践的高度理论概

① [美] 理查德·冈瑟,拉里·戴蒙德:《政党与民主》,徐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页。

② 王长江:《政党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47页。

③ 周淑真:《政党政治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6页。

④ 柴宝勇:《政党功能:涵义与内在逻辑》,《长白学刊》2011年第3期,第64—68页。

⑤ 张玮、周建勇:《政党基本功能视角下中国共产党的功能分析及其启示》,《贵阳市党校学报》2016年第12期,第15—20页。

⑥ 辛鸣:《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光明日报》2018年3月1日第5版。

括,又为政党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指明了方向、确立了评价标准。习近平总书记从利益表达、合作本质、制度化效果三个方面指出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而这三个方面对政党主体的功能发挥均提出了要求。

(一) 新型政党制度中的执政党功能探析

1. 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有总揽全局功能和政治引领功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制度保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为建设一个新世界、新国家而建立的政党,其使命是要构建一套新的国家制度体系。所以,它首先是作为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和治理国家的领导力量而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政党最为关键的区别之一,就是西方政党是部分性政党,只代表社会中某一个或某几个阶层的局部利益,而中国共产党是整体性政党,代表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对全体人民负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处于领航员和掌舵者的地位,自然被赋予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重大责任。

同时,政党领导权是一种政治影响力,但这种政治影响力是人民选择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时期取得的历史成就,极大地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威的历史合法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旧的历史合法性的效力越来越弱,需要注入更多新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法性。这就需要通过塑造强大的政治道德来引领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产生具有高度稳定性和可靠性的政治影响力。

2.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挥出整体性利益整合、代表功能和持久稳定的政策导向功能。

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政治上、利益上的最大公约数,其前提是必须有强大的包容力,能够主动地自觉地吸纳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是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也是中共真正实现人民代表性的制度途径。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本阶级利益的需要驱动着政党的产生。政党存在的基础和根本是利益表达,首先是表达本阶级的利益。同时,政党要想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就必须在代表本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考虑和照顾到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考虑如何把本阶级利益和其他社会阶级利益整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还必须坚持、完善和用好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不断协调整合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在爱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感召力下,“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②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党章》也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还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

中共长期的、稳定的政策引领功能检验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整合力。如果说包容力代表着不同诉求被吸纳进制度系统中,整合力就是在诸多诉求中提炼出的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符合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最大公约数。整合力的高低代表着制度效能的高低,执政党只有在新型政党制度中依法依规做好与各阶层的协商,才能做到执政为民、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实现科学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年3月22日, http://www.gov.cn/guoqing/2018-03/22/content_5276318.htm, 2020年9月21。

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3. 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提升还要求中国共产党保持其革命党本质,发挥内驱力功能。中国共产党除了是领导党和执政党,还是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革命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①中国共产党作为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使命型政党,从来不认为执掌政权后,革命任务就完成了。即使在中国国力强盛的今天,革命仍在继续。共产主义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需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奋斗。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种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正是把多党合作制度跃迁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动力所在。中国共产党只有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打破现有的条条框框、突破不合时宜的理论藩篱,在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建设中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才能激发出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

(二) 新型政党制度中的参政党功能分析

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应着重发挥好利益表达功能、合作治理功能、监督功能等政党功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民主党派的政党形象在很长一段时期模糊不清,目前仍有待进一步清晰化和鲜明化。对民主党派的功能研究还很不充分。这导致民主党派虽然有明确的三大职能,但在实践中作用和效能发挥仍有较大优化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主党派职能从最早的“参、代、监、改”发展成为新时代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三大职能,其发展历程虽经历过波折甚至停滞,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党派的职能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为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发挥提供着重要依据和基础性作用。但是只强调民主党派职能而忽视其功能,是制约参政党建设的认知障碍,不利于民主党派成为自觉自主自为的独立政治组织。民主党派虽然不以执政为目的,但具有现代政党的一般功能。这不仅是中国政党制度话语权建设的要求,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发挥的基础。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派是否能充分发挥参政党的功能和作用。

1. 加强利益表达功能。只有发挥好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功能,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真正实现整合。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他们背后是分属于不同界别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代表着这些群体的利益诉求。虽然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已经突破9000万党员,但与14亿中国人相比,仍是小部分。这“部分”人要实现“整体”的利益代表,需要一套制度化的利益协商与整合机制。新型政党制度正是这样一种重要机制。欧内斯特·巴克曾对政党做出形象描述:“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体制的水车并使之运转的导管和水闸。”^②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中共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必然居于领导地位,而民主党派处在合作和参政地位,理应贴近社会,如实表达各自所联系的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也就是说,民主党派是辅助共产党把“社会中思考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体制“水车”的“导管和水闸”。

2. 提升合作治理功能。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是执政与参政的关系,在政党关

^①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第1版。

^② 欧内斯特·巴克:《关于政府的若干思考》,牛津大学出版社,1942年,第39页。

系中是领导与接受领导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合作共事的关系。所以，合作治理功能是新型政党制度对民主党派的必然要求。首先，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必然要体现在政党合作治理功能上。新时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既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也要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友党，其组织性和知识性是非政党治理主体无法比拟的，理应成为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所以，民主党派的参政不能仅局限于决策参与，还应该全面参与到决策的执行、监督、成效评估和意见反馈等各个政治和行政环节，在国家治理的全面参与中充分发挥参政党合作治理功能，从而切实发挥参政党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功能和作用，更好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应有贡献。

3. 强化监督功能。民主党派与中共“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逻辑起点，监督功能也是民主党派重要功能之一。长期以来民主党派作为接受中共领导的友党，往往将监督寓于双方的协商中，主要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监督的刚性作用较为欠缺，监督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监督功能的发挥常常成为民主党派三大职能的短板。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趋强烈，在民主、公平、公正方面的诉求不断提升，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背景下，尤其要求民主党派发挥好监督治理功能。虽然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是软性监督，但仍应不断通过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设计优化，使之在公共决策和国家治理中充分发挥监督制约作用。

上述的政党功能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彼此关联、互为支撑，需要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充分激发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因此，在对我国政党的角色功能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加强和优化政党功能发挥的制度机制和渠道平台建设，是新型政党制度建设的重大课题。

三、新时代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路径探寻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主导者和操盘手，其履行政党功能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政党制度的效能发挥。作为领导党，中共要切实履行好领导职能，提升政治领导力，增强权威性和感召力，感染和带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力、为人民服务。主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1. 要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总揽全局功能，作为总舵手在中国发展的航船中确保正确航向，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在中国共产党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方面，要通过法治化路径确保中共对民主党派的领导，但同时要注重维护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性，防止地方党委直接干预民主党派内部组织事务。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成为国家意志。^①至此，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②换言之，中共和民主党派是相互独立的政治组织，不存在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要放在中共的全面领导

^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上网日期阙如，<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1/65717/65718/4456007.html>，2020年9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147页。

语境下理解。《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1986年中共首次提出“政治领导”概念，明确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方式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①但在实践中，这种政治领导容易变形走样成为直接组织干预。尤其是一些基层统战部门和民主党派组织认为组织上的干预理所当然，甚至认为这对民主党派开展活动有好处。这样的认识制约了民主党派组织的自主发展，将会对新型政党制度的内部资源开发造成负面影响。在2016年党外人士新春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航船要抵达全面小康社会的彼岸，既需要中国共产党为这艘巨轮掌好舵，也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统一战线成员一起划好桨。”^②党和国家通过政策、法规体系建构，在体制机制上确保民主党派自觉自主自为的外部环境，通过制度建构来保障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建立在平等协商基础上的“团结合作”。

2. 通过党的政治建设和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强化中共的政治引领功能，增强政治感召力和政治权威性，感染和带动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真心诚意参政为民。毛泽东讲过：“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③可见，领导带动党外人士跟党走靠的是以能力服人，让他们对中共的全局把控能力充分信任；靠的是以精神感人，让他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中共的赤诚为民之心、求真务实之貌。老一辈中共领导人正是以党不断追求和践行真理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让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的时间愈久，党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就愈容易滋生简单依赖权力来巩固领导地位的思想，这会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功能的发挥。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只要稍有放松，就会纵容错误思潮和言论散播社会，破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象、削弱领导威信，甚至侵蚀党的领导合法性。所以，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重拳出击惩治腐败，在党内形成了反腐高压态势，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同时通过各种思想教育活动重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凸显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能力、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给出了实实在在的要求，为中国共产党提升政治领导力提供重要保证。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狠抓意识形态工作，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和理论大众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提出“民主党派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出积极作用”，人民政协“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打造统一战线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优势的升级版。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秉持自我革命的精神，转变执政理念，实现新型政党制度体制机制的创新发展完善

1. 要从观念上切实加强民主党派合作治理主体地位的重视。要让多党合作理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的共识，要“树立民主党派既是工作对象，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治国的重要政党主体的工作理念”。^④加强对中共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应把新型政党制度理

^① 杜青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党合作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239页。

^② 习近平：《画出最大同心圆》，2016年1月13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1-31/7741582.shtml>，2020年9月21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2页。

^④ 任世红：《国家治理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2019年第5期，第44页。

论教育作为各级党校的必修课。

2. 要提高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能力。“中共各级党委应从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支持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参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参与治理决策的协商、治理过程的监督和治理绩效的评估,实现多党合作治理的均衡发展。”^①一方面要制订完备健全的合作细则,扩大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半径,尤其是在基层党组织和民主党派支部联合做好基层治理方面创新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应考虑把支持民主党派履职作为地方党委政府考核指标之一,激发地方党委政府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3. 要从制度上保障中国共产党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监督。习总书记多次讲到“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②执政者天然具有对公权力的支配权,如果没有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权力滥用、权力寻租必然会发生。所以执政者必须自觉主动地接受人民监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一个重要因素是它具有革命党特性,具有“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力,具有自我革命的精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虽然长期执政,但能够自觉主动接受监督。民主党派从“异体”^③政党的角度监督中国共产党,是新型政党制度发挥优势的重要方面。

(三) 强化民主党派参政功能是提升政党制度效能的关键所在

激活民主党的政党功能,把民主党派放在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考察,除了展现其作为参政党协助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品质和技能,更要发挥其作用于社会的团结力、整合力和影响力,这是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的必要条件。

1. 强化参政党意识,更好地实现民主党的利益表达功能

新时代,民主党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这一最新定位首先要求民主党派成员增强参政党意识。民主党派虽然不以执政为目的,但仍是严格意义上政党,而且从制度话语权构建考虑,其必须具有现代政党的一般性功能。所以,“民主党派代表谁?”是参政党建设的基本问题。党派成员对自身政治角色的认同是参政党建设的基石。

(1) 保持界别特色,避免政党趋同

“政党趋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中的一个老问题,也是影响甚至决定这一制度能否真正体现效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大问题。”^④政党趋同主要指民主党派与中共趋同,各民主党派之间趋同。体现在政治纲领、指导思想、关注问题、政策意见、社会基础、成员构成、组织属性、功能发挥等方面。政党过于趋同不仅不符合新型政党制度所蕴含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而且与中国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利益诉求的不断多元化不相适应。政党是一部分民众的代言人。作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应强化本党与所联系民众的联系,体现出不同于中共和其他民主党的政党形象。

民主党派与中共的不同主要应体现在履职方面。邓小平曾经讲:“共产党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

① 任世红:《国家治理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2019年第5期,第45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③ 吴晓林、万国威:《合法反对与异体整合:中西政党关系的比较研究》,2015年11月12日, http://www.cssn.cn/zzx/xsxx_zzx/wxl/201511/t20151112_2578281.shtml, 2020年9月23日。

④ 黄天柱:《中国政党趋同的现状分析与解决思路》,《中央社会主义学院》,2020年第1期,第31—44页。

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更加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①民主党派不能只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帮助中共解决问题,而是要在宏观的政策制定上发声,从不同于中共的角度思考问题。民主党派之间要突出界别特色,做到互补互强。不仅要在组织发展范围上突出界别,更要体现在职能发挥上,应在界别特色基础上形成优势领域。

(2) 树立政党形象,避免等同“智库”

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逐步把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纳入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中,为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提供智力支撑。由于民主党派与智库同时具有人才集中和资政的职能的特点,目前有一种声音认为应该把民主党派与智库等同起来,把民主党派视为中共的智库。此观点不仅混淆了民主党派和智库的性质和功能,而且其产生的深层次根源是长期以来民主党派政党形象缺失。

作为政党,民主党派是连接社会与国家的政治组织,是反映和代表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利益诉求、参加国家政权的参政党。对社会而言,民主党派是一部分民众的政治代表,具有利益代表、政治动员、精英吸纳、社会团结等功能;对于国家而言,民主党派是参与国家治理的参政党,具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干部输送等功能。尤为重要的是,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友党,双方实行政党协商和政党监督,对于共产党实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和长期执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②所以,树立民主党派的政党形象,激活其作为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政党意识、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既有利于更好地抵御西方对我国政党制度的质疑和指责,自觉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又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2. 强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完善参政议政制度机制

民主党派的合作治理功能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在政党协商和相互监督中合作,帮助共产党做好领导党和执政党。二是在国家政权建设中,作为参加政权的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在治理决策的协商——治理施策的监督——治理绩效的评估等环节合作协商。也就是说,中共领导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只有贯穿于合作治国的各个环节,延伸到合作治理的各个层面,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③

一是进一步做实做好政党协商,不断推动其规范化制度化,更好发挥民主党派与中共广泛多层合作和共同协商治理的功能。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加强。从中央到省市对政党协商有了明确要求和制度保障,政党协商成为党和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方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着重从政党协商方面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全会还指出要“完善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充分发挥政协这一专门协商机构的政治和组织优势,提升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界别参与民主协商和国家治理的效能。协商是一种对话沟通过程,协商中,民主党派不仅需要敢讲话、讲真话,而且需要不断提高协商技巧和能力。民主党派在协商实践中,可以合理吸收借鉴在西方成熟的协商议事技术方法,例如罗伯特议事规则等。要历练协商能力,力争以低成本和少摩擦达成合作及共识。

二是进一步完善参政议政相关制度机制,确保民主党派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加强民主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注重培养使用,加强监督管理,健全工作机制,打造综合素质硬、履职能力强的党外后备干部,为更好参政做好长远规划。在地方治理中发挥好民主党派参政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2—273页。

② 任世红:《民主党派与智库的功能区分及联结》,《团结》2016年第6期,第43—48页。

③ 任世红:《国家治理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化》,《中央社会主义学院》2019年第5期,第51页。

议政职能。随着治理理念的深入人心，除了传统的参政议政外，各地党委政府应主动搭建平台、创造载体让民主党派能够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及其执行、监督中，发挥好民主党派的“导流”作用，缓冲利益相关者的对立和矛盾。

3. 拓展民主监督制度化渠道，加强民主党派政治监督功能

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由于没有强制力，监督体制机制也不够健全完善，监督功能发挥不足。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要求民主监督功能发挥成为民主党派发挥职能的“重头戏”。因此，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要“健全相互监督特别是中共自觉接受监督、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等机制”。要达到这一要求，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是明确执政党和参政党在相互监督中的职责和权力。执政党既有对参政党的监督权力，更有接受监督和对监督做出反馈的责任。中共要做到“虚心公听”，“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参政党的民主监督的职责和权力更需要明确清晰，才能为民主党派“凡议国事，惟论是非，不徇好恶”提供保障，解除其后顾之忧。中共和民主党派可以通过政党协商列出责任清单和权力清单，为民主监督划定范围和边界。

二是提高民主监督的程序化规范化，彰显参政党监督功能的自主性。十八大以来，中共和民主党派探索出专项民主监督新形式，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出重大作用。专项民主监督的常态化长效机制探索业已提上议事日程。目前来看，专项民主监督与国家治理和公共政策之间具有内在相关性。优化公共政策决策机制需要民主党派专项民主监督的介入才能提高公共政策运行质量和效益。

三是探索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与其他监督形式的结合途径，确保民主监督的政治威信。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应该作为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等权力性监督形式的补充，打造监督合力，发挥出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整体优势。

四、结语

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提升要求各民主党派必须保持其特殊性、不可替代性，能够通过制度化、程序化的体制机制，真正反映出具有现实性和代表性的利益表达。更要求中国共产党不断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优化领导力和执政力，更好在新型政党制度中通过与民主党派政治协商、相互监督，发挥整体性、长远性、根本性的利益代表功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发挥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执政党和参政党各司其职，围绕国是充分沟通协商，彰显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效能。

责任编辑：罗 雷

协商民主研究

新时代首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及制度化建设研究

姚 革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主义学院, 北京 100010)

摘 要: 协商民主不仅影响到治国理政和重大决策, 也影响基层治理的基本方法和作风。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机制的优化完善,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层协商民主现状, 可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 对于协商民主的功能认识, 基层协商民主内涵的界定, 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等方面把握。分析新时代首都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和制度化建设中存在的障碍, 发现存在利益表达机制不够顺畅, 议题的选择缺乏聚焦性和代表性, 协商主体之间不平等导致协商讨论不够深入充分, 基层协商民主容易演变成精英式民主, 协商与决策存在分离和脱节, 缺乏对基层协商民主效果科学、成熟的评价体系等制约因素。笔者建议从以下方面优化基层协商民主运行的制度机制, 推动其制度化发展: 建立“下情上达”的利益表达机制; 建立重大议题的甄别机制; 建立协商参与者的遴选机制与更替机制; 规范现有的协商民主形式, 强化民主监督机制; 适应时代的发展, 创新和完善协商的运行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机制。

关键词: 基层协商民主; 运行机制; 公众参与; 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 DF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70-08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 推进协商民主就是要找到人民群众意愿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只有坚持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才能真正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保障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民主不仅影响到治国理政和重大决策的思路和程序, 也影响基层处理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和作风。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和体制的完善,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通过座谈、访谈、问卷等调查方式, 分析基层协商民主发展和实践状况, 认为各地基层协商民主过程中遇到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是相似的, 但是解决对策和措施方面则有较大的差异性。

一、对基层协商民主现状的概述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和社会功能更加凸显, 尤其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开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中, 发挥着推动公众参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作用。协商民主也一直是民主实践的重要内容。

(一)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

基金项目: 2019年度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北京统战理论研究基地)招标课题(BJSY1918)。

作者简介: 姚革,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主政治。

从党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的发展演变。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概括“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时提出,“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选举和投票之前进行充分协商”。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同时强调“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就国家和地方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制度》白皮书中,对协商民主的内涵从基本政治制度的层面提出“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确认了“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同时指出了协商的渠道,提出了“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并将协商的渠道扩大为5个,还明确了5种协商形式,提出了“就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协商民主和公共参与、公共决策紧密相关。其中,公共参与是做出重大决策的第一步程序。习近平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提出了要坚持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协商。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界定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形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而且还将协商的渠道扩大为7个。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以协商民主为主题的中央文件,也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基础性、支柱性改革举措。此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配套文件,这标志着我国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进一步明确了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完善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通过党的这些文件规定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外延是逐渐丰富和发展的。

(二) 对于协商民主的功能认识

如果从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关系的视角来认识协商民主,协商民主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习近平同志讲过,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有学者认为,事实上,不管对民主怎么分类,如果从环节上看,两个环节都重要,这两个环节彼此不能缺失。^①第一个环节是民主选举。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人民对国家的统治一般都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间接统治就离不开选举,把最能代表人民利益并真正对人民负责的官员推选出来。第二个环节就是决策,这里面包含了协商民

^① 俞可平:《〈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总序》,塞拉·本哈比主编:《民主与差异:挑战政治的边界》,黄相怀、严海兵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主。当一个官员被选举出来后,一定要有一套制度来制约他的权力,让他在决策的过程中能够更多地听取人民群众、利益相关者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可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运用和功能发挥各自侧重于政治过程的不同环节,它们既不能相互取代,也不相互排斥。

在大多数的协商民主过程中,并不采用票决制,起关键作用的是能否影响到决策者的价值偏好和理性偏好,这是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重要区别。一人一票的票决制主要是适用于选举民主,因此,选举民主存在助长民粹主义的风险,而协商民主能降低这种风险。有人将健全协商民主平台视为网络民粹主义的治理对策之一;^①还有人主张为网络民主开辟通道,将民粹主义的非理性政治参与整合进有序的民主协商轨道^②。

(三) 基层协商民主内涵的界定

2012年党的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基层协商民主”这个概念。目前,学界对于基层协商民主没有统一的定义,对于其中的“基层”界定也存在一定的分歧,有人认为基层是指乡镇、街道和行政村、社区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自治领域;也有人认为基层从行政级别角度来界定,指的县级以上。笔者认为县乡两级的民主协商都属于基层协商民主的范畴。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中,中央明确划定了基层民主协商的范围,将基层界定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有学者曾给基层协商民主的概念做了界定,如黄国华等人认为“基层协商民主是各级党委政府在决策前与决策实施中,就涉及基层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与实际问题的,与区市县、乡镇、街道等社会范围内的村民、居民、企事业单位职工及社会组织进行的民主协商,以及基层民众之间的相互协商”^③。笔者认为这个界定比较准确和全面。

十八大以来,首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模式在不断地探索和创新,比如:北京东城区的“前门议事厅”、石景山区“鲁谷社区街道管理体制创新”、朝阳区“党政群共商共治工程”,普遍采取对话、磋商、讨论、听证、交流、沟通、商议、辩论、争论等协商民主形式,积极引导公民参与,在各街、乡、社区(村)设立“问政、问需、问计于民”的常态化党政群共商共治工程议事协商平台,组织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单位、居民等各类社会治理主体,针对社区治理问题或需求,共同协商、共同参与、共同解决问题,都是尝试构建一种基于现有治理格局基础之上的协作共治机制。

(四) 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④基层协商民主的主体是利益相关方的广泛社会公众,它的目标是公共参与和利益协调,但它与统一战线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都是寻求最大公约数。^⑤基层协商民主的功能和意义在于:可以听到不同声音,达成共识,保障决策的合法性和科学性,有效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挥“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可以畅通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进入公共讨论平台的渠道,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可以形成公众参与治理的机制,有效克服公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知情难、表达难、参与难、监督难”的弊端;可以凝聚全体社会成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① 曾豪杰:《我国网络民粹主义规律及其治理》,《理论月刊》2017年第6期,第138—142页。

② 刘小龙:《当前中国网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进态势及其治理》,《探索》2017年第4期,第48—56页。

③ 黄国华、吴碧君、王小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视域下的基层协商民主研究》,《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25—29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第1版。

⑤ 杨卫敏:《论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战略思维》,《统战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1期,第4—18页。

二、新时代首都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化建设中存在的制约因素

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处于探索和试验阶段，各个地方没有统一的模式和程序。北京作为首都，政治稳定是优先考虑的因素，在协商民主实践方面受到一定的制约，协商体制和机制还存在不够完善之处。当前，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五个环节：利益诉求表达机制、议题确立机制、协商讨论机制、形成决策机制、转化决策反馈机制等。笔者认为，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化建设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利益表达机制不够顺畅

在当前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差异就需要协商，协商是不同观点的合理表达，目前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的困境是利益表达机制不够顺畅，有被动化、封闭化、碎片化的现象，存在着诱导性协商、象征性协商、掌控性协商、博弈性协商等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公共理性不足

单一理性的协商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尔斯认为：在公共协商过程中仅仅存在着一个统一的达成共识的公共理性，它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罗尔斯在《公共理性观念新探》中对公共理性进行了解释，“所谓公共理性就是指各种政治主体（包括公民、各类社团和政府组织等）以公正的理念，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在政治社会这样一个持久存在的合作体系之中，对公共事务进行充分合作，以产生公共的、可以预期的共治效果的能力。”^①有参与者认为最大的公共理性是合乎政府和党委的决策预期，这就过分强调了作为有限理性的政府发挥的作用，而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的声音，从而压抑或掩盖了真实的表达和诉求。

2. 社会尚缺乏公民社会氛围

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行为集体。社会成员基于共同利益与信仰而自愿结成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具有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的两个特点。社会组织力量弱小导致缺乏“集体发声”机制，弱势群体由于个体分散、力量弱小，在公共空间对于公共事务缺乏社会关注和参与，而这些社会力量的民主政治参与目前还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和途径。

（二）议题的选择缺乏一定的聚焦性和代表性

开展基层民主协商的前提条件是在收集民情民意的基础上聚焦民意来确定协商议题，使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可以进入到协商议程进而对公共决策的制定产生影响。但是，实践中有些议题与民众实际生活关联度不大，导致其参与热情不足，影响了协商的效果；还有些议题的覆盖面窄，公共性不强，没有协商价值。

1. 议题的代表性不足

谁能代表群众提出议题？关于代表和被代表的问题涉及到民主性和正当性。由于受时间、空间、规模和技术手段等限制，不能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参加协商民主，只能一部分人进入协商程序，而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外，这必然会影响到议题的代表性。规模越大的协商性会议，所谈论的议题越复杂重大，所要求的代表性越高，反之亦然。如何突破种种限制，在实践中提高议题的代表性，也是当前基层协商民主亟需解决的问题。

2. 缺乏高效便民的议题提交平台

如果公众有议题，向谁提交能够得到关注和解决？当前，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热线电话、信箱、公共电子邮箱、接待窗口、居民论坛、政府部门网站领导留言板、民情恳谈会等形式来受理

^① John Rawls, “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64, No. 3 (Summer, 1997), pp. 765 - 807.

诉求,但是,有些诉求没有挂牌销号制度和督办机制,没有问责和考核机制,无人回应,得不到解决和处理。

(三) 协商主体之间不平等导致协商讨论不够深入充分

1. 有效参与水平较低

实践中,协商民主的组织者一方一般是政府部门、政党团体、政治性团体,参与主体一方则是利益相关的广大民众。协商既要调整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也要调和有利益分歧的民众之间的矛盾。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是宣传部牵头推进的,四川成都的基层协商民主探索是由统战部牵头负责的。2015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民政部门要会同组织等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协商工作的指导和督促落实”,至此以后,民政部门作为牵头部门较为常见。笔者所调研的雨儿胡同30号院的公共空间布局讨论会是由民政部门牵头的。

从基层群众参与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实践的情况来看,其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以及参与能力是参差不齐的。部分群众认为无论参与与否都不能影响和改变决策结果,持“参与无效论”;还有一部分群众表现出了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意愿,但是有效参与的水平较低,往往出现“有参与、无协商”的局面。另外,基层实践中协商形式单一,通常是所谓的“座谈会”,会出现议而不决,久拖不决等情形。此外,目前参加协商的群体主要是退休人员、家庭主妇、自由职业者等,年轻人、上班族、新市民等群体往往无暇参加,因而难以发表意见和建议,没有话语权,自然也就失去了参加协商的动力。

2. 协商的包容性不足

基层协商的组织方主要是政府部门、政党团体、政治性团体、基层自治组织,协商的参与者或是社会地位较高、德高望重的专家,或是律师、企业家等社会精英,而处于弱势地位的外来务工者等群体难以参与协商,即便他们中的少数人参与了协商,往往也变成一种“沉默式缺席”,使得他们对协商结果产生不了太大影响,他们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这反映了基层民主协商包容性不足的问题。

(四) 基层协商民主在没有积极引导的情况下容易演变成精英式民主

参加民主协商的代表的产生方式,实践中有自愿报名制、随机抽签制、定额邀请制和选举制等。这些代表的产生方式各有优缺点,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地方在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实际上是综合采取以上几种方式,既有指定人选(邀请制),也有自愿报名、投票选举产生的代表。无论是哪种产生方式,如果缺乏积极引导,都容易让基层协商民主走向精英式民主的方向。

1. 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不平等博弈

政治参与的过程,也是吸纳精英的过程。精英阶层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总会逐渐显现出来,在现实舆论场和网络舆论中都遵循这样的规律。在协商过程中,协商话语权容易被政治精英阶层所掌控。协商民主需要付出社会成本,包括时间成本、组织成本、人力成本、培训成本以及误工成本等等,尤其需要协商主体持续、不间断的参与,而且进行充分多回合讨论。因此对于参与者而言,只有既对公共事务有政治参与热情,又有闲暇精力不需要忙于生计的人才能胜任。而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在对相关资源的获取和占有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不对称性。

2. 精英阶层享有“话语权优势”

在各层次的协商过程中,协商的话语权很容易集中到政治精英阶层手中,这是政治精英阶层天然的优势。在民主协商过程中,普通民众在与意见分歧者沟通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容易因信息不对称等因素陷入“自说自话”而被忽视或者轻视,这导致广大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农民工等)容易被边缘化,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相反,精英阶层在自由发言阶段,能够多次频繁发言,主动引导话语主题,导向其关注的问题核心,其他人难于置喙。所以说,以精英阶层为核心的基

层协商并不是真正的协商民主。一旦协商民主变成精英式民主,也就背离了其初衷。这一点和政党协商不同,政党协商的重点应放在精英层面,其主要任务是团结和吸纳执政党以外的各方面社会精英。^①

(五) 协商与决策存在分离和脱节的问题

1. 协商民主缺乏长效化、规范化的常态机制

从地方实践来看,协商民主为社会各方面搭建了沟通对话、谈判磋商的平台,基层协商民主的直接推动力来自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地方领导的学识、精力、判断和能力密切相关,存在着“上热下冷”现象。因此,一旦领导换届或者调任,就使得协商民主模式不可持续。而且,基层的协商民主具有随意性、碎片化、分散性的特点,缺乏长效化、系统化、规范化的常态机制。

2. 协商与决策的脱节

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各地还普遍存在协商和决策之间脱节,有“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两张皮”现象,严重阻碍了基层民主协商的发展进程。经过协商后产生的结论是民意的聚集,虽然它不像人大议案建议、政协提案那样具有法定的效力,但是对于决策机关来说,这种意见和建议是支撑决策的民主性和合法性的因子。因此,必须考虑如何将这种协商成果与正式的制度安排有效衔接起来。这种衔接一方面需要协商组织方在决策之前就及时将协商结果转化为政府的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需要政策制定机关公开地对协商所产生的结论作出响应,对于意见建议是否采纳,采纳之后将如何转化都应有明确的反馈。

(六) 缺乏对基层协商民主效果科学、成熟的评价体系

十八大以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有了许多突破、创新和发展。各地通过座谈、讨论、听证、辩论等形式开展协商,广开言路、广聚民智。但是,目前对于各地推进协商民主的效果,暂时还没有一个科学、成熟的评价体系,因此无法衡量和比较不同地方的协商民主实施效果;对于各地公民作为参与主体的协商过程和协商内容,也无法做定性量化和横向比较。

三、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机制优化探析

基层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主要围绕五个方面,包括在哪里协商(组织形式和平台)、谁来协商(协商成员的产生)、协商什么(协商议题的产生)、如何协商(协商程序的确定)、协商结果如何运用(协商和决策的关系)等环节。^② 理顺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应该从这几个环节切入。创新和完善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和体制是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重点,也是保证人民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保障。笔者认为,协商民主制度机制的优化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建立“下情上达”的利益表达机制

在现实中,自上而下“政策”的传导和执行,比自下而上的“下情上达”更加容易。“下情上达”传导到决策层和领导层的过程,会逐渐衰减。因此,如何以开拓创新的思维,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建立切实有效的“下情上达”利益表达机制,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1. 运用网络等大数据手段采集、搜集和聚焦公众的诉求

目前,在北京开展的12345电话热线,接诉即办,“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政府基层工作人员普遍反映压力极大,但群众满意度极高,还荣获2019年最佳服务案例奖及2019年度大数据应用创新示范奖。此外,北京很多基层社区在每栋楼或者每个楼门建一个微信群,居民可以随时表达利益诉求,由基层管理人员搜集上报居民的诉求。目前,运用技术手段,能够建设起覆盖到主

^① 陈家刚:《政党协商:内涵、特征和价值》,《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6期,第50—56页。

^② 李德虎:《走出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瓶颈》,《学习时报》2016年03月24日,第A4版。

流网络、政务微博、微信 app 及小程序的统一互联网平台。同理,这些技术手段也可以运用于协商民主领域,实时搜集和聚焦群众的诉求,形成有公共价值的议题。

2. 考虑协商民主的非制度化因素的影响,培育协商性公民文化

虽然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和实施多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发展,为培育公民文化提供了社会基础。但是,培育公民文化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协商民主的主体多元化要求公民社会及其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一是社会组织(NGO组织)的发展壮大,发挥独立的第三方的作用,行业组织、互助组织等集体发声维权,如北京崇西社区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成立了停车自管委员会,代表业主和政府市政部门磋商,在停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合理分配停车位。二是公民自身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不断增强,培养协商民主思维,听取不同声音,形成平等和包容的理念,遵守协商的规则,尊重和接受协商的结果,实现共治共享的和谐共赢。

(二) 建立重大议题的甄别机制

受时间、精力和经济预算等因素制约,让所有的公共议题都进入协商民主的领域并不现实,只有重大议题能进入协商民主的程序。因此,应当建立重大议题的筛选和甄别机制,提高协商民主的效率,防止无实际“公共价值”的议题进入民主协商程序。还可建立重大议题分类制度并进行评估,例如,可以将议题分为公共财政预算类、共建发展类、公共决策类、民生保障类、环境物业类、公益类、突发事件类、矛盾化解类、安全管理类等等,按照轻重缓急给予评估和排序。

(三) 建立协商参与者的遴选机制与更替机制

对于协商参与者的选择是决定协商民主质量的关键因素,选择的方式有自愿报名,随机抽样,组织者指定等。一般而论,不同年龄构成、知识构成、行业构成、收入构成的参与者会协商出不同的方案结果。因此,应当建立协商参与者的遴选机制与更替机制,确保参与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另外,协商民主是比较强调过程和程序的民主形式,选择协商会议的主持人也很重要,一般应选择独立的第三方担任主持人,主持人一般不发表个人观点,不能带有倾向性,还需要有丰富的经验来掌控协商的进程,应付各种突发的状况,纠偏跑题的参与者,引导和归纳焦点问题,控制会议的时间和节奏,有效引导议题,给每个人(组)平等的发言机会。

(四) 规范现有的协商民主形式,强化民主监督机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①。让民众享有知情权是进行民主监督的前提条件,要不断创新协商的形式,对听证会、恳谈会、辩论会、议事会、市民论坛等协商现场可以采用网络平台直播的方式,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但是,出于对多方面原因的综合考虑,北京东城区目前还没有对社区协商现场采取网络直播的形式。

1. 提高协商结果的被采纳率

随着实践的发展,协商和决策相互分离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重视协商过程而轻视协商结果的应用,直接影响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和协商的成效。协商民主不是“自娱自乐”,必须影响和应用于决策。对于重大决策,应该坚持“不协商不决策、先协商后决策”的原则。对于协商结果落实和转化的监督指标,应当纳入民主协商的评估体系。对于基层协商民主“作秀”走形式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组织和人员,要根据问责制度对其进行问责。

2. 建立信息公开透明机制

基层协商民主需要与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社(村)务公开相结合。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协商民主全过程应该及时公开,使得“暗箱操作”没有存在的土壤和空间。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杜绝“虚假公开”、“应付式公开”。

^① 习近平:《习近平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4月22日,第1版。

（五）适应时代的发展，创新和完善协商的运行机制

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时间还不长，需要和已有的制度进行有效的衔接配合，构成上下联动、多方参与的立体协商格局，而不是孤立地“为协商而协商”，这样才能减少阻力，形成政策合力。

1. 注重多种协商渠道的衔接配合

我国的协商民主体系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这七种协商渠道在推进协商民主发展中各有优势。除了人民政协是专门的协商机构，承担着经常性的协商任务，其他协商渠道属于非专门性的，当前亟需重点加强七种协商渠道的衔接。可以提倡和鼓励基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以个人身份参加所在行业系统或者居住区域等有联络的社会协商对话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基层协商，旁听而不表决，从而把基层协商民主形成的共识，通过提案、议案、民主党派的调研报告、建议等方式及时反映到人大协商、政协协商、政党协商和其他协商系统中去，从而增强基层协商民主的系统性和辐射性，发挥基层协商民主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如笔者调研的万国城社区，物业经理同时是区人大代表，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基层协商事务。

2. 采取丰富多样的基层协商形式

不断规范和完善现有的协商民主形式，适应实践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协商民主的运行机制。例如，可探索“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基层协商，利用新技术搭建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新平台，提高协商时效性和实效性，扩大协商覆盖面。

3. 把协商民主嵌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要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不断推进协商民主，把基层协商民主嵌入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之中，形成共商、共治、共议、共建、共享的格局。在此，协商民主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渐进式民主改革的过程，在协商的过程中培育公民的公共参与精神，提升其自治的意识和能力。因此，在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应坚持群众路线，使协商民主成为“凡事能商量、凡事好商量”联系群众的重要形式和组织平台。

（六）建立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机制

一般来说，评估内容包括：议题重要程度、协商程序、部门沟通、公共参与度、决策转化程度等方面，建立以公开性、包容性、开放性、实效性等为指标的基层协商民主评估体系，尤其是把对于异议的尊重程度作为协商质量的评价指标之一。评估形式包括内部评估（自评）和外部第三方评估（他评）。通常来说，引入第三方评估有利于对协商民主效果做出客观、准确、公正的评估，进而将评估结果反馈给组织和牵头部门。经过几轮评估之后，可以将评估指标体系内化为日常的工作细则，从而进一步提升协商民主的质量和效率。从2017年起，山东省政协委托山东师范大学所辖评估研究院对政协协商进行考核和评估，细化到10个项目，40余项指标，设计了“千分制评估量化指标体系”，力求做到无差异评估，值得参考和借鉴。

总之，协商民主的要旨是通过广泛的民主协商来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首先应当明确基层协商民主的定位，其次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运行机制和制度，最后是形成完整、多样、生动的基层民主实践。

责任编辑：罗 雷

人民政协推进民主协商动因及路径研究

李旭辉

(秦皇岛市政协, 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 民主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表现与主要形式。推进民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自身使命、历史任务和时代期望。在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新时期, 人民政协要把握自身的发展、发挥自身的作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践行群众路线, 不断推进民主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在高度、深度、广度上拓展,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政协推进民主协商, 要着力提升民主协商的效能, 积极加强合作共事, 参与基层协商议事, 汇聚时代发展的磅礴力量。

关键词: 人民政协; 民主协商; 协商民主优化; 基层协商; 新时期

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78-07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 重点强调“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 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①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 明确指出了“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这是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的根本遵循。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紧密和有机地结合, 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政治优势。^②在新的时期, 以人民政协为主体,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做好更广域的、多层次的民主协商, 将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

一、民主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表现与主要方式

民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民主的实质是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 实现人民当家作主。^③世界上有两大类型的民主制, 即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 无论是哪一种民主制, 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内, 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 由所在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性质决定。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是民主, 都是基于“多数人的统治”这个民主概念的理念, 直接或者间接管理国家、治理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手段和形式。^④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作者简介: 李旭辉, 研究员, 秦皇岛市政协办公室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区域经济与社会管理。

^①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2019年9月20日, www.zyztb.gov.cn/tzyw/317086.jhtml, 2020年9月1日。

^② 崔应美, 梁月群:《中国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比较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3期,第57—63页。

^③ 韩志明:《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比较——以民意信息处理为中心的技术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83—193页。

^④ 李林:《我国宪法视角下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人大研究》2015年第11期,第4—12页。

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①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在制度层面体现为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特色。

“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②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就是说，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主要发挥各不相同而又相辅相成的作用，“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的，“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它源自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源自近代以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进程，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源自新中国成立后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共同实现的伟大创造，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体制上的不断创新，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协商民主扩大了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加深了民主的内涵”，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和发展。在新时期我国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利益诉求更加多元的状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形式上、功能上、制度上、价值上所具备的独特优势，对解决社会矛盾、化解冲突、实现治理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③

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得民主协商能够按程序运行。“协”以求同，“商”以成事。协商民主主要的表现是民主协商，最大特点和优势就是“有事好商量”，商量式的民主协商成为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民主协商覆盖政党、人大、政府、政协、社会等各领域，主要包括政治层面协商和社会层面协商两大部分。在政治协商领域，主要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通过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等政党协商形式，畅通利益表达、广泛凝集共识、汇聚奋进力量。在社会协商领域，主要是针对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和制定涉及不同群体利益的决策时，党和政府与民众直接互动以及社会民众之间的有组织的民主协商，以畅通利益表达和拓宽参与渠道。^④ 除了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民主协商的范畴还包括政府之间的协商、社会民众之间的协商、新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协商等。协商的主体与客体、范围与议题、程序与过程等，都是协商民主的直接表现与具体形式。民主协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途径，而且协商中的共识和团结将进一步丰富民主的内涵。民主协商在我国的多层次实践和制度化规范，发展了协商民主。在政治协商、政策协商中，推进公共政策、社会事务的民主协商决策，凸显在复杂条件下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在社会协商、基层协商中，面对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有效协调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显示出“协商于民”的现实生命力。随着人民群众民主观念的增强，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协”与“商”中，“大家说了算”，使形成协商共识的主张被采纳、意愿能实现。例如，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的听证会、民主恳谈会，都是民主协商的形式，而且多为议事协商，有利于找到群众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推进工作发展、实现群众利益。民主协商在主观上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各领域的具体实践，在客观上契合了国家治理民主化、法治化、理性化的要求，将在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新时期常态化发展，并在实践中创新。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20 年 8 月 3 日。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2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21/c_1112564804.htm，2020 年 1 月 14 日。

③ 王利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及实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 年，第 34 页。

④ 孙萌阳：《当代中国社会协商思想与实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工业大学，2018 年，第 60 页。

二、人民政协推进民主协商动因分析

民主协商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并通过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不断推进工作提升、事业发展,最大化地实现、保障、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主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人民政协专门协商中发挥重要基础性作用。人民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推进民主协商中,有70年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民主协商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基本形态和主要工作方式,贯通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整个过程中,政协从事的视察调研、提案建议、议政建言等都是协商形式进行。^①人民政协要深刻认识自身的优势、把握自身的发展、发挥自身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推进中,积极探索、努力作为。推进民主协商是人民政协的自身使命、历史任务和时代期望。人民政协应当大力推进协商民主的进程,努力做好民主协商议事,引导全社会的议事协商广泛化、常态化、制度化发展。

(一) 人民政协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民主协商的使命

民主协商思想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以贯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被称作“协商建国”。人民政协自诞生之日起,就洋溢着民主协商的精神。国名、纪元、国家制度、国家前途等最基本的问题,都经过了协商讨论。^②“协商建国”所揭示的“协商民主”思想,为建立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后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描绘了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③彰显协商民主重要形式的民主协商,在人民政协的诞生之始、“协商建国”之日,就成为了人民政协的自身使命。1954年1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发表了《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特别指出“人民政协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④,将民主协商的职责给予明确。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一个长期性的组织”。此后,他强调,政协会议将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⑤协商建国的实践留下的这种民主协商的传统、精神、气魄,是一笔极其宝贵的政治遗产。^⑥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等民主政治力量政治地位的充分肯定。民主协商的制度化,促进了民众政治参与的理性化、有序化、组织化。

(二) 人民政协被历史赋予了实践民主协商的任务

邓颖超同志曾指出,“发扬了民主,就能集思广益”。人民政协的历史就是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实践民主协商的历史。人民政协建立初期,民主协商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等方面,体制内的政治协商、对口协商、专题协商等发挥了重大作用。专题协商中的双周协商座谈会是人民政协历史悠久、形式内容有创新的一种协商形式,1950年代制定了专门的双周座谈会办法,从1950年到1966年,双周座谈会一共举行了114次。^⑦近年来,双周协商座谈会在继承双周座谈会的基础上发展创新,主题更加丰富,讲问题、谈看法、说建议的专业性更强,民主协商成效更好。民主协商的实践,既在深度上得到延伸,又在广度上获得拓展。目前,在政协全会、议政性常委会、议政性主席会的基础上,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座谈

① 石晶:《只有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才能真正做到“懂政协”》,《民主协商报》2018年10月23日,第3版。

② 朱燕丽、任乃容:《近年来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研究》,《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0年第3期,第39—43页。

③ 李昌鉴:《六十年人民政协理论的发展与启示》,《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页。

④ 贾庆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人民政协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第4—9页。

⑤ 周恩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6页。

⑥ 郑万通:《人民政协六十年的光辉历程和重要启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42—48页。

⑦ 刘佳义:《中国式协商——论双周协商座谈会的特点和意义》,《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12页。

(恳谈)协商等方式丰富了协商的形式,同时细化内容、增加密度,提升了协商效果。从全国政协到地方各级政协,民主协商、平等议事,鼓励各种意见的充分表达和相互沟通,将重大问题、商议事项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协商,“民事、民议、民决”,充分体现协商的多元、包容、理性和共识,实现“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初心。

(三) 人民政协的发展,被赋予了推进民主协商的期望

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①“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人民政协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不断拓展协商议政的广度和深度,在发挥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充分发展、全面展开,推进民主协商彰显更大的优势、发挥更大的作用。民主协商将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有机融合,是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中协调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纽带。民主协商的形式彰显民主治理的工具性,协商功能的高位推动是党政主导下体制内协商治理的基本方向,群众路线为基础的民主协商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在底层的有效执行。^②所以,人民政协要主动作为,在协商的形态和方式上突出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本质,全力推进“相互尊重、平等协商,遵循规则、有序协商,体谅包容、真诚协商”。从人民政协工作的实际出发,在制度层面推进决策性协商、咨询性协商和沟通性协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协商,完善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制度模式。^③从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的角度出发,在实践层面推进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的同时引导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不同类别的协商,拓宽民主协商的广度。

三、人民政协推进民主协商的路径与方略

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形态是民主协商。人民政协在新中国建立、国家建设、改革发展等历史阶段,始终以民主协商为工作重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汇集力量,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主题,坚守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探索人民政协推进民主协商的路径与方略,发挥其利益表达、大众参与、情感沟通的功能,把协商民主进行到底。

(一) 人民政协推进民主协商的路径

人民政协来自人民,人民性是人民政协首要的本质属性。^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人民政协要充分体现人民性,拓展履职的空间,将民主协商作为推进工作的强有力抓手,以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抓好民主协商建设,不断创新汇聚人民磅礴力量的实践。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群众路线,全面推进民主协商

人民政协的广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特点,决定了坚持群众观点、践行群众路线应当贯穿于

①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 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0/c_1125020851.htm, 2020年9月3日。

② 胡象明、齐磊:《迈向协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土化价值与实践逻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6页。

③ 殷啸虎:《人民政协实践协商民主的路径分析》,《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18—24页。

④ 汪灿德:《论人民政协群众工作的基本原则》,《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83—86页。

人民政协工作各个方面和全过程之中;做好群众工作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基础,是政协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协适应新时代、肩负新使命、实现新作为的现实需要。^①2017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要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②人民政协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推动民主协商的全社会、多领域实践,彰显意义价值。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指出,“人民政协处于凝心聚力第一线、决策咨询第一线、协商民主第一线、国家治理第一线”,为此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在全社会倡导协商民主精神、培育协商民主文化,使民主协商不断创新、完善,特别是在基层将民主协商与群众路线充分结合起来,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2. 拓展民主协商的高度、深度、广度,扩大“协”与“商”的空间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③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是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的重视和支持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重要的政治保证,各级政协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创新性开展工作。全面推进民主协商是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政协党组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发挥好党在政协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统领民主协商推进,增强工作的政治性,提升民主协商的高度。在同级党委的全面部署中,各级政协组织要有效整合各类资源,积极探索民主协商的新形式、新方法,增加推力、破除阻力、形成合力,通过完善协商活动流程机制、健全协商办理问效机制等举措打造有深度、有担当、有情怀的协商新平台。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鼓励基层通过协商民主创新群众路线制度化形式;通过进行多层次、全方位、常态化的协商沟通,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努力达成社会的团结与共识。^④人民政协积极参与基层民主协商,一方面是牵引,使基层民主协商更具实效性;一方面是与基层党委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实现政协政治协商与基层民主协商的协调联动,拓展民主协商的广度。

3. 政协委员以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参与民主协商

政协工作的主体是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代表性强、议政水平高、得到群众认可,其言行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示范性。“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是对政协委员的基本要求,重点是“协商、议政”。在人民政协、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类智库等组织的协商议事中,政协委员不仅代表界别群众,还发挥着自己的专业优势。推进民主协商,关键是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在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多种协商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不同形式的协商议事中,政协委员的积极参与,无论是在议程安排上还是在实际效果中,都大大提高协商民主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政协委员的协商,要将“参与国是”和沉到基层、服务群众统筹融合起来。民意的表达和民意的获取是协商的起点,政协委员通过自身主体作用的发挥,主动走进基层群众中,一方面可以正向引导基层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也能够为群众政

① 尹熙祥:《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与思考》,《今日竹溪》2018年8月20日,第1版。

② 《温暖人心!习近平两会上的民生金句》,2018年3月11日,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8/03-11/8464929.shtml>, 2020年9月3日。

③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0日, 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9/20/c_1125020851.htm, 2020年9月3日。

④ 邓杨:《推进协商民主与深化党的群众路线》,《光明日报》2014年8月27日,第13版。

治参与提供平台和载体,这样就有效地缩短了利益表达与民意获取、利益整合的时空距离,为基层民主协商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途径。^①

(二) 人民政协推进民主协商的方略

1. 发挥好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人民政协是按照“专设机构、专项机构、专事其责、专业水准、专注实效”设立的协商机构,要求“专”出特色、“专”出质量、“专”出水平。^②立足新的时代坐标,积极探索协商民主之道,深刻把握民主协商的规律特点,加快完善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体系,推动人民政协制度体系适应时代要求、彰显时代特色、更加成熟定型。^③要不断构建协商体系、完善协商格局,在全体会议、常委会议、专门委员会会议协商的基础上,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等宽领域、多层次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政治协商聚焦大事,参政议政关注实事,民主监督紧盯难事,探索协商议政方式方法和平台载体,实现协商形式和协商内容相匹配、协商程序和协商效率相统一。^④工作中,要根据开展协商的中心议题,充分运用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在调研、视察、会议等环节组织各方面人士参与协商。聚焦中心任务,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在实践中完善协商内容、丰富协商形式、健全协商规则、培育协商文化,努力使协商议事常做常新、出新出彩,使建言资政建之有方、言之有理、资之有效。

2. 拓宽协商民主渠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民政协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充分发挥各项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综合效能。实现政协系统与政权系统的良性互动,充分体现了我国两种民主形式相得益彰的民主政治制度特点和优势,^⑤必须拓宽协商民主渠道,在协商治理理论研究、生态氛围、平台建设、配套制度、条件保障等方面探索实践。以协商民主对选举民主的互动双赢性补充,通过多层次、各类型、广形式的民主协商,畅通意见表达渠道、整合社会全部力量,实现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人民政协不断地拓宽协商民主渠道,完善议事协商治理制度,要以其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协商民主运行机制的健全。

3. 做好统筹推进与分层对接,着力提升民主协商在市域社会治理的效能

协商民主按照发生的逻辑、场域和议题,可分为政治协商、政策协商、社会协商,三个层次的协商民主按照各自逻辑开展与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与融合也是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应有之义。^⑥推进民主协商要遵循协商民主的自身特点与内在要求,在政府和社会多领域内有序、多层、广泛展开,做好民主协商的统筹推进与分层对接。对人民群众的新需要感受最直接、最灵敏,同时又有充足的资源和手段能够及时有效回应人民群众新期盼的是市域层面,市域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以城带乡的引擎作用、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同时具有政策制定的自主空间、解决问题的资源基础、大胆尝试的回旋余地。^⑦所以,在市域层面着力推进民主协商,能够兼顾政治协商、政策协商、社会协商,向上对接政治协商与政策协商,向下示范政策协商与社会协商,既能够在工作合力中将具体问题解决落地、共性情况汇总上报,又能够在改革先行中示范带动、积累经验。着力提升民主协商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效能,市级政协组织要针对专题协商、对口协商、

① 薛丽:《人民政协参与基层民主协商的机制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7年,第133页。

② 刘佳义:《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解放日报》2019年9月19日,第10版。

③ 董云虎:《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学习时报》2019年06月14日,第1版。

④ 陈婷:《以坚定党性做好新时代政协工作》,《四川日报》2019年09月11日,第3版。

⑤ 陈惠丰、刘家强、高波:《人民政协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8年第4期,第24—28页。

⑥ 李修科、燕继荣:《中国协商民主的层次性——基于逻辑、场域和议题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第23—30页。

⑦ 《检察日报》评论员:《认真履职尽责大力推动平安中国建设》,《检察日报》2019年12月04日,第1版。

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向全国政协、省政协学习,向县区政协、乡镇街道政协小组延伸,一方面要加强市政协党组与县区党委的密切联系、协同工作,一方面要加强政协委员在基层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并通过政协“直通车”将重点问题、重大事项向更高层级的政府及其部门反映,促进更快、更好的处理与解决。

4. 加强合作共事,推进协商民主

推进协商民主,人民政协是主体。为做到“广泛多层制度化”,人民政协需要与党委、人大、政府、社会等强化合作共事,形成新合力。改革开放后,协商民主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覆盖政党、人大、政府、社会等各领域,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全面铺开,进一步夯实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实践基础。^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突出协商民主的群众性,就是要将民主协商、群众议事发展好,展示其现实生命力。2015年0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首次对城乡社区协商工作做了系统性部署,由民政部牵头组织实施。^②推进协商民主,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人民政协就是要在协商民主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实现政协系统与党委政府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党委、人大、政府多沟通、多协同、多合作,形成“党委主导、政协主动”的大格局,同时在社会中以平等、宽容、友善的精神引领协商议事。人民政协要对其他协商渠道发挥配合支持作用,对政党协商发挥扩展延伸作用,对人大协商发挥配合完善作用,对政府行政协商发挥支持辅助作用,对社会协商发挥浸润协调作用,对基层协商民主发挥指导推动作用。^③

5. 参与基层协商议事,汇聚时代发展的磅礴力量

基层协商民主直接关涉人民群众权益,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极具创新和发展空间,有很强的发展动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基础和重点。^④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在议事协商活动中的发言权就是人民的“参与权、表达权”。人民政协,特别是市县级政协组织,包括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基层协商议事,贡献智慧与力量,推动基层群众“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这是对协商民主价值与应用的深化。多年以来,各地基层党委政府一直在探索民主协商议事,“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的工作格局初见雏形。浙江省是基层协商的先发地,早在20世纪末就涌现出了基层协商议事的典型模式,当前又致力于“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及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传统“枫桥经验”一直蕴含着丰富的协商基因,现代协商民主又为“枫桥经验”注入新的协商元素^⑤,各地学习“枫桥经验”,在各个层面协商议事中要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协商治理的有效机制,注重人民政协的有效参与。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具有强大的传统政治优势,要将议事规则、制度体系、协商平台等付诸基层^⑥,政协委员要将主体作用发挥在基层的雪中送炭、春风化雨之中。人民政协参与基层协商,要推动其在目标、理念、主体、手段和成果等方面发展创新,使基层群众成为基层决策的主体,在利益协调、矛盾消融、凝聚共识中汇聚时代发展的磅礴力量。

责任编辑:罗 雷

① 孙存良:《协商民主:人类政治文明的中国智慧》,《人民日报》2019年9月20日,第9版。

② 田凤娟:《协商民主:城市社区网络化治理的有效实现形式》,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16年,第1页。

③ 张峰:《人民政协在构建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4年第3、4期,第40—44页。

④ 石志刚:《探索基层协商民主常态化的实现路径》,《学习时报》,2017年07月03日,第3版。

⑤ 卢芳霞:《基层协商民主与“枫桥经验”创新》,《浙江工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34—139页。

⑥ 刘佳义:《发挥人民政协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重要作用》,《求是》,2014年第19期,第20—23页。

云南故事

党内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遵义—扎西会议探析

罗 雷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 协商民主是一种通过沟通协商进行集体决策或思想和行动协调、协同整合的民主活动范式, 而党内协商民主则是这种活动范式在政党内部不同程度的运用和发展。以扎西会议及其前后与之关联的一系列中共重要会议及活动观之, 中共党内协商民主呈现出从欠缺到发展的明显过程, 协商民主的重大作用和显著特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和彰显。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在时间、内容上的关联尤为紧密, 作用尤其重大, 本文中有时将两个会议合称为“遵义—扎西会议”。遵义—扎西会议与党内协商民主有极为密切之关涉。从“遵义—扎西会议群”之前, 党内协商民主欠缺、薄弱; 临近遵义—扎西会议, 协商民主急迫出场; 遵义—扎西会议是党内协商民主的一次重大实践等三个方面分析, 可阐明遵义—扎西会议形成和召开期间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和斗争实践逻辑。由此可知, 这一历程挽救了党和革命, 是党内协商民主成功实践的光辉典范, 在政党民主和协商民主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 党内协商民主; 扎西会议; 遵义会议; 民主发展; 协商成果落实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85-10

在协商民主中, 协商主要是过程和手段, 而通过协商实现协同整合或决策、治理的民主化才是协商民主的主要目的, 正如古特曼 (Amy Gutman) 和汤普森 (Dennis Thompson) 所指出的, 协商民主“有助于纠正集体行动时的失误”, “提升个体和集体的理解。通过相互的辩驳, 参与者相互学习, 认识到个体和集体存在的各种误解, 并提炼出更能经得起检验的新观点和新政策”^①。陈家刚也认为, 作为一种民主范式, 协商民主能够改善立法和决策的质量、促进决策合法化、制约行政权力膨胀、充分发挥理性的作用。^② 笔者认为, 可以将协商民主定义为人们通过平等的沟通交流、对话协商, 力求彼此充分反映和了解相关情况、问题, 表达各自的意见、诉求, 经过基于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充分讨论或其它互动形式, 最终在相互理解和必要的妥协下达成一定共识, 从而推动认知、决策和实践科学化、民主化的一种民主范式。一言以蔽之, 协商民主是一种通过沟通协商进行集体决策或思想和行动协调、协同整合的民主活动范式, 而党内协商民主则是这种活动范式在政党内部不同程度的运用和发展。以扎西会议及与扎西会议前后关联的一系列党的重要会议及活动观之, 中共党内协商民主呈现出从欠缺到发展的明显过程, 协商民主的重大作用和

作者简介: 罗雷,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讲师,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副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协商民主。

^① Amy Gutman and Dennis Thompson: Why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s Differ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8-9.

^② 陈家刚主编:《协商与协商民主》,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年, 第19—20页。

显著特性得到极大的发挥和彰显。以“联系”的观点考察事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重要立场。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关联十分紧密，为便于考察，笔者在文中一些地方将两个会议关联起来，使用了“遵义—扎西会议”之表述。

一、窥遵义—扎西会议一斑，探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范畴理解拓展

（一）协商民主范畴理解之讨论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源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①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意见》指出，协商民主涵盖了“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等方面。就《意见》文本整体内容看，笔者认为基于理论研究和现实实践的需要，其中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其范围的理解上可作进一步研究。一是“政党协商”的范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指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笔者认为若将其中的政党协商视为狭义的，则还应有一个相对广义的政党协商概念，广义的政党协商概念的范畴建议在必要时可拓展至涵盖所有政党之间的党际协商民主，政党与其它组织间的协商民主，以及各政党内部的党内协商民主。即广义政党协商应是指各政党之间、政党与与其它组织之间，以及各政党内部，通过相互沟通协商，就某一共同关心、关涉的事物在思想和行动方面达成共识、形成集体决策或彼此协调、协同整合的政党民主活动范式。广义政党协商倡导在话语机会平等和公平公正、彼此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基于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义或利益为出发点和目的展开。遵义—扎西会议所涉协商民主即为中国共产党党内协商民主，建议在必要时将其纳入广义政党协商范畴考虑。二是对于“政府协商”中“政府”的理解，笔者建议必要时可延展为涵盖一切党政部门的“广义政府”。《意见》在扎实推进政府协商有关方面还强调，要“围绕有效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加强政府协商，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无论从价值还是方法论维度考察，该话语中的“政府”角色都十分契合涵盖党委部门在内的广义政府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实际。

（二）遵义—扎西会议与党内协商民主之关涉

扎西会议是中央红军于1935年2月4日进入云南威信后，在向扎西集结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于5日至9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的总称^②。笔者与赵福超、叶晖南等学者的观点相似，认为扎西会议与其前后的一系列会议，尤其是与遵义会议关联十分紧密，构成了一个关联密切的会议群，建议称之为“遵义—扎西会议群”，主要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重要会议^{③④}。这个会议群对纠正当时王明、博古、李德等在党和红军领导中的“左”倾主义路线，使党和红军的发展获得生死攸关

①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2015年2月9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02/09/content_2816784.htm，2020年8月10日。

② 侯兴福、郑汕：《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等编：《光辉的扎西会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③ 赵福超：《遵义会议前后六次政治局会议的内在历史联系》，《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S1期，第145—148页。

④ 叶晖南：《扎西会议在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的作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03期，第16页。

的转折,推动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会议群中的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其时间、内容关联尤为紧密,作用尤其重大,笔者部分同意张劲观点,认为在一些研究和宣传中,可将两个会议“合而为一”。但笔者不同意两会合在一起时单称“遵义会议”,因为这样混淆两个会议的名称和概念,不但在两个会议的地点上会发生错乱感,而且在单独研究其中一个会议时,也会在称谓、内容、主题等诸方面发生概念混淆等一系列问题,还容易降低和弱化扎西会议的重要地位。因此,笔者认为在合并研究这两个会议时,应称之为“遵义—扎西会议”较妥,并且应注意与上述“遵义—扎西会议群”概念相区别。

以协商民主为视角,可对“遵义—扎西会议群”的发生发展从时间和逻辑上作如下梳理回溯。党内协商民主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得到正常实施运行,在这一重要因素影响下,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路线和相应错误指挥得以在党和红军中长期贯彻实施,导致党和红军陷入严重危机;必须召开遵义会议解决迫切的问题,终结王明、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路线及其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立即纠正所造成的严重错误;必须召开扎西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确定中央政治局党委分工,完成博古和洛甫(张闻天)“负总责”的交接,确定最高军事决定权行使者,以完成对遵义会议民主协商共识和结果的贯彻落实。从扎西会议及扎西会议前后一段时期考察,“遵义—扎西会议群”之前,受发展条件所限,王明、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作风专断,党内协商民主欠缺、薄弱;临近遵义会议前,形势危机倒逼党内协商民主实践迅速开展;遵义—扎西会议时党内协商民主发展形成阶段性高潮等发展阶段。应该说,遵义会议是此前党内协商民主没有得到充分实施运行,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而导致的必然纠错行动和紧急重大决策调整,集中体现了党内不同思想主张协商碰撞乃至激烈斗争交锋的会议集体协商过程,是党内协商民主的重大胜利。而扎西会议则排除重重困难、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实现了遵义会议民主协商结果——遵义会议决议的最终形成和遵义会议主要成果的贯彻落实。

二、遵义—扎西会议：党内协商民主之勃兴

遵义—扎西会议群及其之前一段时期,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呈现出从早期欠缺、薄弱,到临近遵义—扎西会议因形势日趋紧迫而迅速发展,进而在遵义—扎西会议期间达到阶段性高潮的过程和特点,具有很强的发展逻辑关联。由此,成就了通过成功运用党内协商民主,解决党和红军重大危机,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重大实践和宝贵经验。

(一)“遵义—扎西会议群”之前：党内协商民主欠缺、薄弱

“遵义—扎西会议群”之前,党内协商民主较为欠缺,这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制约党内协商民主实行的外部因素分析

(1) 受苏联影响突出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1922年7月16日至23日的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②),苏联以共产国际名义对王明、博古、李德等党和红军的领导者进行指挥甚至操控的情况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党内协商民主的发展运行。“王明和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在他周围形成了被讽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宗派组织。回国后,王明以“左”倾反“左”倾,召集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反对李立三等的领导,被同样奉行“家长制”的李立三以组织名义给予严重党内处分。“12月16日,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取消陈绍禹、秦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1900—1941),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170、171、174页。

^② 《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上网日期阙如,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4/4428165.html>, 2020年10月24日。

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处分问题的决议》。”^①“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26岁的王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②可见，当时党内民主未能充分运行，王明获得相关职务的方式虽为“当选”，但却与“米夫运作”有很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运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足或缺位的。

王明和博古等人对中央的影响、控制，很大程度上是在苏联干预下实现的。王明赴苏联前，成立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六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任总负责人。王明认为“他那里发出的代表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有传达到博古这里，才能保障不折不扣地执行”^③，因此对博古尤为器重。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总书记，由此直至扎西会议博洛（博古、洛甫）权力交接，博古一直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成员、“总负责人”、“总书记”，左右和控制中央。此间，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④。这使得该时期党的许多重大决策，实际是按照米夫、王明等的策划安排做出的，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常常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2）受白色恐怖和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局所限

当时党的活动客观上受国民党统治区（以下简称白区）白色恐怖、战争等危机和各方面紧迫形势的影响，要实行充分、广泛、规范化的党内民主很难具备相应条件。一是在白区白色恐怖笼罩下，实施党内协商民主的基本条件受到严重的破坏和制约。协商民主最重要的核心元素之一就是尽可能广泛和深入地展开沟通协商，而当时党组织在白区的白色恐怖笼罩下连集会和信息传递等都充满危险和困难，要进行大规模的、充分的协商沟通根本难以实现。例如，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就给党的地下组织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当时，打入国民党机要科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得知消息，立刻派人赴沪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但由于中共地下党员实行单线联系，无法及时传达，党的机构遭到破坏，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⑤。这一事件不仅反映出当时白区敌人反革命气焰嚣张，也反映出当时党内沟通联络的艰险。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在党内广泛深入开展协商民主，可以说根本不具备基本条件。

1931年“九·一八”事变暴发后，短短几个月内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⑥，侵略的战火不断从东三省向中国内地蔓延。日本侵略者继而制造华北事变，对华北实施残酷的殖民掠夺^⑦。遵义—扎西会议前，正是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紧要关头和非正常的战争状态时期。加之国民党的疯狂“围剿”，党和红军随时处于战争的巨大威胁和紧迫状态下，实施充分协商

① 人民网党史频道：《“不堪重负的党中央总负责”——博古》，2015年12月4日，dangshi.people.com.cn/n/2015/1204/c85037-27890254.html，2020年10月24日。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45页。

③ 人民网党史频道：《“不堪重负的党中央总负责”——博古》，2015年12月4日，dangshi.people.com.cn/n/2015/1204/c85037-27890254.html，2020年10月24日。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45页。

⑤ 李恩侠、杨徽财：《博古是怎样当上党的总书记的 卸任之后在干嘛》，2014年11月24日，news.12371.cn/2014/11/24/ARTI1416810960573929.shtml，2020年10月25日。

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42页。

⑦ 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

民主所必须的时间、场所、交通、信息传递等基本条件都受到严重制约，这是当时党内协商民主难以大规模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制约党内协商民主发展的内部因素

从内部因素考察，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的“左”倾路线错误和擅权专断作风是造成该时期党内协商民主难以施行的主要内部因素。先后实际负责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王明、博古、李德等人不但奉行“左”倾路线，死板生硬照抄照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模式，而且大搞“家长制、一言堂”^①。这对党内民主建设和民主风气之发扬造成很大破坏，导致当时在党内无论选举民主还是协商民主，都不可能得到较好实施运行。

王明成为中共中央实际掌权人后，迅速提拔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的博古^②。在这前后直至遵义会议、扎西会议前的一段时期，党内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压制和比较薄弱的。例如，王明1931年10月赴苏联前设法对博古做出安排时^③，虽然也曾“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下”“与周恩来商议”，但也仅此就报经共产国际批准，决定了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六个人选。这样重要的决策，王明如果仅“与周恩来做过商量”就做出定夺，则可见当时党内协商民主无论是程序还是实质都是十分欠缺的。

博古、李德等在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及决策过程中，党内协商民主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施和运行，这是导致“左”倾路线在党内较长时期被贯彻，以致后来必须通过召开遵义会议、扎西会议来肃清流弊，挽救党、挽救红军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博古上台，到1935年2月5日扎西会议期间，博古在扎西水田寨西边二、三里路的村子高坎（或花房子）交权，这一段时期，博古作为党中央总的“负责人”，搞宗派主义、“一言堂、家长制”，党内民主受到较大程度的破坏和限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持正确意见的优秀同志遭到打压和迫害。

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擅权专断和错误领导，突出、集中体现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1933年，当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时，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已达八万多人。博古不懂军事，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把红军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完全没有中国革命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德国人李德。李德作风专横霸道、压制民主、不听劝诫，以其“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④，在军事指挥上实行冒险主义方针，使红军陷于被动，进攻受挫后又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和“短促突击”战术同敌人拼消耗^⑤，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和挫败，被迫实施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正如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⑥

这一阶段，王明“左”倾路线恶劣的影响和博古、李德高压专断的强权领导方式、作风所造成的严重危害逐步显现和扩大，但矛盾的尖锐化和突显处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强大压力和协商

① 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22页。

② 人民网党史频道：《“不堪重负的党中央总负责”——博古》，2015年12月4日，dangshi.people.com.cn/n/2015/1204/c85037-27890254.html，2020年10月24日。

③ 李恩侠、杨徽财：《博古是怎样当上党的总书记的 卸任之后在干嘛》，2014年11月24日，news.12371.cn/2014/11/24/ART11416810960573929.shtml，2020年10月25日。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第154页。

⑥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资料选编》，贵阳：《遵义会议资料选编》编辑组，1985年，第169页。其中的“××同志”应指博古，华夫是李德的笔名。

民主经验的不足,部分对革命形势和中国国情正确把握且经验丰富的党内同志,还没有充分沟通统一思想,也尚未有序有效组织起来形成稳定的民主力量,“协商民主+会议”的斗争方式方法和经验仍较为欠缺。因此,斗争更多是分散无序的,没有形成合力。叶晖南生动地指出,“最初,战斗在第一线的红军指战员从切身的经历中感到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巨大危害,抵制仅仅限于发牢骚,如彭德怀怒骂李德的作战指挥是‘崽卖爷田心不疼’”^①。

(二) 临近遵义-扎西会议:协商民主急迫出场

陈家刚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了各种利益诉求,有效地推动了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效地促进了执政方式的转变和执政能力的提高。能够积极构建责任机制、回应机制、服务机制”,促进“协调和协商对话,能够促进政府官员重新评价自己的公共政策观念和措施,提高中国民主制度化的水平”^②。协商民主的这些优势和功能,在遵义-扎西会议之前一段时间迅速发展的党内协商民主实践中,得到了一定体现和发挥。此间,迫于生死存亡的严峻形势,协商民主实践临危出场,使急转直下的形势开始出现转机。

1. 协商民主:生死攸关的路径抉择

随着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路线错误和专断作风的蔓延,其一系列领导错误的恶果不断呈现,使党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中国革命面临空前危机。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迫切需要代表正确方向路线的革命领导集体出场,挽救党、红军和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力量一直在为此或因顾全大局而暂时“蛰伏”,或以党内民主协商方式正面交锋,他们日趋坚定和成熟,此时已做好了准备,蓄势待发。然而,应该以何种方式出场才能顺利取代“左”倾势力,实现领导权的平稳迁移和过渡,成为这次历史转折的关键和焦点。

如果以暴力方式与博古等当权者斗争或夺取领导权,就会违背和破坏中共六大《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地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地执行”^③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这势必会造成对党的政治、组织、纪律、苏维埃政权和中国革命的严重破坏,造成党的分裂,甚至由此引发新一轮更为激烈的内斗而使局面混乱失控,使党和红军丧失战斗力,从而使党和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危险境地,把中国革命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而如果仅以个人的力量,采取在时间和范围上分散的、单打独斗的方法进行诉求和抗争,则容易由于力量分散、势单力薄,导致蚍蜉撼树而完全无法取得所期望的效果,最终以卵击石,徒劳无功。

在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和深思熟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力量,最终选择了通过“协商民主+会议”的形式,解决这一次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空前的危机。协商民主的方式,避免了上述采取暴力抗争而可能导致的更严重的灾难;而通过会议方式,既可以把分散的时间和民主力量聚合起来集中发力,形成协商民主的合力和意见诉求的集中表达,又契合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体现了程序和过程的正当性合法性。

2. 从通道会议到猴场会议:党内协商民主初露锋芒

应该说,临近遵义-扎西会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内持正确主张的同志,本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逐步尝试通过党内协商民主方式和途径,向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反映实际情况,表达正确的意见建议,与博古、李德等人为代表的党内错

^① 叶晖南:《扎西会议在中共完成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的作用》,《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03期,第16页

^② 陈家刚:《中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优势》,《求是》2014年第2期,第63—64页。

^③ 《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上网日期阙如,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428362.html>, 2020年11月5日。

误路线进行民主斗争，切实取得良好成效。这尤其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等同志在遵义—扎西会议前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等重要会议所进行的党内协商民主斗争中。这次党内协商民主的成功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使上述协商民主的优势和力量初步得到了崭露和发挥。

例如，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后，“数十万敌军已在通道以北布下天罗地网。”毛泽东从实际情况出发，在通道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详细揭露了蒋介石“请君入瓮”的诡计，指出红军北上无疑是自投罗网，主张进军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通过党内协商民主+会议的方式，毛泽东争取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大多数人的赞同和共识。^①最后，博古终于认识到蒋介石在前面布置了罗网，“像李德那样死打硬拼往里挤是不行的”^②，并总结表态“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先进贵州，再北上与二、六军团汇合”。^③这显然是党内协商民主实践取得成功、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为此后通过党内协商民主解决问题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提振了信心。

又如，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黎平。“红军向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再一次十分紧迫地提到日程上来。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等与博古、李德等展开激烈争论，通过协商民主斗争最终促使会议作出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红军去湘西的方针和在会上曾经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张，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④。可以说，这次会议是通道会议的继续。^⑤

通过协商民主斗争，黎平会议后，一方面张闻天意识到只要博古、李德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张闻天在橘林里与同坐担架的王稼祥协商，提出“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认为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将张闻天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毛泽东，并传给刘伯承等几位将领，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⑥，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可见这时，遵义会议已经在非正式的民主协商中开始酝酿。另一方面博古逐渐开始认识到民主协商的重要性，“他意识到大家对今后的战略行动仍有不同的意见，确实需要集思广益，所以于1月1日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草塘）宋家大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⑦。会议经过讨论，多数人坚持黎平会议的决议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并通过了《关于渡过乌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⑧

中国共产党党内协商民主在经历了早期薄弱、缺失和受严重制约的阶段后，在王明、博古、李德“左”倾错误路线和专断作风的压制下，广大党员干部的不满情绪和民主要求积蓄了很强的“应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秉持实事求是原则并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正确结合起来的党和红军的领导和干部群众，都迫切期待能在紧要关头及时总结分析形势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尽早拨乱反正，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同志顺应历史的发展和要求，在关键时刻担当起挽救党和红军，扭转中国革命局势的重任。他在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一同行军、

① 杨少波：《通道转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74—76；赵福超：《遵义会议前后六次政治局会议的内在历史联系》，第146页。

②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57—158页。

③ 杨少波：《通道转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74—76页。

④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⑤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第157—159页。

⑥ 这里的“要开个会”，很大程度上是指要运用会议协商这种协商民主方式。

⑦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⑧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11页。

住宿和坐担架养病期间,经常与他们协商交谈^①,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博古、李德的指挥错误和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等关键紧迫问题。最终和王稼祥达成共识,“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还“商谈了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②。通过这种非正式场合“交往”“沟通”中的民主协商,形成了二人的理性共识。毛泽东同样是以这种循循善诱“随意交谈,充分讨论”的协商交往方式,使“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加趋于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接受毛泽东的观点”^③。通过这种民主协商沟通引导,毛泽东与同样察觉到博古、李德领导和指挥失误的几位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充分形成协商共识,结成反对博古、李德错误路线的党内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力量。他们在毛泽东同志的协商引导下,抓住最近协商民主和军事斗争的成果——攻占遵义的胜利,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推动实现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经过一系列协商酝酿和党内协商民主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持正确主张和路线的同志不断增进了相互沟通了解,逐步在思想观念上达成一致,在不断增强的协作和共识中愈发默契,形成了更加紧密的团结。同时他们也在协商民主探索实践中,不断增强信心、获取宝贵经验,从而为遵义—扎西会议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遵义—扎西会议:党内协商民主的重大实践

经过上述一系列协商民主的沟通、酝酿和探索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力量,为遵义—扎西会议这次党内协商民主实践和斗争的阶段性高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时,对博古、李德等贯彻“左”倾路线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部队里议论纷纷,高级将领中牢骚和不满也日益增长,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希望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④此时,遵义会议前期的协商民主基础、已较为充分,通过“会议协商”解决问题的时机日趋成熟。

1. 遵义会议:彰显协商民主力量

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举行。会上,博古作关于反对“围剿”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军事副报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王稼祥、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相继发言,彻底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在战略战术上的一系列错误,指出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还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在军事指挥上个人专断的恶劣作风。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

会议作出了下列重要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人^⑤。

不难看出,会议真正实现了“差异政治”主体间的平等协商对话,各自畅所欲言,使之前长期受博古、李德压制的不同意见、主张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讨论,拨乱反正,树立了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军事行动目标方向。与会人员民主热情高涨,协商对话充分而深入。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78—79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第78页。

③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30—131页。

④ 吴葆朴、李志英:《秦邦宪(博古)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⑤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协商民主平等对话、充分沟通协商、秉持公共理性交往交流谋求共识的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民主“应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可以说在这次酝酿已久的协商民主成功实践中，协商民主的功能、价值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协商民主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遵义会议上，博古的党性和组织观念，使他在会上能耐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批评，虽然心里不好受，但是这次他终于没有压制任何人发表意见，让大家把话充分地讲了出来。这保障了遵义会议能有一个基本的协商秩序和协商民主氛围，维护了中共六大《党章》“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①的规定，为大家能够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把真实的情况、想法充分表达出来，一起商量解决问题创造了条件。

2. 扎西会议：贯彻落实协商民主成果树风范

遵义会议虽然取得了党内协商民主的重大胜利，彻底揭露和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和重大指挥错误，推动实现了党和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但会议成果基本上还处于“气态”，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贯彻落实，甚至连最重要的决议都还来不及做出。由于随时要与敌人周旋，党中央和红军时常处在运动行军状态中，遵义会议只能见缝插针仓促举行。因此，留下了若干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主要有：一是遵义会议尚未正式做出决议，只是指定洛甫负责起草；二是会议虽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没有安排具体分工，只是提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三是没有变换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身份并未改变；四是毛泽东并未获得军事指挥权，朱德、周恩来是军事指挥者，“恩来同志”仍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可以说，遵义会议成果仍“悬在半空中”，甚至一些极为重大的事项仍悬而未决，如果不能尽快得到决策实施和贯彻落实，使之从“气态”尽快转化为“液态”（推动成果尽快得到转化实施运行）和“固态”（形成决议固定下来，通过实施取得成果），则会议成果有可能前功尽弃、付之东流。扎西会议正是在这一紧迫时刻，推动遵义会议成果从“气态”向“液态”“固态”转化的重要和关键举措。

1935年1月下旬，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后，于2月4日进入，并于2月14日离开云南威信。红军进入云南威信在向扎西集结的途中，中央政治局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6日至8日在大河滩、9日在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因为扎西是会议结束的地点，又是威信县城，故历史上将这一系列会议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的内容，主要的有以下七个方面。一是落实了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协商共识，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负党中央总的责任。二是重新开始实施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部署。三是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四是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拟定了“决议大纲”（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在中央红军中传达贯彻。五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问题。六是作出了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七是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②

由此可见，扎西会议对上述遵义会议遗留问题，一一作出了回应。只是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

^① 《中国共产党党章》（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上网日期阙如，<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58/4428362.html>，2020年11月5日。

^② 1996年10月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昭通地委联合举办了“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关于扎西会议的概念和主要内容，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达成上述共识。参见侯兴福、郑汕：《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纪要》，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昭通地区委员会：《光辉的扎西会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3—13页。

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仍未得到最终确立。但必须注意,由于在扎西水田寨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分工中,洛甫(张闻天)已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张闻天对毛泽东非常敬重,与其在中央苏区就开始建立起合作和友谊^①。尤其是在长征中,毛泽东通过一路上不断的协商交谈,已使张闻天在思想路线和对各方面主要问题的看法上与自己达成了共识。加之对毛泽东历次在关键时刻往往作出正确主张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观察,张闻天已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及其高超的领导决策和军事指挥能力。虽然不能说张闻天对毛泽东言听计从,但张闻天早在遵义会议前,就认为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决心“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因此,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路线、主张和军事指挥在党和红军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这也是毛泽东善用民主协商沟通方式方法开展工作,和张闻天能够接受吸纳正确的协商意见建议和思想主张的典型案例。

扎西会议避免了遵义会议成果的流失或缩水,是党历史上通过协商民主实践推动民主科学决策获得成功的经典案例和重大事件。在扎西会议做出权力交接决议后,博古、李德等如果放弃党性、原则和纪律,不愿交权,利用手中的权力孤注一掷挑起党内斗争,则势必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在这一关键时刻,博古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党性觉悟,个人服从中央,遵守党规党纪,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执行大会上按多数人意见通过的决议,并且没有受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不要交权”的鼓动^②。他的这种意识和品德使他战胜人生的难关,以后的革命实践历程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此事件中,一方面博古同志能在关键时刻最终坚持党性原则,选择了遵从党内协商民主结果,自觉执行党的决定,保障了在党内“负总责”的权力的顺利交接,避免了党的分裂,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此次重大事件中为遵守党规党纪做出了表率。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通过“协商民主+会议”的形式,自下而上向组织表达正确主张,提出正确意见建议,虽然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民主斗争过程,但最终取得了协商民主斗争的重大胜利。他们在坚持党规党纪,保证党的高度团结统一和凝聚力战斗力,避免造成党的分裂的重要前提下,成功促成党对正确主张的彻底接受和错误路线的彻底转变,使正确的思想路线和主张,通过合法有序的程序和渠道在党内赢得了领导权,为党内协商民主规范及其强大力量的彰显,提供了典型范例。

应该说,扎西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十分来之不易。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持正确路线和主张的同志,长时间来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沟通协商和动员说服工作,通过自己的正确分析研判和实践经验,摆事实、讲道理,反映广大干部战士的心声,争取到了自上至下多数人的拥护和共识,逐步在党内形成强大的理性共识和民主力量。这样的党内沟通和民主协商,为最终能够通过遵义-扎西会议群扭转大局,实现中国革命和历史的重大转折,发挥了重大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遵义-扎西会议群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坚持正确路线、主张的同志,在会前充分沟通协商酝酿的基础上,在会议上据理力争,以深入客观的分析和雄辩的事实,在坚持和维护程序、党内法规的同时展现了党内民主的强大优势和力量,使党内协商民主经过长期蛰伏、酝酿,继而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尝试、日趋成熟,终于在遵义-扎西会议时形成阶段性高潮。笔者认为,遵义-扎西会议做为历史上党内协商民主成功实践的一次光辉典范,当之无愧。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程中原:《张闻天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第124—126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花房子会议”考证

冯寿芳

(云南省威信县文化局, 云南 威信 657900)

摘 要: 扎西会议在中共党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遵义会议的决议是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 以及确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也是扎西会议中完成的。由于“扎西会议”的特殊性, 对其会议地点等的研究考证意义重大, 周恩来同志生前一直要求把会议地点落实清楚。笔者经研究, 认为协商确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总负责人”权力交接地, 应确定为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

关键词: 长征; 遵义会议; 花房子会议; 博洛交权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95-04

红军长征时期, 中央红军于1935年1月15日—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做出四项决定, 其中一项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但是土城一战失利, 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12个旅的兵力封锁长江, 中央红军避开川军的围追堵截, 于1935年2月5日到达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 当天晚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完成了遵义会议在“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决定, 把博古换下来, 由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周恩来生前一直要求把会议地点落实清楚。云南省威信县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回忆提到的扎西、水田寨、鸡鸣三省这些具体的地名和朱德的电文以及老红军的回忆和日记等等, 作了多方面的详细的调查和访谈。毛泽东、周恩来在长征时期的警卫员也多次到威信县指认会议会址, 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博古等的住所, 落实扎西会议纪念馆的建设。1996年10月10日由云南省委牵头在威信县召开了“红军长征在扎西”的学术研讨会, 参加会议的有云南省、市(州)、县的党史专家和学者还有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等, 大家一致认为包括1935年2月5日的“花房子会议”、2月6日至8日的“庄子上会议”、2月9日的“院子会议”、2月10日的“扎西江西会馆会议”, 统称为“扎西会议”。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 经过30年的调查落实, 终于圆满完成了周恩来同志的遗愿。

一、“花房子会议”概述及未明晰要素考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年1月18、19日党中央及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分别从遵义分三路移师出发北上。1月20日, 中央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此时得知国民党已在长江两岸以12个旅重兵布防, 无法渡江。1月24日, 红一军团一师到达土城击溃守敌侯之担部刘翰吾旅, 27、28日又与川敌达凤岗、

作者简介: 冯寿芳, 原云南省威信县文化局局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威信党史研究。

郭勋祺、潘佐部遭遇，土城一战失利。陈昌奉回忆说：“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三人在一个山洞里紧急研究决定，红军主力撤出战斗，渡过赤水。”^①2月3日，军委决定我野战军以川滇黔交界处之“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威信）为总的行动目标。”中央纵队在去水潦途中遇阻，情况变化，才转向石厢子，已是夜间。当晚朱德22时连发两次电报给各军团，24时又发电报了解各军战况，并作指示。^②4日（即当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中央首长在石厢子对红军各部的战况十分焦急，一直忙个不停。红军自长征以来，八万六千多人的队伍，过了湘江后仅三万余人。从遵义出发后，土城一战又失利，损失太大。由于川军的追击，致使我红一、二师被截断，情况不明，所以，首长们很焦急，又要不停地了解各路部队的情况，又要及时给各路部队发指示。当晚18时、22时及24时给各军团连发电报，因我一师、二师继续被川敌截断，战况十分紧急。而且川敌正分三路向我追击。总司令将敌潘文华、郭勋祺部的动态转告各部，命令注意防范，努力甩开敌人追击，并令三军团派两个得力的团和五军团掩护我右纵队通过站底、摩泥之线向川滇黔交界之扎西地域集中。朱德于当晚23时半指示林、彭、杨、董、李、罗、蔡，其中电文中第五项指出，2月5日，“军委纵队应进到水田寨宿营”。2月5日，天亮启程，按中央的布署，红军向云南威信水田寨进发。^③

1976年12月10日，长征时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那年，就是1935年2月5日，从四川边界进入云南，就是你们县，那时只听说叫扎西县，过了四川就到了扎西县的‘鸡鸣三省’，说鸡一叫，云、贵、川三省都能听到，那倒不一定。水田寨，我知道。我们到水田寨时，大约太阳偏西了。中央领导到了水田寨后又转了个弯，走得不远，就到了一个四周是丘陵，周围都是森林，有几个小村子（即花房子、楼上、高坎、芭蕉弯），中央领导和四局都在这里。这个地方地形好，有利于防御和警戒，也很安全，当晚中央首长在这里宿营，中央首长开什么会我就说不清了。”^④

1995年11月6日，当年长征时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第三次来到威信县，在威信水田寨花房子，范金标详细看了花房子上下两座房子后说：“下边的这座房子是总司令和总理住的，总司令住在那边半头的里边一间（左首），总理住这边半头里面一间。我们警卫员住在外边檐坎上，用点草铺一下就睡了。当时，我记得我们是绕开街道（绕开水田街）到这里的，周围还有几个小庄子（高坎、楼上、芭蕉弯），首长们都分住在这一带。中央开会是在总理和总司令住的房子里召开的，毛主席、张闻天、博古都是到这里来开会的。那晚开会的人不多，但会开得很长，你们讲是政治局会议，我看是对的，因为人不多，会又开得长，我们都有点支持不住。从水田这里开始，中央开的会就多了，经常都在开，而且开会的人越来越多。”^⑤

陈昌奉说：“说实话从四川来的那条路非常难走。但是，中央首长多是骑马和坐担架。主席骑的那匹马是反‘围剿’时缴获的，枣红色，‘银针插鼻’，很漂亮也很壮实，我也很喜欢。”^⑥中央队同时也到了花房子一带，二局也到了（即二科）。中央队到了这一带后，立即搭了几十个帐篷。在长征途中，中央队多是搭帐篷，不占用民房（中央队在庄子上也是如此，就是到了扎西镇也在张运文家坎下搭了几十个帐篷）。

中央领导在花房子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向石坎、大河滩方向开发了。

1984年，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常委、办公室主任李志光说：“关于博古交权的问题，总理生

① 陈昌奉回忆（冯寿芳1976年10月10访问陈昌奉）。

② 朱德电文。

③ 朱德电文。

④ 陈昌奉回忆（冯寿芳1976年10月10访问陈昌奉）。

⑤ 范金标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的回忆（1995年11月6日—8日）（冯寿芳记录）。

⑥ 陈昌奉回忆（冯寿芳1976年10月10访问陈昌奉）。

前多次提到过，总理说“我们在‘鸡鸣三省’的一个‘庄子’开会，我们住了一夜’。后来又说：‘我们在扎西‘鸡鸣三省’川滇黔边界的地方，我们住了一夜’”。^①

程中原在《扎西会议考辨》中说得也很清楚，中央红军长征的会议记录，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前都已散佚，上面提到的几个会议（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及遵义会议），都没有会议记录，都是根据文件、电报和当事人回忆等材料，经过调查、研究、考证确定的，对于“扎西会议”的调查、研究、考证也是如此，还有文件电报等，笔者认为，“扎西会议”的资料是够充足的。“扎西会议”的“花房子会议会址”、“庄子上会议会址”、“院子会址”、“扎西镇江西会馆会址”都是上述依据经过调查、研究、考证确定的。^②

老红军曾三说：“你们那个地方不是叫‘鸡鸣三省’吗！我们是到过了的。记得我们刚到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了个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我当时是搞无线电的，身体很不好，每天能保证行军就很不错了。我们就在那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个晚上。”^③

老红军潘开文回忆：“前天，（1984年11月17日谈话）中征委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要大家回忆‘鸡鸣三省’的位置和扎西会议的问题，我也参加了。吕黎平同志记性很好，他记得比较清楚。除了在扎西中央开过会以外，我记得在扎西之前的一个地方，中央也开过会，是一个丘陵地带，一个很长的房子，后边有竹林，旁边有很多梯田，门口也有梯田，这家人的门楼上还有一口大棺材。”^④

原中征委常委李志光说：“我认为找一找当时的几个作战参谋了解很有必要，他们对中央的决策都知道一些。”长征时军委二局作战科参谋吕黎平说：“对于‘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具体地点不是在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就说扎西的水田寨。”^⑤

1984年8月21日，陶永秀、郑少才访问水田寨花房子郑明秀谈话中有一段对话，郑明秀说：“1935年大红军进驻花房子时我是亲自见到的。”^⑥（下面是采访人和房主的对话摘要）。^⑦

问：“当时你多大年纪，现在（指1984年谈话时）你多大年纪？”

答：“当时我已二十多岁，现在七十多了。”

问：“你看到（红军的）马没有？”

答：“我看到五匹，拴在我家厩头，有一匹特别大，有四匹稍小一点，但都比现在这些马大。大的那匹，记得好像是紫红色的。”

问：“你发现（红军中）有大胡子没有？”

答：“有，年龄大约四十多岁。”

问：“有几个？”

答：“有一个。”

问：“（花房子）周围有卫兵没有？”

答：“有，我家房子的周围都有卫兵，而且从我家到桂花树底下，都站满卫兵，我家房子周围几个包包（小山包）都有人站起的（岗哨）。 ”

① 1984年8月8日，原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常委、办公室主任李志光在四川叙永召开落实“鸡鸣三省”位置座谈会情况座谈会上的讲话。

② 程中原：《扎西会议考辨》，侯兴福主编：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等编：《光辉的扎西会议》，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65—79页。

③ 《红军长征过昭通》编写组编：《红军长征过昭通》（内部发行），1986年，第112页。

④ 《红军长征过昭通》编写组编：《红军长征过昭通》，第215页。

⑤ 《红军长征过昭通》编写组编：《红军长征过昭通》，第215页。

⑥ 威信县老百姓称中央红军叫大红军，称红军游击队为小红军。

⑦ 陶永秀、郑少才访问花房子房主郑明秀的谈话。

问：“他们（红军）在你家开会没有？”

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开会，我从堂屋后面的板壁缝里看，（他们）把我家的大门板取下来，支在堂屋中间（当着会议桌），（他们）围在一起，不知是谈些什么还是开会。”

问：“他们（红军）在你家住了几天？”

答：“才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走了。”

花房子房主郑明秀的回忆与毛泽东当年警卫员陈昌奉的回忆相符（毛主席的马是枣红色的）；与原中征委李志光主任传达周副主席的回忆完全吻合（中央在扎西的一个庄子开会，而且只住了一夜）；与曾三、吕黎平等老红军的回忆完全一致（中央开会的地点不在贵州，也不在四川，而是在云南管辖范围的水田寨）。

威信长征史料的调查，经过反复查证、核实，确认了云南昭通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是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的会址。为此，1987年12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花房子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花房子会议”的意义与价值

193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水田寨花房子召开会议，会议于“遵义会议”后在适当的时机，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遵义会议”对“左”倾机会主义作了批判，但是中央的大权仍然掌握在博古等人手里。红军从遵义出发以来，红军的处境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周副主席说：“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张闻天也提出要更换领导。周副主席说“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要变换领导。”中共中央在花房子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撤换了博古的职务，通过提名和选举，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总书记）。张闻天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当时，中央领导称之为“常委分工”，周副主席说：“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一个‘撤销’，一个是‘推举’，可见有一个‘提名’和‘选举’的过程，这也是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博古‘交权’，洛甫（张闻天）任职，实现了在当时战争环境下的平稳过渡，也是大势所趋。”张闻天任职，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执行有了组织保证。

1996年10月10日，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之际，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中共昭通地委联合主办了《红军长征在扎西》的学习研讨会。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学术处长张琦，原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国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作者程中原；云南省委宣传部和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的领导和中共昭通地委领导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云南省博物馆和部分大专院校的教授和专家，参加会议的还有全省地、州、市有关党史、党校、文化、文物部门的同志。会议上，领导、专家和党史工作者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大家一致认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到扎西，自“花房子会议”起，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总书记），标志着党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张闻天和毛泽东的亲密合作，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贯彻执行有了坚实的组织保证。从花房子到庄子上、院子和扎西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都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大家认为统称为“扎西会议”。因此，“花房子会议”是“扎西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花房子会议”在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

责任编辑：念兴昌

文化发展

和顺侨乡宗祠文化的历史功能与当代价值

尹未仙, 刘林华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摘 要: 以祠堂为主要载体的宗祠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顺侨乡著名的八大宗祠一直传承了尊祖敬宗、凝聚宗族, 训育子孙、教化道德, 励学向上、倡导公益等功能。加强对侨乡和顺宗祠文化中优秀传统因素的现代阐释, 建构适应新时期的宗祠文化, 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文化强国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宗祠文化; 和顺侨乡; 功能; 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099-07

宗祠, 即祠堂、宗庙、祖庙、祖祠, 是供奉祖先和进行祭祀的场所, 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以祠堂为主要载体的宗祠文化,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所体现的宗法伦理、价值取向、典章制度、家族象征和人生信仰等^①文化现象, 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化理念。源远流长、繁盛不衰的宗祠文化, 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今天, 重新认识宗祠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加强对宗祠文化的传承保护, 挖掘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涵, 充分发挥其当代价值, 可以为传播中华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传统智慧, 对满足大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也有积极意义。

一、和顺侨乡宗祠概述

和顺镇位于云南省腾冲县城西南4公里处, 古称“阳温墩”。因村庄顺河依山而建, 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3年)起称“河顺乡”,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取“和睦顺畅”之意改成“和顺乡”。和顺有4000多年的人居历史, 原居民是佤族, 现今的居民则主要是距今6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从四川巴县、南京等地随军到达云南的汉族后裔。^②

和顺是云南省著名的侨乡。“侨乡指的是一种移民社会, 它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条件: 一是该地区海外移民及其后裔的人数达到一定的数量; 二是这些移民及其后裔与该地区保持较密切的联系。”^③腾冲县位于高黎贡山西麓, 与缅甸接壤, 是云南西部的重要门户和交通要冲, 是古代连结川、滇地区和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上的商贸重镇。和顺作为“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 人

作者简介: 尹未仙,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和民族社会学; 刘林华,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讲师, 研究方向为统战理论和民族文化。

① 王健康、王炳熹:《宗族祠堂的当代文化价值》,《前进》2019年第6期,第34页。

② 董平:《和顺风雨六百年》,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③ 戴一峰:《福建侨乡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38页。

多地少,有“穷走夷方急走场”^①的传统。自明以来,和顺居民前往缅甸经商采矿渐成规模。从清咸丰年间起,和顺成为中国西部进出口棉纱、生丝、翡翠的主要集散地,在缅甸经商定居的和顺人群众日益壮大,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华侨团体,并从缅甸往中南半岛以及南洋群岛开拓,逐渐辐射到世界各地。亦农亦商的传统和深厚的家园观念,使和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归侨、侨眷。20世纪90年代和顺全镇常住人口仅6500多,而侨居国外的和顺人口达18000多,分布在13个国家和地区。^②

和顺共有寸氏、尹氏、贾氏、刘氏、李氏、杨氏、张氏和钏氏八大宗祠。和顺宗祠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明嘉靖年间寸氏宗祠大门开始兴建,到1926年李氏、杨氏、钏氏宗祠建成,八大宗祠的建设跨越了数个世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顺宗祠大多变为学校、食堂、生产队集会场所等。80年代以来,和顺各宗祠经过修复、翻新,再次成为和顺开展祖宗祭祀、同族聚会等活动的场所。

二、和顺侨乡宗祠文化的历史功能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宗祠,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制度的产物,起源于祖先崇拜与神灵信仰,发端于西周宗庙,承继于汉晋墓祠,发展于唐宋家祠,兴盛于明清祠堂,宗祠的变迁与家族历史息息相关。^③宗祠不同时期的代表着宗祠文化的功能演变,但开展家族祭祀、执行族规家法、召集议事宴饮和组织家族宣传、读书易道等宗祠的传统功能一直没有改变。^④由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宗族组织的影响力弱化,加上地域因素的影响,和顺宗祠的历史功能更多体现在尊祖敬宗、凝聚宗族,训育子孙、教化道德,励学向上、倡导公益等方面。

(一) 尊祖敬宗、凝聚宗族

宗祠具有“上述祖德,中联宗亲,下启子孙”的天然血缘纽带作用。寻根问祖是人类独特的心理情结,渴望家族传承、宗族传统是个体的生命本能。宗祠作为华夏民族供奉祖先和祭祀先人的庙堂,是宗族的象征和圣殿。^⑤作为血脉传承象征、祖先灵魂载体的宗祠,必然成为祭祀祖先、凝聚族人的重要场所。

宗祠经常是某一地区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最具地域特色的建筑物。和顺八大宗祠分别建在古镇同姓族人居住较为集中的中心区域或者主干道路旁边,门前都有较为宽阔的广场,便于进行宗族聚会。其中,刘氏宗祠与李氏宗祠建筑规模最大、气势最为宏伟,而寸氏宗祠建筑最具特色。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既是家族权势和财势的展示,更是光宗耀祖的象征。祖宗牌位都设在正厅居中位置,牌位多用上等楸木、楠木等制成,整体感觉庄重、肃穆,用于表达对祖先的崇敬之情。

祭祖是宗族成员在祠堂进行的主要集体活动。每年清明,和顺各宗祠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过去还有春祭、中元祭、祖先诞辰、祖先忌日等祭祀活动。族亲们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如修桥补路、创办学校、扶贫济困等,一般也都在宗祠进行。当宗族成员操办红白喜事时,宗祠又将族人聚拢,大家在一起在各种仪式中见证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在这些活动中,摆香案、具供品、焚纸钱、跪拜祖先等庄严肃穆的仪式,赋予了宗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以神圣的意义,拉近了族

① “夷方”指腾冲以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境外,“场”为缅甸玉石场。

② 杨发熹:《侨乡变迁五十年》,《和顺乡》创刊号(1999年12月),第3页。

③ 徐俊六:《族群记忆、社会变迁与家国同构:宗祠、族谱与祖堂的人类学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第209页。

④ 罗艳春:《祠堂与宗族社会》,《史林》2004年第5期,第43页。

⑤ 王健康、王炳熹:《宗族祠堂的当代文化价值》,第33页。

人关系,强化了宗族意识,加深了宗族成员间的感情,进而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

祭祀祖宗不仅是向祖先祈福,更是教育后辈不忘祖德,在“慎终追远”中感受祖先的创业精神和道德力量,进而激发其传承责任。“祠,祖宗神灵所依;墓,祖宗体魄所藏。子孙思祖宗而不见,见所依所藏之处,即如见祖宗一般。”^①和顺宗祠除了展示宗族血脉传承,更昭示祖先的美德和功业。各家宗祠都在大门、走廊、厢房、正殿、门楼等处展示祖先们治家、经商、求仕、戍边的丰功伟绩。如寸氏宗祠大厅有楹联:“随庄躋以开滇喜姓著九边勋垂百代;佐沐英而定越幸职肩千户祀享万年。”“仗先祖之有灵桂折杏探南国家声从此振;忆故园其无恙瓜棉椒衍西行世泽到今存。”讲述了寸氏的渊源及先祖开功建业、出国经商、教育治家的光辉历程。可以想见,当寸氏后裔走进本宗族祠堂,了解家族历史、仰望列祖列宗的伟业时,必然会被祖先艰难创业的故事感动,因祖先的功业而自豪,从而在不知不觉间认同了宗族的文化传统,激发了为宗族繁盛而努力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强化了宗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除了上述传统功能,因地处侨乡,和顺宗祠还具有召唤游子回归故里、凝聚海外华人华侨的功能。据流传于缅甸华侨社会及和顺民间的手抄本《阳温墩小引》描述,和顺居民出国谋生通常是宗族成员结伴而行,到达异国他乡也是投靠亲老乡友谋事。这种主要以宗族乡土关系为牵引的海外移民和谋生之旅,具有浓厚的家族、血缘和地域色彩。^②长居国外的和顺华人会在居住地建造具有宗祠色彩的会馆,聚集开展宗族活动。而国内宗族祠堂始终是海外游子心灵归属之地,只要有可能,和顺华侨都会不远万里回到故乡,参加宗祠祭祖活动,认祖归宗。

(二) 训育子孙、教化道德

建造宗祠的目的是“祖德垂芳”,使本族子孙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辨尊卑,保证宗族代有英俊,人杰不绝,光宗耀祖。^③王沪宁指出,“家族社会化的作用对村落家族说来是维系对家族的认同感,但实际上它的作用不限于此。它通过自己的运转把一整套观念传递给人们,这些观念将影响这些人在更大范围的外部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④宗族社会正是通过宗祠文化达到训育子孙、教化道德的目的,绵延千年而不衰。

走进和顺宗祠,随时随地都能身受教化。寸氏、刘氏和李氏宗祠大门前,都立有石标杆和石斗,显示宗族子弟的科举功名。刘氏祠堂大殿两侧分别立有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三祖遗训石刻碑和清乾隆35年“永免钱粮”“保我子孙”古碑。宗族祖先的尊贵、源流的绵长和成就的卓著,对后世子孙具有巨大影响力和感召力。李氏祠堂有楹联“祭必以时,春露秋霜崇祀典;人本乎祖,父慈子孝重人伦”。寸氏宗祠门外两侧楹联书“五岳宗山百川赴海,千秋报本万古流芳”;门内两侧书“立德立功愿万世子孙书香还继,有源有本问西川父老祖泽犹存”;左门两侧有“緬千古之故家罔不本于积德,编万代之宗法亦能告夫成功”,都是告诫家族成员要报本认宗,并教导他们应如何安身立命。寸氏宗祠客堂、暖阁还有告诫寸氏后人做人守业以正道为上,训勉后人勤劳持家、诗书礼仪传家的家训。宗祠中书写的“族规”“家训”,大都提倡孝父母、友兄弟、睦近邻、崇俭朴、恤孤寡、戒淫逸、禁赌博等伦理规范,教育子孙以诚待人,以信为本,以忍处世等。

① 陈瑞:《明清时期徽州宗祖祠堂的控制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56页。

② 张山:《楸木开花 出门归家——由〈阳温墩小引〉对腾冲和顺华侨家园观念的探析》,《保山师专学报》2008年第4期,第51页。

③ 王健康、王炳熹:《宗族祠堂的当代文化价值》,第36页。

④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3页。

宗祠还是对违反宗族规范的行为进行惩戒的场所。“祠堂是家族中的长者向族中成员灌输家族意识、执行家教家法的重要场所。”^①和顺各大宗族在宗祠惩戒一切违反“族规”“家训”的行为,对有违孝道的行为执法尤其严格。宗祠“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而由孝及忠,由爱及仁,最终使族人循守礼法,不逾规矩。”^②和顺宗祠通过严格遵循仪式流程的祭祀使祖先获得后世子孙的“追孝”,而如有族人在日常生活中对父母、长辈不孝,亦会将其送至宗祠进行教育,严重者甚至会被逐出宗族并终生不得进入宗祠。

(三) 励学向上、倡导公益

“中国传统教育的本质是宗族教育”^③,族学是最为基础的教育形式。宗族通过励学活动推动宗族教育,教导宗族子弟成才向上。取得功名的先祖通常会在宗祠树碑立传,除了彰显其光宗耀祖的荣耀,还能激励后人向学。宗祠通常收藏保存着本族世系显宦名儒、忠臣孝子等重要人物的传记,这些人物的事迹是进行子嗣教化的生动教材。祖辈先贤的求学入仕之道,修身齐家的嘉言懿行,是激励后辈积极向上的楷模榜样。

和顺各宗族普遍重视兴学育才,清雍正十二年和顺创设了义学,此后各宗族纷纷筹资办学,蔚然成风,而宗祠正是办学的理想地点。清光绪年间华侨尹子章在刘氏宗祠里设的“芸香书馆”,张盈川创办的张家宗祠书馆都培养了很多英才。宗祠学馆教师薪酬由宗祠田产支付,鼓励所有宗族子弟到此求学,贫困宗族子弟读书求仕还能得到资助。戊戌变法后,留学先行者寸辅清和侨领寸尊福、寸尊寿兄弟创办了滇西最早的女校——明德女子学校,不但免收学杂费,还向学生免费提供早餐夜餐,提倡妇女解放,反对缠足。^④寸氏宗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开办“和顺女子两等小学堂”和“和顺中心小学”,一直到2000年学校才迁出宗祠;李氏宗祠至今仍有小学在办学。在各宗族的倾力栽培下,和顺人才辈出,寸氏家族的旅缅华侨中华会馆会长寸海亭、刘氏家族的光绪壬午科亚元刘宗鉴、张氏家族的“翡翠大王”张宝廷、李氏家族的哲学家艾思奇等,是各宗族的骄傲。和顺宗族为鼓励宗族子弟读书成才、建树功名,规定祭祖时的拜祖仪式,有功名者可以不计辈分和族长、长辈一起进入正厅堂。

救灾济困、养老恤残、倡导公益也是宗祠的重要功能。《礼记·大传》载“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赈济救助贫困的宗族成员,能够让族人感受到依托宗族的重要性,从而敬宗仰族,自觉维护宗族的权威,是团结族人、凝聚宗族的重要手段,这就是宗祠的“收族”之效。和顺各宗族成员,尤其是经商致富的海外华人华侨,除了进行宗族内部的互助,也不忘造福乡梓,积极开展公益活动、出资美化家园。正如《阳温墩小引》教导“自古道,富与有,眼前花柳,财本是,公众物,有散有收。你有如,留下那,银钱田亩,何不如,积些德,世代不休。”^⑤全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遮风避雨的洗衣亭、平整洁净的青石村道等,都是和顺各宗祠倡导公益,海外华人华侨积极回报乡梓的成果。20世纪初,和顺旅居缅甸的侨胞组成的具有宗族性质的社团“和顺崇新会”创办《腾越日报》《和顺乡》等刊物,倡导进步思想和新文化,

① 蔡丰明、窦昌明:《中国祠堂》,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5页。

② 谢长法:《祠堂:家族文化的中心》,《华夏文化》1994年第4期,第59页。

③ 程维荣:《中国近代宗族制度》,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第195页。

④ 尹康平:《走出国门的腾冲人的教育情结——兼论腾冲华人华侨归侨对教育的贡献》,《保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73页。

⑤ 王洪波、何真:《百年绝唱——一部早年云南山里人的“出国必读”》,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直接推动了腾冲社会的发展。^①

三、和顺侨乡宗祠文化的当代价值

宗祠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构成部分,千百年来持续影响着广大的民众。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宗族观念逐渐淡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变革,国家政权深入农村,宗族观念被阶级意识取代,宗祠的传统功能不断弱化。“文化大革命”时期,包括和顺八大宗祠在内的大多数宗祠不是被拆毁就是改做它用,宗族活动完全中断。改革开放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家庭和家族观念复苏,宗族文化在中国广大农村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一些宗祠得到恢复和重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国乡村变革的深入、乡村经济的发展,加上海外华人华侨寻祖活动的兴盛,宗祠再度进入社会视野,各地重建甚至新建宗祠的活动方兴未艾。虽然随着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发展,宗祠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宗祠的功能发生了嬗变,宗祠文化的影响力也极大减弱,但宗祠文化能够应对各种变化,在历史风雨中延续几千年,自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宗祠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源远流长、深刻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明底蕴,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而宗祠文化则反映着中华民族血脉相承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凝聚力,折射出传统文化合群和众的基本精神和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②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吸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实际,加强对侨乡和顺宗祠文化中优秀传统因素的现代阐释,建构适应新时代的宗祠文化,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强文化强国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维护边疆社会和谐稳定

“宗祠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是社会教化的有益支撑。宗祠文化凝结着深厚的血缘亲情,是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宗祠文化内含丰富的治理经验,更益于中国式社会治理实践。”^④今天,尽管宗祠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改变,但民间立祠、修祠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宗祠的社会传承仍在继续,彰显了宗祠文化深厚的民众基础。重构和顺宗祠的社会影响力,创新宗祠文化的教化功能,能够助力基层社会治理,为维护社会和谐、边疆稳定贡献力量。

宗祠文化中优秀的家风、家训、义理等内容对于当代家族教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均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和顺杨氏宗祠房檐下的遗规:“传家两字曰读与耕、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防家两字曰盗与奸、亡家两字曰淫与暴,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言、休做过分之事、休专公共之利。”其中蕴含的人伦思想与社会生活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人生教化作用和生

① 徐东、马晓龙:《民国时期旅缅华侨社团对侨乡地方教育的影响——以云南腾冲和顺崇新会为例》,《保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21页。

② 吴祖鲲、王慧姝:《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162页。

③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5日, <http://edu.people.com.cn/n/2014/0505/c1053-24973276.html>, 2020年10月8日。

④ 吴祖鲲、王慧姝:《宗祠文化的社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治理逻辑》,第160—161页。

活指导意义。有研究显示:“在宗族组织发达,宗祠活动健全的地方发现,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人际关系比较和谐、政府非法行政较少、公益事业容易推进。”^①今天的和顺宗祠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族执法功能,在宗祠修缮和宗祠活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宗族理事会、监事会等宗族组织,更多是为宗族成员服务。宗族理事会组织每年一度的清明祭祖以及其它年节庆典,开展婚丧礼仪、文化娱乐等社会活动,在对族人行为习俗的规范引导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社会组织难以替代的。作为基于亲缘、地缘形成的基层组织,宗族理事会成员多为宗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和有影响力的乡贤,在村民纠纷调解、基层社会秩序维护和村庄公益事业的协调中能发挥特殊的作用。

“600余年来,和顺华侨无论是在中缅两国封建时期的政治交往方面,还是在经贸交流方面,亦或在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②和顺宗祠重建和扩建过程中,以旅缅华侨为主的海外华人华侨出资出力极多,因此和顺各大宗祠理事会都有副理事长和理事成员居住在缅甸曼德勒、密支那等地。定期回国参加宗祠活动的和顺华人华侨看到家乡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而且社会稳定、国家安宁,能够切实感受到祖国发展振兴和民族复兴的希望。已经深深融入缅甸等住在国社会的和顺华侨华人,在新时期扩大对外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能够更好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为传递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维护边疆和谐稳定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二) 传承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强国建设

历史悠久并具有地域特色的宗祠通常是一族一地文化的集中展示区。“从宗祠建筑与其他实物来看,宗祠是古代社会遗留的产物,具有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从宗祠文化及其传播看,宗祠是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③宗祠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虽然中国宗祠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极其深厚,但由于历史原因,传统宗祠建筑保留至今的寥寥可数。特殊的地理区位及历史背景造就了和顺独特的地域文化,现存的八大宗祠是保存相对完好的清末民国建筑群,其建筑风格多样,装饰图案造型精美。一般宗祠均为传统的飞檐斗拱、瓦木结构,而寸氏宗祠大门造型中西合璧,主体建筑为典型的南亚风格。八大宗祠从建筑的样式、形制、风格、选址和用材,尤其是彩绘图案都体现出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中原文化与边夷文化、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④,使和顺宗祠文化成为一个文化“多元一体”的活化展示。和顺宗祠无处不在的家规家训以及意蕴丰富的诗词书画,意义深远的各种楹联、堂号、堂联更是具有文化传承意义。此外,宗祠祭祀本身也是一种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不仅有很强的观赏性,还能够使参与者获得突破宗族和地域界限的家国情怀体验。和顺作为一个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小镇,能够入选中国十大魅力古镇,八大宗祠建筑群与宗祠文化应该是重要加分项。对和顺宗祠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保护,对宗祠祭祀活动仪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性传承,提高民众对宗祠文化的认同感、参与感、获得感,可以为地方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主要体现为乡土建筑、传统器技、民俗风情、传说故事、村规民约、家族族谱等。^⑤但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乡土文化资源不

① 鲁先瑾:《宗族的传统与现代——变动中的农村宗族分析》,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6年,第13页。

② 寸雪涛:《和顺侨乡在中缅交往史上的地位及其成因分析》,《八桂侨刊》2015年第2期,第57页。

③ 徐俊六:《文化空间视阈下宗祠的美学意蕴》,《新疆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第151页。

④ 张发云:《地域文化交融下和顺宗祠的图案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艺术学院,2019年,第1页。

⑤ 徐声响:《农村宗祠功能转换的内在逻辑和现实选择——基于苍南县765座宗祠的实地调查》,《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第118页。

断流失, 乡土文化面临断层的危险。和顺宗祠建筑本身就是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乡土文化元素, 结合宗祠建筑特色, 利用宗祠闲置空间建立农村传统器技展览馆或者农业技艺传习馆, 将村庄即将消逝的农耕文化遗物和农村传统生产工具、生活用品集中到宗祠中进行展示或者表演式使用, 有利于提高民众保护与传承乡土文化的意识。近年来, 包括和顺宗祠的部分祠堂得到了改建、扩建, 甚至重建, 除了进行宗族祭祀活动外, 也成为村民公共活动空间, 兼做村庄文化中心和健身场地, 不仅弥补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不足, 更满足了村民精神生活需求, 实现了宗祠功能的现代转化。

华侨华人在海外中华文化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主体作用。新时代,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华文化对海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和顺宗祠祭祀活动仪式、洞经音乐表演以及体现正宗“和顺味道”的千人宗族盛宴^①对归乡的华人华侨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当他们回到住在国, 又能够发挥华侨华人在中华文化“二次传播”中不可替代的作用。^②

(三) 家国同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宗祠能够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以血缘、地缘为生长点的宗族意识的存在。家国同构是以宗法制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传统社会结构, 它使得国家与社会、与每一个个体都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形成了传统的家国共同体。^③ 当代社会, 传统的宗法制度已不存在, 但宗族社会的特征并没有完全消失, 家国同构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家是国的基础, 国是家的延伸, 家庭、家族与国家的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宗族是传统社会中维系国家与社会的媒介, 由此形成的宗族文化是培养群体凝聚力的重要依托。宗祠活动强化了家族成员的心理认同, 发挥凝聚族众、万流归宗的向心作用。家国同构使宗祠文化能够把血缘亲情融入整个国家、社会, 使得中国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血缘联系基础上产生同宗共祖的观念, 宗族意识和宗亲观念成为国家、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

“寸氏宗祠中珍藏的《腾冲寸氏宗谱·宗谱序》中阐释社会主义与家族主义之间的联系, 虽有差异, 但具有较多相通之处, 家族中的爱家与社会主义的爱国是一致的, 家庭和睦、家族和谐才会有国家安宁, 家族爱社会、社会扶家族, 家国和衷共济才能迈向大同盛世。”^④ 重新撰刻的李氏宗族祖训最高、最显眼的位置, 写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 “我们要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 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下面则是对和顺李氏后裔的教诲: 要尊祖敬宗; 要感恩祖辈先人, 感恩社会、感恩自然、感恩国家, 要爱自己的祖国, 爱自己的家族; 要率遵祖训, 勿忘尔祖, 力修厥德, 孝重亲仁, 履职敬业, 奉公守法, 为国、为民、为桑梓多作贡献, 办更多好事。^⑤ 30 条族规与国家政策法规完全契合。在新时代, 我们应该着力发掘和顺宗祠文化中“家国同构”的优良传统, 使之适应时代需求, 实现家庭、家族与国家、民族的良性互动, 进而强化中华文化认同, 促进海内外华人的相互协作, 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对于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 朱家麟

① 李青:《和顺, 百年宗祠千年事》, 2019 年 5 月 5 日, http://www.baoshandaily.com/html/20190505/content_155702214863565.html, 2020 年 10 月 9 日。

② 段华、胡恒富:《中华文化在云南周边国家的传播》,《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 第 117 页。

③ 姜义华:《自觉认知认同和继承中华文明根柢》,《北京日报》2020 年 6 月 15 日, 第 15 版。

④ 徐俊六:《族群记忆、社会变迁与家国同构: 宗祠、族谱与祖塋的人类学研究》, 第 215 页。

⑤ 李青:《和顺, 百年宗祠千年事》, 2019 年 5 月 5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2316502882302866>, 2020 年 10 月 9 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 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赵 凡

(苏州经贸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理性选择，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逻辑关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有着特定的生成逻辑，从世界历史观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发现，二者在分析方法、价值旨归和哲学基础等方面都是一脉相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激活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生命力，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导下，中国为构建“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着中国方案，旨在构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渊源；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 (2020) 04-0106-07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推动下，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性”和“世界性”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因素显著增多，反全球化的浪潮汹涌而至，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地区冲突频繁发生，这些都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时代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人类面临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背景下，这就需要凝聚世界共识和人类力量，需要给世界确立公平正义的秩序观。习近平总书记审视全球发展大势，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及世界历史思想，结合当代世界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观，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光辉，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中国智慧，为世界各国走出现代性困境提供了行动指南。本文借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观点，从世界历史的发展与演变出发，重点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渊源、时代价值和构建路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研究”(19AKS004)；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思想研究”(18MLB003)。

作者简介：赵凡，苏州经贸学院思政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接续世界历史理论的美好蓝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整体性视野是两者共同的分析方法

列宁指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①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超越具体知识领域和学科框架的整体主义视野。它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批判、社会本质及结构的揭示和未来人类社会的预测或构想等，都具有鲜明的整体性方法论特征。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历史理论的阐述，同样重在整体性思考。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实质不在于描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而是主要着眼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历史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在宏观上经历了地域性的民族历史（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和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出现之后）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状况。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各民族只有一个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统一的人类历史，而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各民族发展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才会随着资本世界化而发生转变，转变的过程就是人类不断打破孤立和封闭而获得完全解放的过程，当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历史真正成为统一的整体，走向整体世界性的民族的狭隘性才彻底消失。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将世界史与民族史有机统一起来，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将历史主客体有机统一起来，它不仅指向人类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也指向人类社会的未来，从而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秉承了这种整体性的理论叙事。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广泛、彻底。在此背景下，任何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有世界眼光和总体性视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考虑人类作为整体性的存在，它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和“民族—国家”的扩张性，它反对一切形式上的个人主义，倡导用整体性视野审视人和人之间关系、国家间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深刻体现。

（二）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是两者共同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虽然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但从探底的理论成果看，无论在逻辑起点、演进基础、核心内容、思维方法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根本超越了它。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所深嵌的“普世价值”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和典型的“种族主义”（日耳曼种族优越论）价值倾向，而马克思则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总体思想方法出发，立足于整体的社会历史过程探求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有着超越地域与民族界限的世界情怀。在马克思看来，是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②。伴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解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但马克思同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使得“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③，但这种替代并不意味着人的真正自由与解放，它仅仅给人的自由与彻底解放逐渐创造出条件。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冲破“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片面交往关系，才能在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的生产生活中获得全面发展。因为共产主义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④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价值立场。“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入，“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

①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1页。

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① 面对全球性挑战，人类只有树立起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意识，才能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才能开创人类发展的共同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在对这些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的关切中提出来的，它既追求本国利益，又关切他国利益；既谋求本国发展，又促进他国发展；既关注本国安全，又兼顾他国安全。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也就更加彰显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真谛。

（三）唯物史观是两者共同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于坚持了唯物史观，这是他超越以往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尺度。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②，但黑格尔历史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其自身的缺陷。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根本缺陷提出了尖锐批评。在马克思看来，他的历史观“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日耳曼教条的思辨表现”。^③ 不同于黑格尔以抽象的观念来解读历史，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生产实践，通过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唯物主义改造，指明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因。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内含实实在在的“物质内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还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④角度探寻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深层动力。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的，“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⑤，这里“它”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导致交往的普遍扩大。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延续和当代发展，与马克思“类”“普遍交往”“世界历史”等哲学议题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如果我们从宏观视野、纵向角度来考察和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分散走向整体的阶段及特征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既呈现同质化和融合性又充满异质化和竞争性的“二律背反”过程。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人类要想走出困局，必须在凝聚价值和责任共识基础上开展全球性协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更加紧密这一现实，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和实现世界各国共赢而提出的重要理念。

二、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思想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从理论价值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继承基础上的深度实践，体现了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毋庸置疑，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非单纯从哲学意义谈论人类的未来，而是着眼于改造世界的现实。由于二者诞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故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诸多对马克思世界历史伦理的创新性发展。

其一，生产关系之维：从揭露批判到包容互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代，马克思通过揭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内在关系，揭露了资本扩张式全球化的实质与内在矛盾。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代世界人类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

①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2月12日，第1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

都发生了广泛和深刻变化，其世界性、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空前扩展。普遍扩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使个人和民族日益突破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更加具有开放性，国际社会理念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规则性和亲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基于人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全球化和普遍化的现实而提出来的，它主张国与国之间尊重依存性，抵制排他性，在包容互鉴中实现合作共赢。

其二，实践方式之维：从阶级斗争到国际合作。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谱系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不存在同期共存、甚至长期共存的关系，因而也就不存在共赢的可能性。当今世界，尽管时代的主题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资本主义所固有本质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更为错综复杂，有时还十分尖锐，但并未激化到革命形势一触即发的地步；人民群众尽管对资产阶级统治还许多不满，但尚未觉悟到能奋起推翻资本主义的程度。与此同时，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增强了人类社会包容联动的重要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视国际间存在对抗的现实，但更强调凝聚合作共识，超越矛盾和分歧。

其三，生态文明之维：从伦理斥责到共生创造。诞生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时代的世界历史理论，强烈斥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增殖原则”对自然界“自然力”的无止境的破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仅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伦理斥责，还倡导国际社会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诸多世界历史理论所没有涉及的时代内涵，它拓展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空间，激活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生命力。

（二）从实践价值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秩序观的创新和发展，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当今世界的所有基于“竞争—对抗”的现代性病症都源 18 世纪以来以西方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更确切地讲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中叶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由此开启的国际关系演进史，表现为“一部西人主宰的……各国各民族间的联系并使之臣服于资本主义的国际规范为基本内容的……被奴役的历史。”^① 它以强权政治为支配国际关系的准则，以殖民和掠夺为其工具，以掠夺弱小国家和民族为目的，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

时至今日，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但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念的西式霸权逻辑思维依然存在，一些国家“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②，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根源。两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世界格局和关系的运演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已经证实，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③ 只有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思维，才能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安宁。人类命运共同体本着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的崇高使命，它以和平共享为理念、以相互合作为途径、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主张“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全

①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38 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354 页。

③ 董俊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困惑与破解田时事报告》，2017 年第 2 期，第 111—124 页。

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①这顺应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本质要求,有助于推动现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实践: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国际社会共同行动,是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和关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关乎未来的宏伟愿景,也是当下开展的现实运动。面对当今世界国与国联系普遍加深的现实境遇,结合当代价值多元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特点,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②这一伟大构想,无疑为当代世界探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一) 政治上:打造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当前,快速推进的全球化已经把全球现象、全球问题、全球价值等新元素融入世界历史。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趋向于整体,整个世界呈现了“使在场与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③的现代性景象。全球化运转的加速使人类共同利益不断增多并逐步呈上升趋势,但各国间的关系并未随着共同利益的扩大而趋向于整体性的合作共赢,反而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突出表现在霸凌主义泛起、单边主义抬头和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着全球化的离心力。各国携手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实际上涉及到了责任担当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球变革和治理不是各国博弈的竞技场,不是‘零和博弈’的试验田,不是‘各美其美’,而是‘美美与共’。”^④构筑伙伴关系,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大国的角色与担当尤为关键,因为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同时掌握了权力优势和道义强势。只有大国在国际交往中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共享共赢理念,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意识,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理念作为国家间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牢固基石”,在遇到矛盾和分歧时,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⑤,才能真正实现“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来统治全球,而是由……多重主体来实施统治”^⑥的富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才能推动建立合作共赢、休戚与共、包容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二) 安全上: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互信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普遍安全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⑦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和平与发展“面临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冲突、变革与守旧的抉择”。^⑧在全球化时代,安全问题不仅更加突出且越来越具有突发性和联动性,表现为一国安全问题积重难返将形成“安全洼地”^⑨或外溢成区域或者全球性的安全问题。面对错综复杂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0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541页。

③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3页。

④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第2版。

⑤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1版。

⑥ 修远基金会:《新全球化时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纵横》2015年第5期,第18—2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9页。

⑧ 王毅:《在世界变局中坚定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求是》2017年第1期,第13—15页。

⑨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84页。

的国际安全威胁，各国必须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共建共享促进世界普遍安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框架下，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首先要对国际安全上的“蝴蝶效应”有清醒的把握，切实树立整体安全观，同时要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①其次，还需要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顶层设计，通过完善的支撑与保障机制，使之获得持久的推动力。

（三）经济上：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

恩格斯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②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向更高级共同体组织形态过渡的根本动力同样离不开发展，而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坚持互利共赢、建设开放性世界经济。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每一秒钟都是马克思所说“世界历史”中的“全球性时刻”。世界经济发展史早已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具体来说，在互利共赢中构建利益共同体，首先体现在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各国应携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通过共商解决全球性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反对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其次，在互利共赢中构建利益共同体，还要体现在着力解决全球发展的失衡问题上。21世纪以来，依托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人类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严重，已成为制约全球繁荣发展的瓶颈。面对愈加显现的马太效应，国际社会理应有同舟共济的使命感，通过优化全球经济伙伴关系，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能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

（四）文化上：促进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需要各国经济互利共赢的“硬”支撑，更需用文化和文明交流的“软”动力。各国只有在开放包容基础上不断加深人文交流、促进兼收并蓄，才能让国家之间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根。

马克思认为，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非西方国家就相继被迫卷入到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资本的逐利本性和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需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由于经济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悬殊，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还牢牢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价值观输出，使得一些落后国家的文明被边缘化，甚至“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④。世界各国的文明都是本国人民智慧的结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独特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全人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中心论”，主张破除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文化欺凌”和“文化歧视”现象，鼓励“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⑤。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体现了尊重差异的平等价值观，反映了求同存异的文明发展观，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的逻辑展开。文化变迁理论告诉我们，不同文明只有通过交流交往不断接受外来文化滋养，才能减少隔阂与冲突，进而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命运与共，在于心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更多地取决于世界人民彼此间“达成全球性价值立场的相对一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共通性人类文化价值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3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观”^①，这既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交流话语体系的目标追求。

（五）生态上：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清洁美丽的共同体。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人类命运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命运牵连，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②。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和“生命共同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③。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发挥表率作用，积极发挥自身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技术和资本优势，主动承担对全球气候治理义务，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以助力其发展绿色经济，发展中国家也须自觉跟上时代潮流，变革传统以“效率性”“功利性”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把生态效益作为衡量本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诉求。各国应进一步完善全球生态利益共享机制，积极参与环境问题的公共产品供给，尽快形成多元参与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的清洁美丽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只要世界各国积极变革，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走尊崇自然与可持续发展道路，人类一定会真正迈向清洁美丽的世界。

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理论内在规律的必然反映，也是植根于人类社会历史实践、契合时代发展的现实之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前景光明，但也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如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零和博弈与共赢博弈，结盟对抗与结伴同行，等等。其直接后果，就是诸如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但是，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效回应了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长久以来对未来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共同渴望，所以，这一理念必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程中，为人类社会开辟出更加光明的未来。

责任编辑：李亚强

① 邹广义：《当代文化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页。

③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第1版。

站在道德选择面前

——论《发条橙》中的自由意志

段天泽

(澳门大学, 中国 澳门 999078)

摘要: 安东尼·伯吉斯是英国著名当代作家, 其代表作《发条橙》被称为20世纪中叶英国文坛的“实验现实主义小说”。战后的英国,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衰落, 社会问题频发。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在给人们物质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令人们的精神世界愈发空虚, 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青少年帮派暴力横行。出生于天主教家庭的安东尼·伯吉斯由此产生了关于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选择的思考。在小说中, 安东尼·伯吉斯借主人公阿历克斯的三个人生阶段, 即年轻时崇尚暴力且放荡不羁、出狱后生理上对暴力行为充满排斥但内心却依然有作恶的欲望、成长后道德上有所进步, 深刻地描绘了阿历克斯滥用、被剥夺以及重新获得自由意志的过程, 进而表达了伯吉斯对绝对滥用或完全丧失自由意志的讽刺, 肯定了在道德选择面前能自主掌控自由意志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安东尼·伯吉斯; 《发条橙》; 自由意志; 道德选择

中图分类号: I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11 (2020) 04-0113-06

一、引言

约翰·安东尼·伯吉斯·威尔逊 (John Anthony Burgess Wilson, 1917—1993) 是英国著名作家、作曲家、文学评论家、语言学家。他的反乌托邦小说《发条橙》中的“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 是伦敦的一句民间谚语, 形容某物或某人古怪或反常。通过引用这句话, 伯吉斯意在讽刺将机械的道德应用于甜美多汁的生物体的方式。小说出版于1962年。安东尼·伯吉斯出生于天主教家庭, 深受天主教原罪和救赎观念的影响。这些观念的早期倡导者圣·奥勒留·奥古斯丁 (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 和圣·托马斯·阿奎纳 (Saint Thomas Aquinas) 强调人的自由意志, 认为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 是因为人类有自由意志, 上帝只是为人们选择思考提供了基础, 并没有为特定行为提供现成的答案, 罪恶的原因是人滥用了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①

《发条橙》除了有争议的暴力和色情描写之外, 还因其独创的语言和优雅的音乐成为了近年的

作者简介: 段天泽, 澳门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社会翻译学与文化翻译。

^① 赵林:《罪恶与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原罪”理论辨析》,《世界哲学》2006年第3期,第78—79页。

研究热点。其中,古典音乐(尤其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对比主人公在两个不同人生阶段的自由意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作探讨。另外,本文还将借助哈里·G·法兰克福在1971年的《意志自由与人的概念》中提出的“二阶欲望”理论,力图探究安东尼·伯吉斯对自由意志和道德选择的态度。^①

为了证实本文的论点,本文研究方法将包括解释和比较文献资料,还将引用传记和历史材料,以给小说《发条橙》和安东尼·伯吉斯的“自由意志”的观点提供支持。同时,还会用哈里·G·法兰克福提出的“二阶意志”的概念来支持该研究,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人的性格。

二、完全滥用自由意志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嗯?”这是《发条橙》的主角亚历克斯的口头语。伯吉斯在小说的第一部分花了大篇幅描述亚历克斯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和亚历克斯及其三个流氓团伙成员的一系列暴力行径。通过对这些场景的描写,安东尼·伯吉斯意在突出亚历克斯滥用自由意志会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

(一) 亚里克斯的恶行

“小说基本上排除了亚里克斯作恶的各种外部宰制因素……,使其明确处于拥有自由意志——即有着开放的未来可能性、能够决断自我意愿的地位上。”^② 小说弱化了亚历克斯的意识形态、家庭状况、遗传因素等背景信息,引导读者去思考亚历克斯本人。

他们做的第一件恶行是殴打一位老校长。他们从老教授那里抢过三本书并故意捣乱,因为他们从书中发现了一些“以f开头的单词和另一些以c开头的单词”。^③ 于是,他们开始了整部小说的第一次暴力行为:

“彼得抓住双手,乔治把他的嘴巴绷得大大的,丁姆把假牙脱出来,上下颚都脱……老头开始咕噜咕噜抗议——“喔哇哇”——乔治也就松开绷嘴唇的手,用拳猛揍了一下没牙齿的下巴,老头顿时狠命呻吟开了。弟兄们哪,血就涌了出来,啊!真好看。”^④

他们的暴力行为完全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欲望,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行为是由他们原有的内在意志所引导的,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亚历克斯和他的兄弟们无缘无故地制造麻烦,他们也不为自己对一个无辜的人所做感到羞耻。另一个无耻的罪行是他们闯入一对夫妇的私人住宅,名为“家”(HOME)。他们在殴打男主人的同时强奸了他的妻子,翻箱倒柜,打碎了各种家具,倒酒弄脏干净的地毯。

在小说中,当作者详细描写亚里克斯等人的行为时,他们独创的Nadsat语言,如“格列佛(gulliver)”“莫洛科(moloko)”“普拉蒂斯(platties)”等词,都是安东尼·伯吉斯为这部小说专门创造的。青少年这种独特的语言反映了他们脱离现实世界的意图和独立自由的个性。伯吉斯也打算用这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来强调亚里克斯和他的朋友们由内而外的自由,是一种完全沉浸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二) 古典音乐的作用

古典音乐作为小说的重要线索,在亚历克斯的三个人生阶段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在亚历克斯

① Frankfurt, Harry G. “Freedom of the Will and the Concept of a Perso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68, no. 1 (August, 1971), pp. 5—22.

② 王一平:《〈发条橙〉〈饥渴的种子〉的反乌托邦思考》,《外国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72页。

③ Burgess, Anthony: A Clockwork Orang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3, p. 7.

④ Burgess, Anthony: A Clockwork Orange, pp. 8—9.

自我放纵的青年时期，古典音乐并没有净化他的心灵，反而加剧了他的暴力倾向。人们普遍认为古典音乐是一种优雅浪漫的艺术形式，上流社会的人们喜欢在音乐厅聆听管弦乐队的旋律并沉浸其中，但安东尼·伯吉斯否认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音乐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之间存在联系。在这部小说中，古典音乐不仅给了亚里克斯充分的暴力想象自由，也加剧了他对暴力行为的向往。

离开老两口的家后，亚历克斯和他的朋友开车进城，在酒吧里谈论下流的话题。当亚历克斯回到自己的家，他想听一些古典音乐来放松自己。然后，音乐打开了他的想象世界：

“弟兄们哪，来啦。啊，快感，幸福，天堂……分明是美轮美奂精灵的肉身显现……此刻，小提琴独奏声仿佛珍稀金属丝织就的天堂鸟……接着，长笛和双簧好似铂金质蠕虫钻入了厚厚的金银乳脂糖。弟兄们，我是如闻天籁，飘飘欲仙呀。”^①

第二天，亚历克斯没有去上学，而是去了他过去常去的那家唱片店，买他订购已久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那里，他遇到了两位年轻的女士，并带她们回家。他沉溺于这两个年轻的身体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快乐如同天堂的光辉火花”。^②

由此看出，伯吉斯打破了人们对古典音乐的传统印象，不再认为它只是被上流社会欣赏品味的高雅音乐。贝多芬的音乐并没有减弱亚里克斯对暴力的渴望，反而助长了他的暴力冲动。安东尼·伯吉斯通过亚历克斯来质疑“伟大的音乐，伟大的诗歌会让现代青年安静下来，让现代青年更文明”。^③ 贝多芬的音乐哲学，即充满无限抱负的浪漫主义，与亚历克斯对自由的最高追求不期而遇。在亚里克斯欣赏古典音乐的过程中，它实际上成为了一系列恶行的帮凶。

在详细阐述了亚历克斯的暴力行为和他对古典音乐的沉迷之后，他对自由意志的完全滥用显露了出来。亚历克斯和他的伙伴们做着坏事，说着自创的语言（Nadsat），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有权自己做出道德选择，尽管他们选择了邪恶的一面。

三、厌恶治疗后自由意志的完全丧失

“在《发条橙》中，伯吉斯以反乌托邦的形式将这个问题推到了两个极端……“极端的自由意志会给社会带来无尽的暴力灾难，而极权社会的无情控制则会导致人类自由的彻底丧失。”^④ 伯吉斯在小说的第二部分详细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一）厌恶疗法的作用及后果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英国青少年团伙犯罪猖獗，监狱人满为患。为了追求政治成就，减少犯罪，缓解监狱里可怕的拥挤，政府和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卢多维科技术”——厌恶疗法。周全丽在《〈发条橙〉的心理学评鉴》中对厌恶疗法的定义是：“它是通过附加某种刺激的方法，使求助者在进行不适行为时，同时产生令其厌恶的心理或生理反应。”实施者对求助者持续不间断地进行刺激，以在不适行为和厌恶反应之间建立条件联系。此后，就算外界没有刺激条件，但只要求助者进行该不适行为，厌恶反应依旧会产生，而为了消除该厌恶体验，求助者只能放弃不适行为。^⑤

在小说中，当亚历克斯听说这项技术正在监狱里进行测试，囚犯如果参加治疗就能提前出狱

① Burgess, Anthony: A Clockwork Orange, p. 33.

② Burgess, Anthony: A Clockwork Orange, pp. 35 - 36.

③ Burgess, Anthony: A Clockwork Orange, p. 32.

④ 张和龙：《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评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第63页。

⑤ 周全丽，李瑛：《〈发条橙〉的心理学评鉴》，《电影评介》2013年第20期，第54页。

时,就在对治疗过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主动参加了治疗。因此,当亚里克斯开始这种治疗时,他并不知道治疗会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什么。

医生开始给亚里克斯进行厌恶治疗之前,针对其暴力犯罪行为确定了他的“靶症状”^①,以便更好地对症下药。治疗过程中,医生们把亚里克斯绑在椅子上,四肢及头部牢牢固定住,并用某种特制支架把他的眼睛强行撑开,然后在大屏幕上不断播放暴力色情电影。当治疗进行到第三次时,亚里克斯的身体逐渐产生厌恶反应,暴力色情电影所产生的极度不适感压倒了其最初的快感。当亚里克斯开始意识到这种治疗给他带来难以忍受的身体疼痛时,试图停止治疗,但医生却告诉他这是在纠正他的坏习惯,他的身体正在朝着好的一面发展。当治疗结束后,监狱向大众展示了厌恶疗法的“完美成效”,不仅找来一位裸体女性对亚里克斯进行刺激,还找来一帮演员对亚里克斯进行殴打。而在种种暴力行为发生时,亚里克斯早已丧失反抗能力,取而代之的是治疗后产生的厌恶反应,他整个人躺在地上,非常痛苦。政府将其作为厌恶疗法的“成功案例”大肆宣传,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实施厌恶疗法时,“靶症状”必须是单一且具体的。^②医生原本是想对其暴力色情行为进行治疗,却在播放电影时未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剔除在外,从而使得这首乐曲也能造成亚里克斯的厌恶反应,成为小说后半部分对亚里克斯造成精神折磨的重要因素。

本文并不打算讨论政府的作用,但就厌恶疗法本身而言,不仅对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而且还人为地改变生理机制,使人无法做出理性的道德选择。人类作为理性动物,在做出道德选择的时候,应该有不受外部强迫力量控制的权利,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判断独立做出决定。然而,厌恶疗法却与之背道而驰,人为改变生理机制,这也是伯吉斯想要批评的。

当亚里克斯结束治疗出狱后,他的生理和心理冲突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所有曾经的快乐源泉都使他痛苦,成为折磨他的魔鬼。安东尼·伯吉斯也对亚里克斯再次听到古典音乐的反应进行了描写:

“我兴致勃勃、快乐地听了两秒钟,接着疼痛和恶心排山倒海地压过来,我的肚子深处开始呻吟……然后我想,我得逃出去,于是踉踉跄跄地出了小卧室……与此同时,音乐越来越响亮,好像有意折磨我似的……我爬上窗台,音乐在左边轰鸣;我闭上眼睛,面孔感到冷风,于是就跳了下去。”^③

原本给亚里克斯带来心理满足和愉悦的古典音乐,现在却成了逼迫他跳楼自杀的凶手。厌恶疗法完全剥夺了亚里克斯的自由意志,他最终不堪忍受丧失理智思考能力和精神折磨带来的痛苦,选择结束这一切。伯吉斯通过描述亚里克斯经过厌恶疗法后无力的社会生活,试图表明当人完全失去自由意志和道德选择的权利时,将无法在社会中立足,而被剥夺社会生活能力的人,只能走向死亡。

(二) 选择善的意义

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当亚里克斯不再作恶,严格地说,当他失去了选择作恶的能力时,这种善还有意义吗?运用法兰克福的“二阶欲望”理论来分析亚里克斯出狱后的行为,可以进一步分析他被剥夺的自由意志。

在亚里克斯出狱之前,医生利用他向观众展示厌恶疗法的效果。当他被一个强壮的男人蹂躏

① 周全丽,李瑛:《〈发条橙〉的心理学评鉴》,第54页。

② 周全丽,李瑛:《〈发条橙〉的心理学评鉴》,第54页。

③ Burgess, Anthony: A Clockwork Orange, pp. 162 - 163.

时，亚里克斯出于内心的痛苦而无法反击。可以清楚地看到，亚里克斯的一阶欲望是拒绝并摆脱暴力行为，因为他的生理机制已经被故意改变了。然而，代表他的自由意志的是他的二阶意志。当亚历克斯意识到他不想按他的一阶欲望行事时，他的二阶意志却与之相反。也就是说，当亚历克斯在身体上拒绝暴力时，事实上，他的内心并不认可这种反应，即，他实际上想接受暴力。他的二阶意志实际上是想实施暴力，但被人为地阻止了。亚里克斯的自由意志被完全剥夺了，他所做的善事也毫无意义。善良应该是一种选择的权利，而不是选择的结果。

伯吉斯在小说中通过牧师的声音表达了这一观点。当亚历克斯在监狱里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每天都在朗读上帝话语的牧师。当亚历克斯自愿接受厌恶疗法时，他从天主教的角度给出了他对善的看法：“善来自内心……善良是被选择的东西。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时，他就不再是一个人。”安东尼·伯吉斯写这个角色是为了表达他对个人选择权利的重视。他认为上帝赋予人类自由选择的权利，尽管有些人会做一些对社会和他人有害的事情。他甚至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选择了坏的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比一个把好的强加给他的人更好吗？”^①人们生来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些没有选择权利的人不再是人，而是上了发条的橙子，他们无法做出道德选择。

在对自由意志完全丧失的批判中，伯吉斯不仅以厌恶疗法为中介，讽刺了现代科学对人及其精神世界的影响，而且通过描写其负面影响，强调了选择善的重要性。正如奥古斯丁所说：“谴责善的滥用并不是说上帝不应该将善赐给我们。”人承担道德责任的前提是具有自由意志。一旦人失去甚至被剥夺了这种权利，社会道德就无从谈起。因此，当人面对这一问题时，应该考虑重拾自由意志。

四、重拾自由意志

安东尼·伯吉斯由对两种极端情形的否定引出了对自由意志的进一步讨论。在他的笔下，当亚历克斯无法忍受社会压力，试图跳楼自杀时，他在医院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出院后，他克服了身体上的障碍，恢复了自由意志，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亚里克斯的道德成长

一句“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嗯？”安东尼·伯吉斯又把读者带回到小说的开头。像以前一样，亚历克斯和一群新的狐朋狗友漫步在街上，穿着最时髦的衣服，然后去了一家咖啡馆聊天。惯例似乎没有改变。然而，在亚里克斯身上出现了一些明显的不同。

亚历克斯在国家唱片公司找到了一份与音乐有关的工作，因为是自己挣钱，所以花的钱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此外，亚历克斯不再参与到打斗之中，只是下达命令，然后站在后面看着。暴力不再能让他兴奋，只能带来无聊和绝望。狂暴的长号和粗犷的壶鼓管弦乐队也不再吸引他，他反而喜欢上更安静、更柔和的钢琴和更浪漫的曲调。当看到以前的玩伴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亚历克斯开始幻想他婚后的幸福生活。他完全不想再过以前那种颓废而充满暴力的生活。

（二）道德选择面前的自由意志

伯吉斯在创造了两种极端的生活环境后，在文末最终达到了一种平衡。滥用自由意志会引起社会混乱和恐慌，完全剥夺自由意志则会严重损害人的自由天性。通过对小说中虚构的反乌托邦式社会中两种极端情况的描写，伯吉斯引导读者思考自由意志和道德选择的关系。

伯吉斯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关于自由意志的理念，即人生来就有自由意志，个人可以拥有选择善恶的权利是小说的事实背景。虽然在社会生活中恶行应当受到惩罚，因为它破坏了他人的幸

^① Burgess, Anthony: A Clockwork Orange, p. 71.

福和社会的稳定,但选择恶行的权利还是应该保留的。因此,从神学意义上说,用科学手段人为地调整甚至消除这种自由选择也是一种罪恶。完全的善良和完全的邪恶一样不人道,重要的是自由意志所强调的道德选择的权利。如果没有道德的对立面,就不存在选择道德;而没有道德的选择,人和动物就没有区别了。如张和龙在他的论文中写道:“在人类的生存境遇中,无论是放纵意志还是扼杀选择,都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人类社会往往处于这种把持不定的尴尬处境中。”^① 伯吉斯在小说中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界定总是很难的”,世界是一体的,生活是一体的。

在小说的结尾,亚里克斯的成长意味着人有道德转变和智力成长的可能性,因而社会也有进步的可能性。

五、结论

安东尼·伯吉斯在他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发条橙》中通过亚历克斯人生的三个阶段,表达了他在面对道德选择时对自由意志的强调。通过描述两种极端情形的后果,伯吉斯引导读者思考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对于亚历克斯来说,他不断地用自己内心的粗俗语言、暴力行为、淫秽思想等来挑起社会的麻烦,他滥用自由意志的放纵行径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和恐慌。当他被关入监狱并参与厌恶疗法,从而被剥夺了自由意志后,他的二阶意志,即真实意志是不受控制的,随之而来的善良也不是道德选择的结果,这导致他也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无法在社会中生存下来,最终成为了社会的弃儿。在两种极端的自由困境下,伯吉斯提出了关于如何处理人类在社会中的自由的思考。笔者注意到了亚历克斯的成长,并进一步探讨了道德选择与结果的关系——人生来就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恶不可避免,善也应该是一个人内心的选择。从天主教神学意义上说,主动的理性选择比选择结果本身更重要。

由于小说本身只是反映社会的工具而非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关于自由意志与道德选择的问题,伯吉斯最终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尝试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伯吉斯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反映了包括青少年群体问题在内的“后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还试图表达他对当时政府的不满。伯吉斯借助亚里克斯,从青少年的视角,洞察了人性的本质和人类生存的困境。自由意志的滥用固然会造成不良社会后果,但道德选择权的丧失也同样可怕,“人如何满足内在欲望,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又要兼顾他人的欲望和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仍然需要探索的一个生存难题。”^② 自由意志与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社会发展在各个阶段都存在的突出问题,对自由的憧憬是人类天性,社会规则的制约又是必需,而如何平衡两者以维护社会秩序则是政府的一项重大课题。社会的稳定发展必定要求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对于作为个人道德选择前提的自由意志的保证,也是社会的人性化健康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责任编辑:朱家麟

① 张和龙:《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评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第64页。

② 张和龙:《人类社会的自由难题——评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第67页。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年 1—4 期 (总第 85—88 期) 总目

学习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坚持“社院姓社”政治底色 发挥凝心聚力正能量

…………… 李承儒, 马 霞 (1. 5)

社会主义学院网络教育的时代特征、发展路径与现实意义 …………… 王 艳 (1. 1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不断增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路径研究

…………… 赵 宇, 杨燕芸 (2.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及启示

——以德宏州盈江县石梯村为例

…………… 杨海东 (2. 10)

云南高质量发展研究

新中国 70 年云南的发展历程、成就与经验

…………… 苏红军 (4. 5)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推进“数字云南”建设的路径选择

…………… 吴 韬 (4. 10)

多语生活背景下的语言扶贫实践

…………… 李志凌 (4. 16)

统战理论与实践

对云南网络统战工作的几点思考

…………… 包云燕, 杜明彦 (1. 15)

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哲学审视

…………… 李慧敏 (1. 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统一战线领导权思想的创新发展 …………… 史 苏 (2. 16)

统战教育方法的历史演进与创新发展

…………… 刘 杰 (2. 24)

党外知识分子在文化强国中的功能与使命

——以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为分析视角

…………… 朱益飞 (2. 30)

民族地区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 现实挑战及可能路径 …………… 徐 敏 (2. 36)

新中国成立初期玉溪地区统战工作的做法与启示

…………… 陈从林, 段燕青 (2. 43)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研究

…………… 张 璐 (3. 5)

年轻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价值观认同问题研究

——基于云南省玉溪市的实证分析

…………… 胡 伟 (3. 14)

中华文化视阈下文化统战工作的三重逻辑

…………… 牟 娟 (3. 26)

统一战线发挥制度优势推动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 王寅平 (4. 25)

红河州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经验、问题及路径

…………… 红河州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4. 31)

非公经济与新的社会阶层

辩证统一是“新型政商关系”与“非公经济‘两个健康’”之间关系的核心 …………… 王 喆 (1. 32)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研究

——基于广州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情况分析 …………… 张海霞 (1. 37)

民族工作研究

全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红河实践

…………… 孙桂琴 (1. 45)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

…………… 金 晶 (1. 55)

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路径探析

——以西双版纳州大渡岗昆罕大寨为例

…………… 乐 燕, 孔 婷, 张文娟 (1. 6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内涵、诉求及其策略

…………… 武永江 (2. 60)

多民族杂居区族际交往与民族团结研究

——以云南省孟连县回俄村为例

…………… 罗利群, 郝月梅 (2. 68)

互惠与共荣: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各民族互助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 马喜梅, 官秀娟, 杨 佳 (2. 76)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进程调查

——以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为例

…………… 闫韶华 (3. 34)

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个案研究

——以丽江市为例 …………… 赵润华 (3. 42)

和谐校园视阈下滇缅边境国门高校大学生民族交往

调查

——以 D 学院为例

..... 杨 楠 (3. 49)

少数民族留守小学生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策略研究

..... 黄 敏, 余静芳 (3. 59)

民族研究

家国与个人

——中老跨境婚姻失败案例的人类学研究

..... 马青云, 谭晓明 (4. 39)

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鲜明特征

..... 姜丽华 (4. 48)

宗教工作研究

宗教经济学之发展基础

杨志银 (1. 69)

乡村治理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发展研究

——基于云南一个苗族村的个案分析

..... 韩 芳 (1. 84)

政党制度与多党合作

组织文化视域下多党合作精神嵌入科研组织创新研究

——以 K 研究院为例

..... 胥福顺, 林昱澍, 沈云都 (4. 53)

政党功能视角下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提升路径探析

..... 王晓璉 (4. 61)

协商民主与新型政党制度

李维汉对政协协商民主建构的思想贡献探析

..... 秦泽念 (2. 50)

民主党派社会服务研究综述

..... 黎 国 (2. 54)

新时代首都基层协商民主机制及制度化建设研究

..... 姚 芊 (4. 70)

人民政协推进民主协商动因及路径研究

..... 李旭辉 (4. 78)

法治研究

正义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中的三重语境

田 坤, 廖小明 (1. 111)

云南故事

再忆巧渡金沙江之战 弘扬新时代长征精神

..... 刘林华 (3. 64)

闻一多: 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 马弋涵 (3. 71)

教育救国: 追寻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

..... 念兴昌 (3. 79)

为国而歌: 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战斗青春

..... 朱家麟 (3. 89)

党内协商民主视角下的遵义 - 扎西会议探析

..... 罗 雷 (4. 85)

“花房子会议”考证

冯寿芳 (4. 99)

历史文化

《论语》为政之道对新时代从严治党的启示

..... 刘华荣, 王雄刚 (2. 82)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播方式研究

..... 李一冉 (2. 89)

两岸文化交流合作路径与融合发展启示

..... 成 正, 熊必军 (2. 96)

科技文化导向下的和谐生态伦理的建构

..... 许 烨 (2. 103)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贺麟文化观探析

..... 龙 飞 (2. 109)

滇菜菜名英译助力滇菜文化对外传播

..... 王 齐 (3. 96)

党魁迁居韩城的动因分析

..... 刘国菊, 黄德海 (3. 103)

发展研究

中缅关系 70 年的经验启示

..... 林 永, 杨宝康 (2. 116)

风险社会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治理策略研究

仲昭慧 (3. 109)

脱贫攻坚视阈下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现代化路径研究

..... 李亚强 (3. 114)

文化发展

发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 筑牢文化自信之基

..... 史晓宇, 诸 芳 (1. 90)

政治话语生态下中国声音的对外叙事: 翻译的视角

..... 李志凌, 杨 燕 (1. 95)

当代青年的图像化生存现象探析

..... 席婷婷 (1. 104)

和顺侨乡宗祠文化的历史功能与当代价值

..... 尹未仙, 刘林华 (4. 99)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赵 凡 (4. 106)

站在道德选择面前

——论《发条橙》中的自由意志

..... 段天泽 (4. 113)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征稿重点方向

一、参考选题方向

- (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与统一战线发展研究
- (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
- (三) 大统战工作格局与统一战线发展研究
- (四) 统一战线学基础理论
- (五) 统一战线学学科建构研究
- (六) 新时代中国特色统一战线多学科阐释
- (七) 统一战线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 (八)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 (九) 统一战线高质量发展研究
- (十) 系统科学视角下的统一战线研究
- (十一) 统一战线与风险、危机和挑战应对
- (十二)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研究
- (十三) 非公经济统战工作（非公经济党建、新型政商关系建构、优化营商环境等）、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研究
- (十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 (十五) 基层统战工作研究
- (十六) 港澳台和海外统战工作研究
- (十七) 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 (十八) 统一战线与全球治理研究
- (十九) 统一战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研究
- (二十) 统一战线与边疆治理研究
- (二十一) 统一战线工作实践经验与典型案例研究
- (二十二) 统一战线思想（学术）史研究
- (二十三) 多党合作在脱贫攻坚民主监督中的效能、经验研究
- (二十四) 统一战线与云南“三个定位”研究
- (二十五) 中华文化（统战文化）视角下的云南历史文化研究

二、投稿注意事项

以上选题方向仅供参考，欢迎广大作者据此结合自身优势、研究专长和所关注理论、实践问题自拟具体题目撰稿，契合以上重点选题方向来稿，我刊将优先选用，优稿优酬。

本刊对政治不合格的稿件实行“一票否决”；反对任何学术不端行为；倡导注重问题导向和创新性；来稿查重率原则上不高于15%；引用不同文献著录不少于10条；摘要须囊括主要观点，完整自治；内文提倡包含精练的文献述评。来稿具体要求及体例格式规范，详见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官网。

征稿时间：2021年1月—2021年12月

投稿邮箱：ynsyxbbjb@163.com

联系电话：（0871）68091595、68091586（传真）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季刊, 1999年创刊)

2020年12月 第4期(总第88期) 第22卷

主管: 中共云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主办: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印刷: 云南省人大机关印务中心
发行: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址: 昆明市五一路221号
邮编: 650031
电子邮箱: ynsyxbbjb@163.com

ISSN 1671-2811
CN 53-1133/D

JOURNAL OF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Quarterly, Started in 1999)

Dec. 2020 No.4 (Sum.88) Vol.22

Responsible Institution: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unnan Province
Sponsor: Yunn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Printed by: Printing House of General Office of Yunnan
People's Congress
Distributor: JYIS Editorial Department
Address: No.221 Wu Yi Road, Kunming City, PRC
Post code: 650031
E-mail: ynsyxbbjb@163.com

广告经营许可证: 5300004000090
出版日期: 2020年12月20日

ISSN 1671-2811



定价: 9.00元